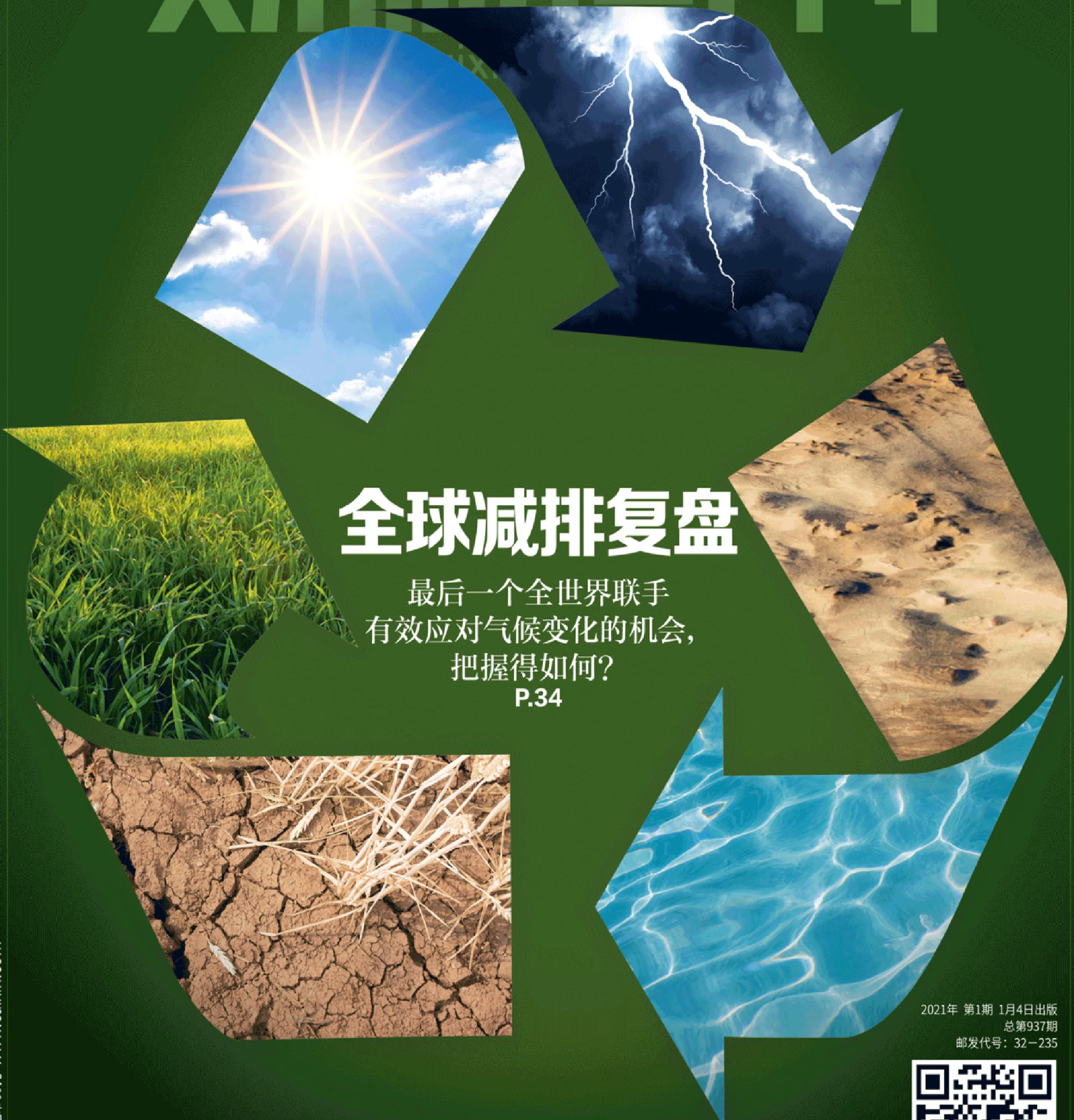
公募REITs等待规则 27
TikTok不停步 48
游族之殇 54
卡车变道 60
天然气告急 64
显影｜2020：挺住意味着一切 70

财新周刊



全球减排复盘

最后一个全世界联手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机会，
把握得如何？

P.34

2021年 第1期 1月4日出版
总第937期
邮发代号：32－235
定价：人民币30元 港币60元 www.caixi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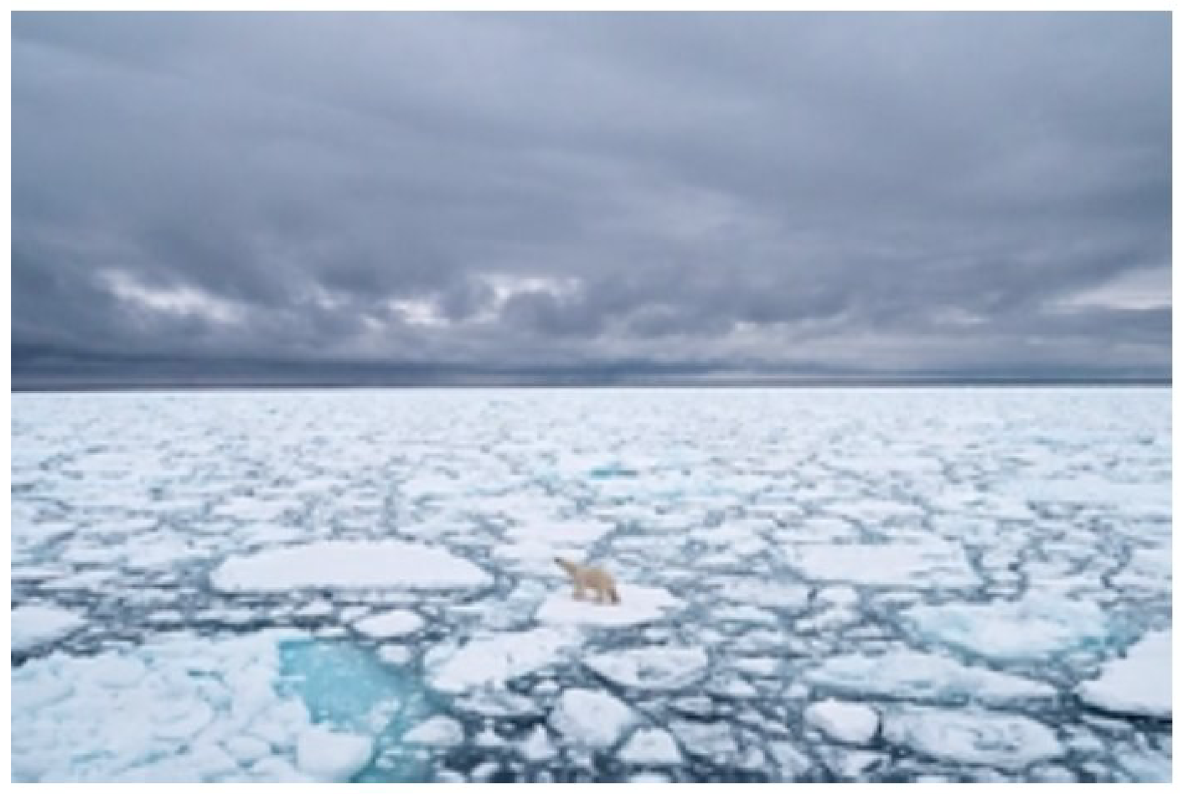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封面报道｜全球减排复盘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最后一个全世界联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机会，把握得如何？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杜偲偲 康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2020年爽约了。原定于2020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将推迟至2021年举行。因此，2019年西班牙马德里气候大会（COP25）上留下的未竟议程——《巴黎协定》第六条"市场机制"规则的谈判以及落实2020年前的资金安排和气候承诺等，将往后至少再延宕一年。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也不全是坏消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和全球碳项目2020年12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因疫情导致人类经济活动收缩，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约24亿吨，较2019年下降7%，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

然而，气候变化的形势已十分严峻。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尽管各国为防控新冠疫情采取了多种措施，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却仍在持续上升，2020年1月至10月，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1850年—1900年）水平基线高出约1.2摄氏度。2018年10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 IPCC全球升温1.5摄氏度特别报告》称，按照目前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计算，全球每十年升温 0.2±0.1摄氏度，若这一趋势不变，2030 年到 2052 年之间就将达到升温 1.5摄氏度的阈值。"我们还没有走上正轨，仍需更多努力。"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Petteri Taalas）表示，2024年前全球平均气温将比工业化前水平短暂高出1.5摄氏度的可能性至少为五分之一。



2020年10月27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奇诺山，肆虐的山火逼近居民区。

五年前，全球196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在巴黎达成《巴黎协定》，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让协议得以正式生效。这份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文件提出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巴黎协定》被认为是全球最后一次联合起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机会，“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性成就”。此前的30年间，气候变化谈判已经历多次挫折。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在日本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责任。之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否都要在法律约束力下承担责任，一直是每届气候大会争议的焦点。

相比《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形成了一套各国均能接受的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框架，将发展中国家的行动纳入，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即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情况提高

减排目标，逐步实现绝对减排或者限量减排；发达国家则还被要求承担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义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低碳绿色之路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并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

另一方面，《巴黎协定》虽然提出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但并不将减排任务直接分摊给各国，而是由各国主动提交“国家自主贡献”（NDC）。在此基础上，每五年检视成绩并更新目标。因此，《巴黎协定》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也没有惩罚措施，被称为“缺少爪牙”。这也为后来的尴尬埋下了伏笔——各国在巴黎所作出的承诺并不足以达成上述目标，甚至已有的承诺也难以兑现。

“《巴黎协定》签署五年后，我们仍然未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2020年12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召集的气候雄心峰会上如此总结。

五年后回看，人类走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正确轨道上吗？我们离它的目标还有多远？协定各主要缔约方五年来的态度和行动如何？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看点是什么？

尚未走上正轨

近几年来，各种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全球陆地、海洋，甚至北极均出现了新的极端温度；野火吞噬了澳大利亚、西伯利亚、美国西海岸和南美的大片地区，森林火灾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导致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同比增长了2.6%，远高于2010年以来1.4%的年均增长率；2020年夏天，中国的长江、淮河流域长时间连降暴雨，导致多地发生洪灾；11月，中美洲史无前例地出现了连续的4级飓风??

汇集了数十个国际组织和专家贡献的世界气象组织《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显示，目前五个全球气温数据库都将2020年列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年份，仅在2016年之后，2011年—2020年也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报告认为，尽管各国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多种措施，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却仍在持续上升。由于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存留较久，未来几代人生活的地球都将进一步变暖。

科学共同体认为，全球气温升高背后的主因是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20年12月9日发布的《2020排放差距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连续第三年增加，达到了52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不包括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59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包括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再创历史新高。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初步数据显示，使用化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9年达到38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也再创历史新高。



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连续第三年增加，达到了52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不包括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59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包括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再创历史新高。

气候变化并非线性过程，一旦突破"临界点"，便可能步入恶性循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地球系统研究所主管蒂莫西·莱顿（Timothy Lenton）领导的研究团队，2019年底在《自然》杂志刊发文章认为，全球15个气候临界点中的9个已被触发——包括格陵兰岛冰盖、南极冰盖和南极洲东部的部分区域正在加速消融，亚马逊雨林由碳汇转为碳源、珊瑚礁大规模白化、大西洋环流减缓、永久冻土层解冻、北美针叶林的大火和虫灾等。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一份最新报告认为，到2050年要实现《巴黎协定》2摄氏度温升控制目标的深度减排路径，需要实现二氧化碳"近零排放"，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需要降低到20亿吨左右，即比2030年前二氧化碳峰值排放量减排约80%；而要实现1.5摄氏度目标，则全球需要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即一年内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温室气体清除量达到平衡。这意味着各国必须加强协作，在经济、能源领域作出重大调整。

但迈出这一步谈何容易。气候变化议题在国际上已演变为环境、外交、政治、经济等多维兼具的综合性博弈。

在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上，国家自定贡献预案（INDC）这一新概念被推出，即各国自主提出减排目标，通过审议其目标是否满足科学上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各国再根据审议结果，调整自己的INDC。这一机制，最终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被确定下来。

2014年11月，中美双方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公布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2025年，美国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26%—28%；中国计划将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控制在2030年左右，并尽早实现，此外中国计划2030年前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至20%左右。欧盟也在2014年提出，其成员国到2030年相比1990年的水平共同减少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40%，并把可再生能源在欧洲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高至27%，而且这些目标将对所有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三大主要排放体中、美、欧这“三个轮子”的驱动下，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夕，184个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各自的自主减排贡献方案（INDC），这些国家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95%。当年12月12日，《巴黎协定》最终通过，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安排。

美国：特朗普后遗症

作为当今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对《巴黎协定》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据非政府组织“全球碳计划”（GCP）的数据，2018年美国人均碳排放16.6吨，是中国人均碳排放的2.37倍、全球人均碳排放的3.46倍。

美国国内仍未形成气候变化的政治共识，其气候治理实践一直因两党之争而反复，进而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氛围。《巴黎协定》生效仅五天之后，“气候变化阴谋论”支持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此后高调退出《巴黎协定》，由中、美、欧这辆“三轮车”驱动的全球气候治理遭遇阴云。以特朗普就任为节点，此前美国的气候变化行动以联邦政府主导，此后则转为州、市、私人部门及社会组织发挥主要作用。

“回顾五年前，你会发现美国人会觉得减缓气候变化是联邦政府的事情，虽然人们也采取很多行动，但他们对联邦政府会更依赖，现在大家会强调各州的领导力。”美国马里兰大学全球可持续中心研究主任里昂·克拉克（Leon Clarke）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7年6月1日，美国华盛顿，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2020年11月4日，美国在国际法意义上正式履行完所有退出程序，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退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

美国民主党对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态度积极。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5年美国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包括土地使用）减少到2005年水平的26%—28%；到205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80%。此外，到2020年美国还将拿出30亿美元的气候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做气候适应工作及转型。

在国内，奥巴马政府推出了《清洁电力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还在执政末期向联合国提交了《美国2050年深度脱碳战略》。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清洁能源设施增加了30倍。白宫官网称，在奥巴马执政的2008年—2015年间，美国的碳排放量减少了9.6%。

但随后上任的特朗普马上推翻了奥巴马的一系列气候政策。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发表演讲称，根据国家经济研究协会的数据，如果遵守《巴黎协定》的条款及其对美国施加的严格能源限制，到2025年，美国将损失多达270万个工作岗位，“这使得美国处于非常大的经济劣势，我们将难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停止向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兑现剩余的20亿美元。联合国环境署科学司司长、首席科学家刘健介绍，特朗普的相关行动直接影响到了绿色气候基金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特朗普宣布“退群”后，美国气候治理主体由联邦政府转变为各州、市、企业界联合发起的多个气候治理联盟。里昂·克拉克表示，实际承诺加入《巴黎协定》的所有州、市和企业参与者，约占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占全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0%，“尽管联邦一级对缓解气候变化缺乏兴趣，但在国内，大家采取了许多行动”。

“实际上，（特朗普）复兴煤炭的计划失败了，因为现在经济越来越青睐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气候公益组织“2050路径平台”执行主管理查德·巴伦（Richard Baron）对财新记者说。

“在全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经全面低于化石能源，形成了市场拐点。”落基山研究所常务董事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婷向财新记者介绍，自2017年以来，美国电动车数量增长了1倍，16个州承诺全面淘汰氢氟碳化物（HFC），13个州和170个城市承诺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目标，600万人生活在全电力新式住宅中，未来还将朝着全面脱天然气的方向进展。

里昂·克拉克分析，这得益于光电和风电技术的巨大进步。“这五年间，全球普遍性的进步之一就是技术的进步，尤其在太阳能电池和风电领域，这使电力部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显著降低。现在太阳能发电在很多方面比化石燃料提供的电力便宜，它将极大地改变很多地区的面貌，比如电池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运输方式的真正转变，现在已经出现大量的电动车。”他认为，如果市、州和企业继续采取行动并扩大努力，到2030年它们可以带领美国走到深度减排之路，但要实现2050年零排放这一新目标，则仍需要联邦政府重新参与行动。

根据气候行动组织“美国誓言守护”2019年的一份报告，到2030年，仅州、市和企业的行动就可以将美国的排放量减少37%，远高于美国NDC最初的目标。

近期来看，相比奥巴马任期，特朗普任职期间碳排放的下降速度减缓，甚至在2018年出现反弹。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能源转型项目主任王伟康向财新记者介绍，美国曾承诺到2020年将在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基础上减排17%，但截至2018年底，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仅下降10.2%。

2020年11月4日《巴黎协定》生效四年后，美国在国际法意义上正式履行完所有退出程序，成为迄今为止惟一一个退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在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看来，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作为最大的经济体退出《巴黎协定》，明显导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领导力缺失、政治势头被削弱，也直接影响到了全球的互信，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气候变化格局。

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分部全球政策高级顾问李硕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美国联邦政府缺席的情况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巩固，也没有更深一步的探索。美国“退群”也给全世界带来新的思考——《巴黎协定》能不能经得起主要排放国家国内政

治的摆动？“美国这样的问题，未来会伴随我们很久。过去四年我们勉强经住了这样的考验，未来再来一轮，还经得住吗？这是个问题。”

好在下任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于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当天就发推表示：“今天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而在正好77天后，拜登政府将会重新加入。”与特朗普的态度相反，在拜登的竞选网站上，气候和能源计划位列各项计划的第一位。

但李硕认为，即便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也并非“从黑夜变成白天”，特朗普的遗留问题，会对拜登的气候政策造成掣肘，他给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留下了力度赤字、资金赤字等众多问题。

拜登的气候和能源计划分为“应对气候危机”“未来清洁能源计划”和“保护环境正义”三个部分，他提出的目标是，美国将在2050年之前实现100%清洁能源经济，达成净零排放。随着拜登上任，美国有可能扭转特朗普政府所导致的退步，并通过力度更大的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来缩小与《巴黎协定》目标的差距。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主任赵昂认为，拜登政府可能更多采取产业政策，延续奥巴马时代的一些政府投资，加大技术渗透和支持。“但总统权限有限，这些条例要经过国会表决通过。”他认为，拜登的这些气候政策，都难以避免会面临议会和最高法院为代表的立法与司法系统的重重阻碍。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与德国气候分析组织联合发布的《中美气候目标对比》报告表明，如果拜登竞选承诺的《能源与气候总规划》在国会的支持下得到充分实施，并继续得到地方行动的有力支持，那么美国可以在2030年前实现相比2005年38%—54%的减排量（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因而将2030年目标差距消除一半以上。

李婷则相对乐观，她认为美国全经济领域均显示出明显的市场信号，可再生能源成本低于化石能源，市场在能源转型方面出现明显拐点。较为成熟的电力市场、企业的深度参与、清洁能源创新技术的积累，以及商业模式的不断尝试，这都是美国在未来实现净零碳排放方面的优势。美国到2050年实现零碳，这意味着需要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近50%，到2017年已经减排大约12%，而未来所需38%的减排量中，约有三分之一可以依靠企业和地方以市场机制推动的自下而上减排。

里昂·克拉克也强调，在美国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州市和企业对减排仍至关重要。而在新政府中，联邦政府应该和各州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它们能够共同行动。

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世界期待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也不负众望，作为发展中国家主动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三个月后的气候雄心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家园。让我们继往开来、并肩前行，助力《巴黎协定》行稳致远，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习近平呼吁。

邹骥认为，环境污染是中国当年想要力促《巴黎协定》达成的内在动力。2013年1月1日，京津冀、长三角74个城市开始发布PM2.5监测数据，71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超标。就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举办期间，北京遭遇了一次史上最严重的雾霾侵袭，并拉响了史上第一次空气污染红色警报。中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受害者。

该次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承诺将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控制在2030年左右，并尽早实现；2030年前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至20%左右，在2030年之前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至2019年底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18.2%，提前完成了“十三五”约束性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装机年均增长大约12%，新增装机年度占比超过50%。

从全球来看，据李婷介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球的30.4%，新增量约占全球的

32.2%，连续七年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第一大国，“这一数字十分可观”。

不过，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煤炭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仍占主要地位。2018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9.0%，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首次低于60%。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量达到顶峰，2014年至2016年煤炭使用量下降，在2017年开始反弹，2018年继续增长。目前中国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处于高位。

赵昂介绍，从2007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二氧化碳第一大排放国，“虽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减排方面的国际压力一直在增加，外界认为中国的去煤进程不够快，还有很大空间”。

有国际环保人士认为，中国碳强度“下降65%以上”的目标还是不够有雄心。邹骥解释道，碳强度是由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产业结构、人口数量、收入水平等多重因素决定，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长有下行的压力，疫情也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现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也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到2030年GDP究竟有多高，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此，他认为，作为一个中期规划，最新的NDC目标并没有使中国偏离碳中和轨道，65%的碳强度下降和70%—75%的差异，反映到达峰时间上可能是2年—3年的区别，未来仍有进一步降低碳强度的可能。

与目前大部分做出碳中和承诺的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在上升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还未彻底脱钩，从“达峰”到“零碳”，中国实现碳中和愿景的时间要比发达国家少30年左右。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何建坤的最新论文《中国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认为，在203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约68%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在接近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达峰，并在之后走出一条陡峭的碳排放下降曲线，走向净零排放。李硕则认为，2030年后急剧下降的难度较大，“不可能指望突然出现一个奇迹式的减排技术”。

而据前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与德国气候分析组织的联合报告，如果中国的排放量从2021年开始稳步下降，以每年约3%的速度脱碳，那么2060年可以实现温室气体中和；如果排放量在2020年或平稳期之后再次增加且直到2030年才开始减少，随后的年度脱碳率则必须接近5%。报告认为，中国可以采取几项关键措施以尽快达到排放峰值，2030年将煤电比重降低至5%—10%，最迟2040年之前逐步淘汰煤电。

无论是短期的碳排放达峰，还是远期的碳中和目标，以煤电为最先抓手是绝大多数报告的共识。王伟康说，中国低碳产业的巨大优势，尤其是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和潜力，使当前以煤炭为基础的中国能源体系有了显著的变化，预计“十四五”期间煤炭在整个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有可能会下降到50%，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将整体超越燃煤火电装机。

就近期来看，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预估下降到2.2%左右。邹骥警示，通常在经济下行后，政府会扩大投资刺激经济，投入高碳行业中去，就很容易刺激反弹。“这在带来排放增加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产能过剩和资本沉没。”但同样是刺激经济，如果投资可再生能源、储能、直流电网、电动车等低碳技术，带来GDP增长的同时也更绿色。因此，疫情之后选择投资的方向和领域，设定低碳的标准，都十分重要。

据赵昂观察，目前中国的复苏还是以基础建设、政府投资为导向，“并没有看到非常强的绿色复苏动作”。李硕也提到，2020年，中国钢铁和水泥这两个高碳行业的产量相较去年还有所增加。理查德·巴伦进一步披露，2020年中国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10%左右。“要使经济政策与气候挑战保持一致，需要做很多工作。决策者必须意识到，我们具有采取行动和做出改变的能力。”

刘健坦言，他也担心在疫情过后产生更严重的排放。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宣布全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实际上就是呼吁大家，疫情之后的重建和恢复、投资要绿色转型，不可以再走过去传统的、按部就班的老路。”刘健说。

欧洲：气候行动先锋

尽管近年来持续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英国脱欧的消极影响，欧盟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比较具体，还有救助计划和刺激计划。整个欧盟范围，包括德国，

都有一些政策，因为经济体规模不一样，发展规模不一样，不能说谁更有效，但至少现在形成了一种气候。”邹骥表示。

欧洲环保主义理念渊源深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污染与石油能源危机，催生了欧洲的环保主义思潮与绿色政治运动，并向全球蔓延，环保主义政党也随后在欧洲应运而生，并对全欧政治版图产生重要影响。生态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各国政府与民众的重要事项之一。欧盟自1993年成立起即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给予关注，对内协调各成员国的气候治理政策，对外推动气候谈判，斡旋于不同利益体之间，先后促成了《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多份重要的气候协议。

在里昂·克拉克看来，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最大优势在于社会支持度高。“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他说，“当考虑缓解气候变化时，一方面我们会考虑实际操作是否可行，如安装更多的可再生电力、提高效率以及建立法规等；另一方面是社会公众愿意作出改变的程度。”据他观察，与美国相比，欧盟公民总体上对减缓气候变化普遍更感兴趣，也更加支持。此外，欧盟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比中国小很多。

在欧盟看来，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一次经济转型的机遇。为实现“把欧洲改造成高能效、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催生新的工业革命”的目标，2008年欧洲议会批准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提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将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将能源效率提高20%，并在此后通过了相关立法。

这一计划也是欧盟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尝试。欧盟当时提出，若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能够达成一份强有力的全球减排协议，欧盟将提高目标，到2020年减少30%的排放量。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首要目的，是商讨2012年《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新的约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文件。

当时的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的环境大臣安德烈亚斯·卡尔格伦曾表示，“30%是用于对其他谈判方施压的杠杆”。但大会临近结束时，表现激进的欧盟被排除在外，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领导人为主的一个关键性闭门会谈，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的修改定稿。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未能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欧盟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仍为20%。而2020年后的欧盟气候治理目标则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下逐步更新。虽然美国在《巴黎协定》生效后不久即宣布退出，重创了全球气候治理信心，欧盟仍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气候治理进程。

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欧盟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相比1990年的水平至少减排40%。根据《巴黎协定》的要求，各国还需每五年更新国家自主贡献，在2020年前提交到本世纪中期、长期低温室气体排放发展战略。2020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长期战略，并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2020年12月7日，欧盟更新了到2030年的自主贡献承诺，提出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5%。

欧盟也正将承诺付诸行动，其2020年的碳减排目标已提前六年完成。实际上，欧盟的转型有诸多有利因素。从1990年起，欧盟整体碳排放量已达到峰值，进入稳中有降的通道。根据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数据，1990年—2018年的29年里，欧盟减少了约23%的温室气体排放，经济增长了61%左右，实现了温室气体排放和经济增长的脱钩。而同样作为成熟发达经济体的美国，则自1992年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后排放量仍持续快速增长，且增长趋势保持了15年。

清洁电力的发展是欧盟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根据欧洲环境署的数据，1990年—2018年，欧盟27国和英国所有主要排放部门中，电力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最快，减少了34%。这主要是由于可再生能源份额不断增加，煤电份额减少，同时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到2019年，欧盟27国和英国的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份额约达34.6%，煤电份额下降至14.6%。欧盟发电的碳排放强度已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欧盟已是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尤其是海上风能技术的领导者，各成员国近年纷纷明确去煤

时间表，11个欧盟成员国通过了逐步淘汰煤电的计划。一些计划在2020年上半年得到加速，如2020年6月末，西班牙关闭了7个装机容量为4.6吉瓦的燃煤发电厂，几乎占其燃煤总装机容量的一半。

然而，欧盟内部也存在压力和冲突。以波兰为代表的七个欧盟成员国仍未计划在2030年前淘汰煤炭，波兰煤电装机量占欧盟的一半。2020年9月，波兰气候部提交《到2040年的波兰能源政策》草案，预计到2030年，其煤炭的发电量占比将从目前的80%减少到37%—56%之间，到2040年减少到11%—28%之间。欧盟第二大煤炭消费国德国，计划最迟在2038年完全淘汰煤电。

"从2010年到2020年，欧盟电力部门的低碳发展有很大成效，主要以风能为代表，加上北欧的水电、法国的核电，一些国家也提出了去煤的时间表，所以未来十年欧盟会花很大的精力在交通部门的减排——交通是特别难减排的一个部门。"赵昂表示。

交通部门是欧盟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部门，排放占比已从1990年的14%上升为2018年的22%。欧盟正试图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作为燃料、为新车引入碳排放标准、增加零排放和低排放车的市场份额、加强铁路运输等措施促进交通部门减排。

"欧盟的碳减排路径与中国、美国类似，只是各国处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减排范围。欧盟是以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目标为先导，涵盖工业和发电的碳排放交易系统继续将这些部门的排放控制在不断下降的上限之下。运输和建筑领域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定禁止柴油和汽油车，并为电动汽车腾出空间，这方面的进展也即将到来。"巴伦表示。

"随着欧盟排放交易系统的改善以及越来越多的成员国逐步淘汰煤炭，可再生能源的规模扩大，电动汽车已开始渗透市场，以及欧盟已开始建立强大的汽车标准，排放量继续下降是轻型汽车行业脱碳的信号。"非政府组织"气候分析"主管比尔·哈勒（Bill Hare）向财新记者表示。

为了保证远期减排目标得以落实，2019年，欧盟还提出《欧洲绿色协议》（EGD），以使得欧盟经济复苏并在2050年之前实现气候中和，协议内容包括各行业的未来五年行动计划。为推动成员国完成转型，EGD提出公正过渡机制，其目标是在2021年—2027年之间动员至少1000亿欧元，减轻向低碳经济过渡的负面影响。在2020年3月，欧洲委员会提出了《欧洲气候法》草案，试图建立起一个实现2050年气候目标的治理框架，并为实现该目标设定中介目标。

"欧盟一直采取蓝图先行、市场机制引领的低碳或零碳发展模式，在节能减排技术、市场、行业经验、社会参与度方面都有较大优势。"李婷介绍，欧洲特殊的政治体系，使其必须也必然首先着力制定长远的规划、确立共同目标，否则无法在国际气候政治角力中形成合力。此外，欧洲大国间有常规化的立场协调，欧盟委会员就气候变化有专门决策机制，在行动方案方面有细化的分担方案，这对大国内部确立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方案都有启发。

全球氛围令人担忧

气候治理有赖于全球行动。目前欧盟、美国、中国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45%，在有限的碳预算份额下，印度、俄罗斯、日本、巴西等其他排放大国的减排举措也十分重要。

然而，在业内人士看来，相比五年前，如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氛围令人担忧。虽然印度的可再生能源利用高歌猛进，但煤炭投入和使用量仍然巨大。日本在2012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后，使用天然气和煤替代核能，反而增加了碳排放。加拿大虽然是气候友好型政府，但国内政治分裂比较严重，反对党影响较大，作为空间有限。此外，巴西、澳大利亚态度消极，南非则面临经济危机。

印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目前居全球第四，作为人口第二大国，印度与中国类似，正经历经济迅速增长期，人口的持续增长、城市化和制造业发展使得能源需求飙升，而煤炭、石油等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仍是其主要的能源供应来源。

"像印度这样的地方，经济发展、能源获取、减贫，这些是优先事项。如何同时以低碳的方式发展是最大的挑战。"克拉克表示，目前大多数国家仍不认为减缓气候变化是它们的第一要务，还有许多其他优先事项，"要明确低碳发展之路，把气候治理作为解决能源安全、环境

污染、经济发展等问题的重要内容，这对任何地方的气候治理都很重要”。

在印度，确保民众能有电可用还是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2000年—2018年，10余亿印度人中约有7.5亿人可以使用电力。直至2019年，印度政府才宣布实现所有家庭的全面电气化。其能源需求也将在未来有大幅增加，IEA的《2020印度能源政策审查》报告称，该国对能源的需求到2040年将增加1倍，电力需求可能会增加3倍。

自本世纪初以来，印度的煤炭供应迅速增长，印度也是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第四大炼油国和炼油净出口国。虽然印度近年来在国内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但煤炭发电占比仍较高。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为19%，煤电占比达73%。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印度在计划扩大太阳能投资的同时，也将继续增加燃煤发电。非政府组织“气候行动追踪”认为，若要遵循《巴黎协定》的1.5摄氏度限制，印度需要在2040年前逐步淘汰电力行业的煤炭。然而，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一转型并不容易，还需要多种支持，融资即是难题之一。

国际机构“能源转型委员会”（ETC）主席阿达·特纳（Adair Turner）勋爵此前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是否有足够的金融参与者”是印度能源转型最大的问题，“印度脱碳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电力部门，是资本成本和相关的政治风险，这是一个比技术转让更大的问题”。在西欧、美国、中国，如果有大型风能或太阳能项目，会得到资本支持，但在印度或非洲，因为政治风险、资本市场欠发达等因素，其资本成本远高于中国或欧美。

除印度外，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近年在气候治理上也缺少行动，甚至出现倒退。第五大排放国俄罗斯虽然早已签署《巴黎协定》，但在2019年9月才正式宣布加入。在2018年波兰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上，俄罗斯和同为石油生产大国的美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组成的“石油同盟”拒绝接受《IPCC全球升温1.5摄氏度特别报告》。俄罗斯也一直未在气候治理领域提出针对性政策，直到2020年3月，俄罗斯才发布了一份长期气候战略草案，其中包括到2050年的排放情景预测，但设计的情景仍缺乏雄心。

人均碳排放量居于世界前列的澳大利亚，则在气候治理方面出现倒退。澳大利亚一直未实施有效的气候政策，由于政府政策的不确定，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已降至2017年的水平。2020年澳大利亚政府还出台政策倡导利用天然气，也未排除对煤炭和核能的支持。

巴西则因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受到诟病。在2020年全球大多数国家因新冠肺炎疫情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巴西的碳排放量或将逆势增长。巴西“气候观察组织”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巴西毁林活动更加猖獗，预计森林砍伐将导致2020年巴西全国排放量比2018年增加10%—20%，合二氧化碳排放量21亿—23亿吨。巴西曾在《巴黎协定》框架内承诺，到2025年每年最多增加1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2030年在亚马逊地区实现零非法砍伐森林。

森林有强大的固碳能力，毁林则会造成排放增加，巴西的温室气体排放最大来源即是土地利用变化。2018年，巴西排放了1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44%来自土地使用变化，25%来自农业，21%来自能源领域。2019年初，亲特朗普的巴西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就任后，削弱了环保执法，在亚马逊地区引入更多的商业性农业和采矿业，导致近两年来巴西的森林砍伐面积激增，创下近年历史新高。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INPE）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巴西热带雨林的毁林面积比上年同期增长了9.5%，达到11088平方公里。

除了前述主要排放国，过去的几年中，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也大有不同。比尔·哈勒长期关注小岛屿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的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他介绍称，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总体上态度积极，智利、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已开始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和做出承诺。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非常脆弱的国家如越南，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菲律宾、巴基斯坦最近宣布控制煤炭使用，但是这些地区的国家离走上一致的道路还有一段距离。

而在非洲，受经济发展程度所限，总体排放及人均排放量较低。“非洲很多地方没有电，它们的主要任务是适应气候变化，全球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帮助它们适应。”刘健表示。

“随着非洲的日益繁荣和城市化，其排放量将会增长。但是非洲能够跳过技术的发展阶段，有机会直接使用可再生能源，而不必走先使用大量的化石燃料然后再转向可再生能源的老路。”特纳勋爵表示，非洲在其他领域已经发现出这样的跨越式发展特征，“许多非洲国家没有固定电话通信系统，它们直接开始使用移动电话，多数非洲人都有手机”。

鉴于非洲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特纳勋爵认为，非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在两个方面一次性成功：一是大规模开发光伏和风电，并发展储能和需求管理，这样就能建立一个可再生能源系统，而不是一个化石燃料系统；二是合理地建造他们的城市。“城市化的方式不同会带来结果的不同。如果能一次性就做到最好，它们将有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非洲可能需要富裕的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援助和资金流动等方式提供帮助。”

雄心何以向前

根据《巴黎协定》，各国需在2020年底前更新气候目标及长远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COP26大会被推迟至2021年。为纪念《巴黎协定》通过五周年，同时推动各方做出新的气候承诺，联合国与英国、法国等于2020年12月12日联合举办了气候雄心峰会。7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多位政商界领袖、社会团体线上参与了该峰会，有45国提出了新的自主贡献计划，24国概述了净零承诺，20国制订了气候适应计划。在气候变化领域未做出有效行动的美国、澳大利亚，则未被邀请发言。

古特雷斯表示，上述承诺意味着，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三分之二以及全球经济总量70%的国家，将在2021年初之前就实现碳中和做出强有力的承诺，但目前的承诺“仍然还不够”。

经过数月磋商之后，欧盟领导人在峰会上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相对比1990年的减少幅度从40%提高至55%。英国的目标显得更为雄心勃勃，提出将在同期使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1990年下降68%。英国、法国和瑞典均制订了计划，终止对化石燃料的国际投资。中国也提高了2030年的承诺目标。



2020年12月12日，法国巴黎市政厅举行亮灯活动，纪念《巴黎协定》达成五周年。

相对来说，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走在前列。芬兰、奥地利、瑞典分别设下了2035年、2040年和2045年为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巴巴多斯和马尔代夫提出，在适当的支持下，到2030年就实现碳中和；斐济、马拉维、秘鲁和尼泊尔则表示，它们的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然而，多位气候专家均表示，承诺能否落实到行动仍有待观察，主要排放国的2030年承诺

与更长期的承诺之间也还存在鸿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峰会前发布的《2020排放差距报告》也显示，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1%的126个国家已通过、宣布或正在考虑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尽管远期的“净零排放目标”令人鼓舞，但各国NDC目标疲软不足，未来还需弥合二者差距。

即使从更新的承诺本身来看，距离实现目标或许仍然不够。“在此阶段，气候雄心峰会宣布的最新承诺还不足以将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哈勒表示，“2021年气候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要实现宏伟目标就必须在2030年实现重大改善，从而缩小排放前进的方向与达到1.5摄氏度限值所需的距离。”“气候行动追踪”组织的计算得出，全球当前的气候政策将使世界升温2.9摄氏度；目前所有国家提出的2030年雄心计划会使世界升温2.6摄氏度；如果全面实现承诺，则最近各国提出的远期净零排放承诺将使全球升温降至2.1摄氏度，都还无法达到《巴黎协定》的最低目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各国必须共同努力将国家自主贡献决心提高3倍，以如期实现2摄氏度的目标；而要如期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则必须把国家自主贡献决心增加5倍以上。考虑到净零排放目标的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预计，符合无条件的国家自主贡献的温度，或使得本世纪末的升温降至2.7摄氏度左右；如果考虑拜登提出的美国在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那么到本世纪末的升温或在2.5摄氏度—2.6摄氏度左右。

巴伦认为，长期目标必须在近期的行动中立即转化为投资，政策和法规的变化要与净零排放目标保持一致。而要稳定全球气候，还需要美国在2050年或更早之前实现净零排放。

“未来各国的挑战在于如何使重工业脱碳，如何在汽车制造中帮助煤炭社区和高碳价值链转向低碳，以及如何将无数其他经济活动引导至气候友好型解决方案。”巴伦称，决策者们需要比较哪些方法最有效。这也将是一场竞争，因为不同经济体和公司都在押注不同的解决方案，决策者需要努力确保这种竞争是公平的，并且在所有人都需要朝着同一方向前进时，他们之间不会产生对抗。

目前的全球新冠疫情正深刻影响着全球的碳减排进程。世界气象组织及其他多个机构合作的报告《2020团结在科学之中》显示，在疫情初期，封锁措施和经济放缓带来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暂时下降，但排放正逐步回升到之前的水平。各国的经济复苏政策是否“绿色”，关系着未来减排事业的走向。

古特雷斯近期批评富裕国家为实现复苏，在化石能源上的投资比低碳能源高出50%。他认为，这是从子孙后代借来的钱，“我们不能利用这些资源，来锁定那些会给后代带来沉重债务的政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结各国政策时表示，疫情后的绿色复苏有望推动全球在原本预测的2030年排放量基础上减排25%，将2030年的排放量维持在4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水平，在这一排放区间内，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可能性达到66%。然而，迄今为止，多数国家尚未开始通过复苏措施加速绿色转型，若不扭转这一局面，《巴黎协定》目标可能将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在低碳救助和复苏措施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几乎没有G20成员国付诸行动。大约四分之一的成员国在其国家支出中设置了固定份额（不超过GDP的3%），明确用于推行低碳措施，大多数国家还多是以高碳为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政府必须在新冠肺炎疫情财政干预的下一阶段抓住机会实施低碳政策。

“我们从事气候变化工作的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将带来比疫情更为严峻的挑战。然而，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后，使我们的经济重新站起来的复苏计划，远不符合我们的全球气候目标。”巴伦同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同时提醒我们，面对严峻的全球挑战，社会可以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

王伟康认为，在未来6—12个月内，各国应在经济复苏刺激计划中嵌入结构性支持政策，强化公共投资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例如在刺激方案设计中包括政策评估机制，利用公共财政支持低碳商业模式，取消对环境有害的补贴，同时引导私营部门的资金支持与现有的气候目标一致的企业，并在适当时候引入新的承诺，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巴黎协定》受到批评的一点是缺少“爪牙”，即没有惩罚措施。刘健认为，一旦在国际上做出承诺，能不能实现它是国家信誉的体现，也是领导人政治信誉的一个保证。另外，联合国每年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都会看主要排放国家的工作进展如何，并根据多个因素排行榜看大家是否达标，通过这样的方式激励大家实现目标。“我们很欢迎大家设立有雄心的目标，但我们更关注这些目标是不是能够真的被完成。”他说。

各国转型需要依靠地方及市场主体，而对如何激励各地真正落实转型，巴伦认为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和法规。一方面，签署了《巴黎协定》的政府需要以身作则，为低碳解决方案创造市场，并加强对新能源的研发支持，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将适得其反。“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这种转型是关于人的，政府必须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利用财政系统来纠正由低碳转型引起的任何不平等，应通过财政手段给钢铁、造船等高碳行业的转型提供帮助，以有效而公正地过渡。”

此外，技术进步对于减缓气候变化仍然重要，除了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US）需要加强研发、降低成本，可再生能源技术仍需进一步。“近五年来，可再生能源技术不断发展，成本不断降低，应用场景也进一步拓宽，在全球的低碳排放转型中能够发挥出更高的潜力。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目前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条件下，完全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仍然有一定的挑战，突破性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及储能技术等仍然有待加强。”王伟康称。

格拉斯哥的重任

“除非2021年底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重大协议，否则《巴黎协定》将是一片阴霾，随之而来的还有整个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哈勒认为。他自1989年起参与到国际气候治理之中，包括1992年《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巴黎协定》的谈判工作。

COP26将于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世界资源环境研究所气候谈判主任Yamide Dagnet及多位研究员撰文分析称，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必须解决四个关键问题：最终确定《巴黎协定》规则手册中三个领域的细节，包括为国家气候承诺设定共同的时间表、确定透明度框架的技术细节、确定碳市场的运作方式；气候适应和损失损害机制；气候投资；缩小与长期目标间的差距。其中，碳市场的设计与气候资金问题一直是气候大会的疑难问题。

良好运转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有效降低减排成本，促进各国提升自主排放目标，因而碳市场一直受到极大关注。《巴黎协定》第六条允许各国通过碳市场等市场机制，部分实现国内减排目标，主要包含三项机制，其中条款6.2允许国家之间进行减排成果的国际转让，条款6.4则意在建立一个由联合国机构监督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以取代此前《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ETA）曾估算理想状态下碳市场的作用——有潜力减少超过50%执行“国家自主排放”目标的成本，2030年一年可节省2500亿美元。

《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由各国提交国家自主贡献（NDC），但目前来看，各国NDC离实现《巴黎协定》总的温升目标有很大距离。两者之间的差距怎么弥补？在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建宇看来，最重要的两个机制是“棘齿”锁定机制和市场机制。前者要求各国行动目标和力度“只进不退”，每五年盘点一次减排成果，并加码减排力度；碳市场机制则有助于形成有效碳价，这样才能促进多减排、早减排，让企业根据碳价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

然而，直至2019年的COP25，各国一直未能就碳市场达成实质决定。王伟康介绍，当时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与以巴西、埃及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三项政治性问题上尖锐对立：一是收益分成，即第6.2条所设“合作方法”如何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二是“国家自主贡献”相应调整问题，即在核算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完成情况时，如何避免因使用“可持续发展机制”而产生双重计算问题；三是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代表的《京都议定书》下的市场机制工具如何向《巴黎协定》第6.4条机制过渡，各方也未能达成一致。

碳交易市场机制的设计并不容易。巴伦曾任国际能源署的气候变化负责人，开展过碳市场机制相关工作。他认为，除了要确定一些技术细节，用它们确定一个国际碳市场的环境完整性，例如估算减排量并可以“交易”到另一个国家的基准，全球统一的碳市场还面临一个更根本的难题：如何在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体和一个稳定、技术先进的经济体中，采用单一的碳价来驱动选择。

“试想一下，在这种安排下，如果中国寒冷天气推动碳价上涨进而影响了欧盟的出口业，欧盟决策者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们都同意碳市场的经济有效性，我们必须将这种过渡的成本降到最低，但是各国也有很好的论据来设定自己的价格和自己的排放轨迹。”他举例说，加拿大宣布到2030年将碳价定为170加元，“这是中国决策者认为适合其消费者的价格，还是远高于推动中国低碳投资的必要价格？”

除此之外，资金问题也是气候大会的多年痛点。发达国家曾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和动员1000亿美元的长期气候援助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减缓和适应行动，但这一承诺如何具体落实一直并没有明确说法，“气候基金”的定义也是一笔糊涂账。李硕称，COP26将是评审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兑现程度的一个节点会议，同时还要确立一个自2025年起的集体资金目标。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帮扶资金落实一直在‘待解决问题’的清单里，原本就进展缓慢，新冠肺炎疫情又给这一问题添了不少阻力。”邹骥说。

据经合组织（OECD）最新统计，2013年—2018年，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和筹集的气候资金均未达到1000亿美元。2018年最高，总计789亿美元，其中公共气候资金达到296亿美元，与2017年相比增长了8%；私人气候融资为146亿美元，与上一年持平；与气候有关的出口信贷较少，为21亿美元，不到总体气候融资的3%。

在巴伦看来，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除了需要确保各国履行其对气候融资的承诺，还应更适当地解决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此外还应鼓励各国制定长期的低排放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注入实现我们的气候稳定集体目标所必需的雄心。”同时，他表示，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渴望实现零排放净发展，国际捐助者必须支持这种过渡的长期计划，并使其资金与低碳投资和气候适应力保持一致，“当我们选择一条更好的发展道路时，就不会给这些国家带来高碳、高污染和昂贵的发展模式”。

美国的重返将对谈判进程产生的影响，也是2021年看点之一。李硕分析，可以预见美国会借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契机展开二次谈判，除了宣布自己的目标，还可能动员日本、加拿大等盟友加码，“基于这些，再和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大国一起加码”。

资料视频：2019年5月，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詹妮弗·摩根表示，《巴黎协定》的关键 问题在于落实，目前各国的实施状况好坏参半，有些国家在持续推进，但有些国家没有跟上脚步。

版面编辑：刘潇

元旦社论｜制度型开放新起点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是多边主义取得的又一次重要胜利

2020年岁尾，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协定谈判如期完成。过去的一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中欧投资协定为2021年增添了一道曙光。无论对于中欧双方，还是对于全球经济，这份协定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简言之，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它堪称经济全球化在逆境中取得的一大进展；对于中国而言，它则是制度型开放的新起点。

这份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投资协定来之不易。双方共举行35轮磋商，历时逾7年。谈判也曾长期徘徊，在最近一年半内发力提速，始得如期完成。这既是双方领导人审时度势的正确抉择，又是双方经贸关系和国际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中国与欧盟均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不过，与中国和欧盟之间巨大贸易体量相比，双方的相互投资极其有限，其广阔空间、巨大潜力亟待开掘。中国曾与一些欧洲国家签有双边投资协定，但多数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签订，内容仅涉及投资保护条款，缺乏市场开放等内容。中欧投资协定文本尚未公布，但是，依据双方透露的信息，其涉及领域远远超越传统双边投资协定，涵盖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四方面内容。

对于中国而言，这份互利共赢的协定既有利于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也有利于国内企业"走出去"、扩大对欧投资，尤其是减少中国企业在并购欧盟企业时可能遇到的国家安全审查等掣肘。更重要的是，它着眼于制度型开放，高水平的公平竞争规则将为双边投资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它还是"以开放促改革"的最新动力，必将促进中国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这意味着，政策重心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政府和企业须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以市场化和法治化方式推进开放。中国将多年前制定的"外资三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整合、修改为《外商投资法》，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实施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这是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得以取得进展的重要国内条件。

也应承认，中国在对外资开放上仍有不小提升空间。在谈判过程中，欧方对中国提出了降低在华投资壁垒、提升欧盟在华投资所受保护、提升欧盟投资者在华待遇的法律确定性等一系列诉求。谈判中的要价系博弈策略，未必完全合理，然而，市场准入、环境与劳工标准、国企补贴、透明度及公平竞争环境等问题，不仅是中欧谈判的关键领域，也是中国其他主要经贸伙伴的共同关切。对于中国存在的所谓"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一些经贸伙伴颇有怨言，然而，不同于特朗普当局欲将中国赶出多边经贸体系的做法，欧盟拥抱开放、讲求规则，力图在多边机制下解决经贸摩擦。只要谈判大门打开，就总可以通过磋商，求得共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欧盟的关切在主要经济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中欧投资协定对中国与其他经贸伙伴的类似谈判具有标杆作用。

中方的态度是灵活务实的。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答记者问时指出，"我们也注意到，纳入与经贸有关的环保、劳工议题已成为近年来国际经贸协定的重要特征。"这是一种顺应世界潮流的明智态度。有些论者认为，这些要求不过是有意对中国设限，未免流于偏执。中方固然需要在维护自身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自主开展对外谈判，然而，国际经贸的最佳实践是在不断提高的，各国不进则退。中国作出必要让步，最终促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顺利收官，这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诚意、决心和信心。

谈判完成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执行。在谈判期间，一些欧方人士担心，协定生效后，欧盟对华投资是否仍会面临一些隐形障碍，冲突解决机制又如何有效建立。这些担心可能失于过度敏感。不过，中欧双方均应通过可信的行动打消对方的类似疑虑，真正实现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开放。就中国而言，未来应及时修改国内法、改革监管体制、调整国内政策，有效

改善营商环境，以消除经贸伙伴的后顾之忧。

中欧投资协定是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之后，多边主义取得的又一次重要胜利。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后，还将有一系列后续程序。在此期间，或许还会发生一些波折，然而，在双方领导人的努力下，这一协定终将促进中欧间双向投资。中欧自贸协定也并非遥不可及。此外，中方正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寒意方浓，春潮在望，中国的制度型开放进程不可阻挡。

（本文为即将于2021年01月04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01期社评）

版面编辑：许金玲

【编辑絮语·王烁】传记五种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聪明人用笨办法做事

本期值班主编 王烁

新年宜荐书，从这段时间所读中挑了五本传记。

Ataturk， Andrew Mango 著 本书讲述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一生。20世纪初，全世界公认的正确道路是以民族国家建国，以现代化、世俗化强国，但真正带领古老文明走完全程浴火重生的很少，凯末尔做到了。能干军人，精明政客，超级现实主义政治家，凯末尔这些角色一个都不少，但比这一切更能流传后世的是启蒙者。

Napoleon： A Life， Andrew Roberts 著 现代国家的形成，始于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的完成，又是成于拿破仑之手。个人的努力与历史的行程，集中在拿破仑身上。每个现代人都应当读一本拿破仑传记，了解“现代”这两个词的真义。这本资料扎实，文字优美，书又极厚，可以读个痛快。

Churchill： Walking with Destiny， Andrew Roberts 著 又一本Andrew Roberts写的传记，这次是丘吉尔。丘吉尔平生说的话、写的书太多了，说的话不可信，写的书不可靠，凡是他自己表达的都不可信。对丘吉尔一生可以有把握地说这几点：能说会道，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固执己见，勇气外溢，厌憎极权。从凡人的眼中看本来是有缺点有优点，但在1940年5月那个至暗时刻，这些都变成了优点。时也命也。

The Passage of Power： The Years of Lyndon， Robert A. Caro 著 本书皇皇千页，却不过是作者Caro为美国前总统约翰逊所写传记五卷本之一卷而已。这一卷讲约翰逊离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一职，与后辈肯尼迪搭档，成为其副总统，却在接下来六年中饱受被漠视的屈辱。直到肯尼迪遇刺那一天，当他几乎已经绝望的时候，命运把他最渴望的权力交到手中。他就好像一生都在等着这一天一样，迅速调整到位。在事态不完全明朗、与世隔绝的几小时里，约翰逊在脑中沙盘推演了接下来他需要做的一切。当离开避难所、登上空中一号时，他已是经验丰富、杀伐决断的新总统。在关键时刻，外厉内荏消失，冷静自律接管。他三管其下：对全国人民，他释放宽心信号，防止局面失控。对政府班底，他强调延续性，接管肯尼迪人马。对南北政争，他利用举国同悲的形势，利用肯尼迪的殉道者形象，以完成其未竟事业相号召，通过民权法案、减税案，并随之开启自己的政纲：推进社会福利计划。约翰逊接任美国总统后的前两年，被认为是“二战”以后美国总统任期中执行力最强的阶段。

Working， Robert A. Caro 著 这是约翰逊传记作者Caro的类自传作品。Caro一生写书，少而精，时间长，巨厚而耐读。这本小书自述想法和操作，对我来说相当于对他两本传记巨著作个抽样，结果是远高于预期。首先，他写的是权力，传主怎么获得权力，人们怎么被权力操弄，所以表面上是传记，实际上是围绕权力的当代史；然后，Caro出身记者，很有让当事人开口的能力，文字又极好，但他毫不取巧，行为严谨，只用一手材料，书证和访谈必须交叉证实后才使用。他已入暮年，本来是最缺时间，但又最舍得花时间，一辈子只写了两个人，看样子还不一定能写完。聪明人用笨办法做事的极致就是这样子了。▫



王烁

版面编辑：许金玲

财新周刊｜TikTok不停步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联邦法院初步阻击总统禁令，美国政府坚持上诉，TikTok在法律博弈窗口期加速北美商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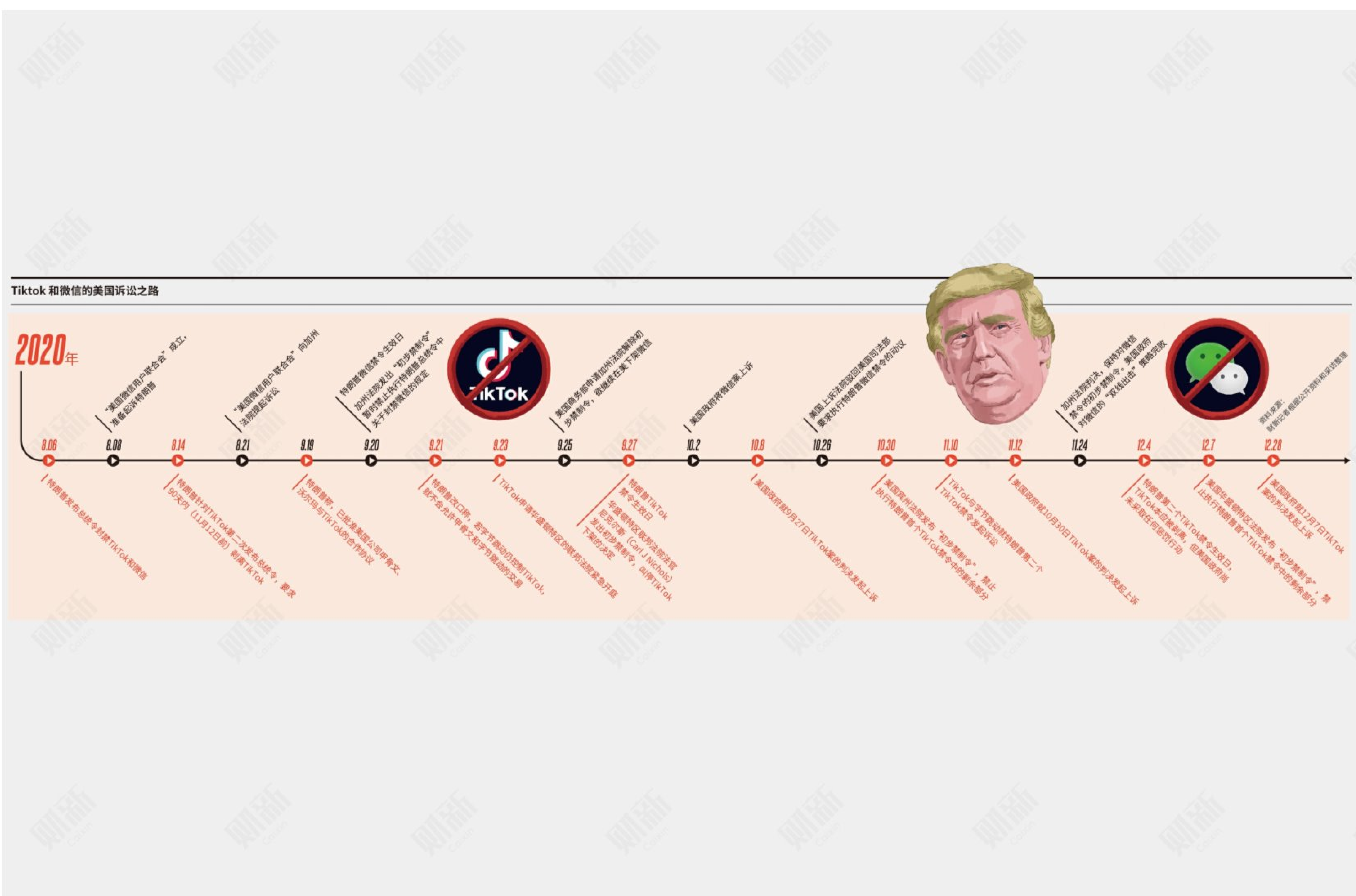


《财新周刊》 文|财新特派华盛顿记者 杜知航 记者 关聪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但TikTok和微信在美禁令闹剧还未到终局。目前，各项争议被提到法院层面。美国联邦法院近期给出了对TikTok和微信有利的判决，接连发出初步禁制令，对特朗普总统令踩下了“刹车”。

但是初步禁制令只在诉讼期间有效，并非最终解决方案。TikTok当然想尽快了结案件，将初步禁制令变成永久禁制令。但谈判拉锯仍在继续，美国政府已就联邦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

TikTok至少获得了喘息之机，稳住了在美国市场的基本盘：和电信运营商的合作暂时无虞，本地服务器、CDN等服务支持得以持续；重启关闭两个月的广告业务；牵手沃尔玛，快速复制中国国内短视频电商模式。一切迹象显示，TikTok正在法律博弈窗口期，抓紧落地在北美地区的商业化。



点击查看大图

但多名来自美国的分析人士均指出，无论TikTok还是微信，还得在美国法庭和市场继续奋战，而新一届拜登政府的态度才是关键所在。“靴子”仍然没有落下来。

微信一击成功

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8月6日晚，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微信（WeChat）和全球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被特朗普总统行政令突袭。

这一总统令宣称，9月20日起，凡在美国司法管辖权内，涉及与腾讯（00700.HK）或其子公司开展的与微信有关的任何交易，以及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及其子公司进行的任何交易，都将被禁止。

面对这一强压，最先诉诸法律并获胜的是微信的美国用户。

2020年8月8日，五名在美律师成立非营利组织"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U.S. WeChat Users Alliance），募集捐款来招募律师团，开始准备针对特朗普微信禁令的诉讼。此后，"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向位于旧金山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控告这一禁令存在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总统滥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原则）和违反行政程序法等"五宗罪"，申请联邦法院叫停这道总统行政令。

在禁令生效前夕，9月20日上午，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法官劳雷尔·比勒签署判决书，在全美范围内暂时禁止执行这一总统令。

法官比勒在庭审中称，美国商务部对微信的制裁"撒了一个大网"，且没有回应这样的制裁是否精准地满足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需求。

比勒还特别援引"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的报告称，对于微信用户中的老年人、有心理健康问题或完全不会英文的华人这些"弱势群体"来说，"微信就是他们惟一的线上交流平台，他们在此平台上所有的活动也即将停止"。

对于加州法院的裁决，美国政府曾试图"双线出击"，一边申请加州法院停止初步禁制令，一边又将判决上诉到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然而，这一策略没有奏效。10月26日，上诉法院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发布判决，驳回美国司法部此前提交的、要求执行特朗普的微信禁令的动议。11月24日，加州地区法院判决，不会撤销初步禁制令。美国政府针对微信的"双线出击"策略完败。

TikTok诉讼拉锯

对比微信近乎"一气呵成"的反击，TikTok的诉讼之路更为犹疑。TikTok和母公司字节跳动既要与美国政府和谈，又要就剥离事宜与美国公司接洽，还要思考是否应该学习微信案，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告上法庭，一时间应接不暇。

针对TikTok，特朗普共发出了两个总统令。8月6日，特朗普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为依据，第一次针对TikTok发布总统令。总统令细则分两部分，一是9月20日（后推迟至9月27日）起，禁止TikTok在美国境内应用商店的下载和更新；二是11月12日起，禁止美国网络服务商为TikTok提供服务。

2020年8月14日，特朗普第二次发布总统令，根据美国财政部下属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建议，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11月12日前）剥离TikTok。

要不要像"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那样发起诉讼？字节跳动最初是犹豫的。一名接近字节跳动高层的人士曾告诉财新记者，字节对诉讼本身并不抱太大期待："不一定能拖（时间），字节跳动要作最坏打算。"

在特朗普宣布双重总统令后，字节跳动曾于8月24日向加州法院提起诉讼，但美国政府一直未回复。9月20日，TikTok和字节主动申请撤案。

另一方面，字节继续了和谈这条路，即和美国当地公司积极谈判交易事宜。特朗普曾于9月19日称，已批准美国公司甲骨文、沃尔玛与TikTok的合作协议。

众人皆以为好事将近之时，9月21日，特朗普突然改口，称如果字节跳动仍会控制TikTok

的话，就不会允许甲骨文和字节跳动的交易。

与此同时，微信在9月20日的诉讼中获得了暂时胜利。TikTok终于下定决心，再次踏上诉讼之路。

然而，一入法庭深似海。由于总统禁令的复杂性，字节和TikTok与美国政府多次交手。

2020年9月23日，TikTok申请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紧急开庭，暂停执行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令中的第一个部分——9月27日起下架TikTok。

禁令即将生效的当天晚上，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法官尼克尔斯（Carl J Nichols）发出初步禁制令，叫停TikTok下架的决定。不过，该禁令的第二部分——11月12日起，禁止美国网络服务商为TikTok提供服务，则没有被法院禁止。

2020年10月30日，在三名TikTok网红制作人联合发起的另一个诉特朗普案中，宾州法院也作出了有利TikTok的判决。该法院当日发布初步禁制令，暂停执行上述第一个总统令的第二部分。12月7日，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也发出了几乎一样的命令。自此，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令中的全部内容被暂停。

目前，美国政府已将华盛顿特区和宾州法庭的三个判决分别提交至上诉法院。

不过，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令依旧有效，这意味着TikTok将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指导，于11月12日被迫剥离。对此，还没有从第一个总统令缓过气来的TikTok和字节，又马不停蹄地发起了新一轮诉讼。11月10日，TikTok和字节在华盛顿特区上诉法庭提交诉讼，要求叫停第二个总统令。

此时，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已出，政府态度开始缓和。11月13日，TikTok理应被剥离之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通知将剥离期限延迟15天至11月27日。11月25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再次给予七天宽限，剥离期限延迟到了12月4日。

目前，2020年12月4日的最后期限已过，美国政府尚未采取任何惩罚行动。特朗普的总统令细则曾称，在90天期限的基础上，可以有不超过30天的延期。现在即使加上30天的延期，也早已过了最后期限。

特朗普的总统令并未指明，如果字节跳动不能在规定期限剥离TikTok，将面临怎样的实质性后果。文件中只提到，美国司法部长有权采取“任何必要步骤来执行该命令”。

截至本刊发稿，与TikTok禁令相关的三个案件仍在美国上诉法院继续受理。

商业化加速

数次命悬一线，市场曾一度降低TikTok的商业化预期。“影响最大的是拉新。”一名TikTok广告一级代理商告诉财新记者，北美关停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代理商几乎无法向新客户投放任何宣传材料，线上分享会和物料必须提前一周向TikTok公关部报备，情况直到近期才有所缓解。

在Facebook和Google长期把持广告市场的情况下，TikTok一直被广告客户视为补量渠道。2020年二季度数据显示，Facebook旗下五款主要社交应用全球月活总和已经超过30亿，而TikTok在美国和欧洲月活之和不过2亿。

一名接触TikTok海外业务的蓝色光标公司人士透露，与头部的出海渠道相比，TikTok平台的算法不够完善，受众画像没有特别精准，也一直影响广告主的选择。美国关停危机更让部分广告主犹豫：是否还要在一个小渠道上冒险？

不过，TikTok并没有在危机中丢掉太多流量。调研机构Sensor Tower数据显示，8月至11月，TikTok都是全球下载量最大的免费应用程序。截至12月17日，TikTok全年的全球下载量（含抖音）达9.61亿次，来自用户的营收约12亿美元，同比增长6.27倍。

随着2020年Facebook和Google政策趋于严格，TikTok反而获得了机会。上述蓝色光标人士

透露，疫情影响之下，两大平台为了减少审核人力，打击不合规商家，限制了中小客户每天的广告投放金额和流量。“一些商家开始看别的渠道不能突破，TikTok就成了首选。”财新记者了解到，2020年已有部分品牌专门拨出营销预算投TikTok广告。

TikTok一边在法庭上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一边不断释放外部合作消息。为了扩充用户制作短视频需要的音乐资源，TikTok签下索尼的版权库。10月底，TikTok宣布和加拿大电商平台Shopify合作，Shopify商家可以直接通过TikTok广告为自己的店铺和产品引流，TikTok复制中国国内抖音电商路径的计划正渐渐浮现。

2020年圣诞节前一周，作为此前TikTok敲定的合作方，沃尔玛率先试水直播带货。

2020年12月18日晚间，十位TikTok网红共同撑起了历时一个小时的“TikTok美国电商处女播”，实时在线人数峰值达到1.9万。在沃尔玛的直播间里，主播们推销的是Champion、Jordache等年轻化的高阶品牌，以及部分沃尔玛自营时装品牌，客单价在20美元—30美元左右，但官方未披露此次直播最终达成的GMV（商品交易总额）。

这一次，TikTok和老对手Facebook在电商赛道不期而遇。2020年5月，Facebook和Instagram推出商店功能，并宣布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步推广直播电商。

在中国国内，抖音正在跑步做电商。一名抖音电商服务机构人士透露，早在TikTok北美遇阻的几个月，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就开始为国内电商部门大量招人，“电商是上市前的变现重点”。

字节跳动在6月把电商升为一级部门，断掉直播间外链。市场立即嗅到抖音小店的流量红利，已有服务商号召品牌方抓紧入驻。据了解，抖音小店功能几乎两周一迭代。

抖音电商服务平台星榜估计，抖音2020年直播电商GMV会达1500亿元。张一鸣希望电商的版图能拓展至中国以外，临近年关，张一鸣给字节跳动立下新一年的战略目标，“跨境电商”位列其间。

毫无悬念，TikTok将是跨境电商的支点。仅仅拉入沃尔玛解决供应链问题，对于立起这个支点来说远远不够，TikTok需要更多的渠道。可是，一张“白名单”足以将想要带货的中小商家全部拒之门外：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六国，TikTok落地广告的电商，需要达到年GMV 50亿元的门槛。这项限制曾在2020年4月放开，9月25日起又再度被平台收紧。

先行探索商业化的Facebook和谷歌又早一步笼络了人心。上述蓝色光标员工告诉财新记者，对于跨境电商客户来说，两家的广告效果和成本都要比TikTok好。而Instagram的App内支付闭环，已经能在部分支持快速结账功能的商家中打通。相比之下，沃尔玛的直播页面下方的“小黄车”购物键仍需跳转至沃尔玛页面完成支付。

不过，与中国国内直播带货蔚然成风相比，海外市场远未成熟。彭博社援引调研机构Coresight数据称，2019年，美国直播电商规模不足10亿美元。相比之下，快手一家平台在2019年直播电商GMV就高达596亿元人民币（约91.13亿美元）。一家跨境红人营销公司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海外直播内容商业化程度低，国外的KOL培养体系并不完善，还没有浮现真正专业的头部带货主播，“国外有依靠平台培养带货主播的动作，但是还没成功”。

“并不是你拿钱，人家就愿意帮忙带货。”一名外贸公司市场人士直言，国外网红带货生态和中国国内差异明显，Youtube、Instagram的网红在选品上随意性较大，“只有真正试用过并喜欢产品，才有可能帮你发布内容。”在沃尔玛找到的十位TikTok网红中，就有不少是服饰试穿、测评领域的创作者。

杭州卧兔科技创始人胡煜告诉财新记者，在美国，一名百万粉丝的创作者短视频带货的报价是几千美元，按照品类来看，数码科技类达人价格较高，幽默搞笑类的创作者则低一些。UGC内容篇幅短，创作容易，TikTok因此占有成本优势，达人推广价格比Youtube上要低50%以上。

上述跨境红人营销公司人士称，TikTok或许能抓住疫情带来的电商红利，用直播带货培养

起“Z世代”消费群的心智。“这些消费群体对于内容要求比较高，直播符合他们的需求。”

最终能否过关？

目前距离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上任不到一个月，TikTok和微信是否“熬到”特朗普卸任就了事？财新记者采访的多名美国贸易和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决定两个公司命运的，除了美国法庭的最终判决，还有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态度。

美国法院的初步禁制令已叫停了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令，该总统令在未来能被完全推翻吗？华盛顿律所Miller&Chevalier专攻出口管控的律师奥图尔（Timothy O'Toole）持乐观意见。他认为，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法院发出初步禁制令，就是因为TikTok和微信赢面本来就很大，只要拜登政府不在TikTok和微信案件上继续发力，这些案件便可以自动了结。

“案子进行到最后，‘初步禁制令’可以变成‘永久禁制令’，那些总统令也就无效了。”奥图尔说，“拜登政府若要保持对TikTok和微信的制裁，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行。”

与美国国会制定的法律不同，美国总统发出的行政令可以被总统撤回或修改，法院也可以禁止行政令生效。

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有法院用初步禁制令暂停了总统令的生效。2017年1月，特朗普签署第13769号总统令，禁止部分穆斯林居多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美国多个州在多个地区法院提起包括违反《行政程序法》在内的十项对特朗普的指控，并申请到初步禁制令。最终，这一总统行政令不得不两次缩小禁令覆盖的范围，被拖延至2018年6月，获得最高法院对3.0版本的通过。但相关诉讼仍未完全结束。

据美国法律，“初步禁制令”一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出，如果法庭不撤回“初步禁制令”，其效力可以持续到结案。结案时，如果法院判定申请“初步禁制令”的一方胜诉，便可发布“永久禁制令”，让总统行政令永久失效。

据微信和TikTok近期在法庭提交的补充材料，两者对法院都有尽快结案、将“初步禁制令”转变为“永久禁制令”的诉求。

微信甚至在12月8日提交了更新版的起诉书，直截了当地提出，特朗普全凭个人喜好发出行政令、封禁微信也是为了打击微信里反对特朗普的言论，根本不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对此，美国政府采取了“拖字诀”。在TikTok相关案件中，美国政府表示，上诉法院还没有判决，联邦法院如果结案的话，可能影响到上诉法院的判断。而在微信案中，美国政府也要求延期，称微信更新了诉讼书，需要更多时间回复。据此，TikTok和微信的法律诉讼将难以在特朗普任内完全了结。

特朗普要求TikTok剥离的第二个总统令尚未受到初步禁制令约束，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登台，TikTok能逃脱厄运吗？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永哲（Martin Chorzempa）对财新记者表示，特朗普总统令即使最终无法生效，TikTok也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剥离。

“已经错过可以完全逆转局面的那个点了。”马永哲认为，新一届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完全放过TikTok。“这是因为完全放弃的政治成本太高，会引起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美国国会‘鹰派’得多。”

马永哲预测，TikTok最终可能在某些领域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例如保证所有数据都存在美国，或者增添美国的董事会成员，协商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回顾特朗普对华科技公司政策，马永哲和奥图尔表示，特朗普政府针对单一公司的模式，是比较“临时”的做法，并不能系统地解决美国对其他国家科技公司的国家安全顾虑。

哪些人或势力鼓励了特朗普这样单一地针对中国公司呢？美国塔夫茨大学网络安全副教授约瑟芬妮·伍尔芙（Josephine Wolff）向财新记者表示，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受到的压力大部分来

自政界，而非商界。对于美国大型科技企业而言，中美之间的纷争加剧不会带来好处。伍尔芙举例称，“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在中国仍有很多工厂，如果中美互斗，苹果会有许多损失。”

对于上述观点，马永哲提出了不同见解。马永哲提醒，美国商界对TikTok的兴趣可能远高于对其他中国公司，TikTok是第一个能在美国市场与Facebook和Twitter这类互联网巨头匹敌的中国公司，美国商界对其十分关注。另一个特别之处是，相比Skype和Spotify这些西方公司，TikTok来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国；而相比阿里巴巴这些在美曝光度较低的中国公司，TikTok在美国公众中的存在感较高。

拜登上台后，还会单独对中国科技公司下重手吗？美国网络安全分析人士表示，拜登上台后，政策会更系统，而非一时兴起地针对单个公司。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CSET）战略主管童海琳（Helen Toner）指出，拜登政府可能采取的做法是，规定TikTok要想继续在美国运营，必须满足某些隐私和安全标准，但不限定母公司的国籍。

“这将与德国对待5G的方式类似。”童海琳对财新记者表示，“德国设定了华为无法达到的特定网络标准，而不是专门针对该公司，但实际上将华为排除在外。”

伍尔芙也提出了相似观点，认为拜登政府的安全政策甚至可能更激进，可能对所有公司都会设立严格的安全标准。美国还可能和其他发达国家合作，以应对科技安全问题。“至少欧盟在这方面已经向拜登政府展示了兴趣。”

在科技监管大趋势上，伍尔芙认为，美国政府将进一步推动数据管理过程的披露和公开。一方面可能要求科技公司披露和汇报，另一方面可能设立许可证、标签或安全标准，更明确地划定科技公司的职责，以便更好保护用户数据。▫

视频说明：美东时间2020年12月3日，投行杰富瑞分析师布伦特·希尔（Brent Thill）接受CNBC”Street Signs Asia“的采访时表示，用户已经不太在意TikTok禁令。因为疫情封城，TikTok的使用者激增。TikTok纷争将可以和平解决，拜登政府在处理TikTok事情上可能会“稍微友好一些”。

版面编辑：许金玲

财新周刊｜游族之殇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围绕科幻第一IP《三体》演绎的商业沉浮，居然走向了网游公司创始人意外死亡的悲剧结局



许垚（右图）是游族影业CEO。两年前，这位律政精英经由引荐，被游族网络董事长林奇（左图）委以重任。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关聪

2020年圣诞夜，上市游戏公司游族网络董事长林奇不幸离世。

十天前，林奇因身体出现不适前往医院。直到12月23日，游族公司（002174.SZ）才首次公告林奇入院抢救的消息，还称"（林奇）身体状况稳定并在持续好转，公司正常运行"。

财新记者从多名知情人士处获悉，林奇在入院当日已发生脑部不可逆损伤。后来的警方信息证实了神秘事件的部分传闻——林奇可能是被蓄意投毒，而存在重大作案嫌疑的是其下属许某。本资源仅供试读，如喜欢需要更多期，请去官方渠道购买，试读微信公众号：

六六精品阅读

经财新记者调查，许某全名许垚，是游族影业CEO。两年前，这名曾在复星集团用七年时间当上总法律顾问的律政精英经由引荐，被林奇委以重任。林奇交给许垚的，正是他经营多年，希望打造成世界级IP（版权）的科幻小说《三体》。

警方未有进一步的案情披露，但外界已哗然一片。涉毒凶杀，《三体》，游戏上市公司创始人被害等，抓人眼球的关键词迅速传遍网络。如此悲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现年39岁的林奇，圆脸，个子不高，身材壮实，典型温州商人模样。2009年，软件工程师出身的林奇在上海创立游族网络，三年后借壳登陆A股。这一时期，盛大、巨人、九城、久游等第一批游戏巨头正在退场，而游族等独立游戏公司崛起，在腾讯、网易等互联网游戏平台之外，形成了中国游戏市场的第三级。



近年，独立游戏公司频频曝出丑闻。

页游红利渐次消减之际，林奇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时机，游族成功转型手游。随着大批游戏公司出海掘金，游族的产品也在日韩等成熟市场占得一席之地，海外销售收入一度超过国内市场。

林奇很早就看到了IP的价值，设想"影游联动"，对《三体》的多元市场开发充满想象力。他个人投资成立游族影业，并着手开发《三体》版权，改编并拍摄电影，这部2015年就杀青的电影，因质量远低预期而胎死腹中。

与此同时，国内游戏市场已暗流涌变，用户数量趋于饱和。根据《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截至2019年6月，中国游戏用户规模突破6.4亿人，同比增长5.9%，连续四年用户增幅为个位数。

独立游戏公司处于巨头之外，缝隙市场的竞争极其残酷。没有平台优势，只得不惜通过高昂的流量成本冲杀，后又经历版号限制等困境，游族在2019年告别快速增长期。新冠疫情期间，《原神》《万国觉醒》等爆款游戏让米哈游、莉莉丝等新贵游戏公司显山露水。这是游族曾经的成功被复制，但主角另换他人。

一名林奇的生前好友感叹，林奇的意外就像是个不负责任的编剧胡乱写出来的结局，"突然而不合情理"。不少曾与许垚共事过的员工至今仍难以置信，为人低调、做事专业的许垚，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毒杀自己老板的凶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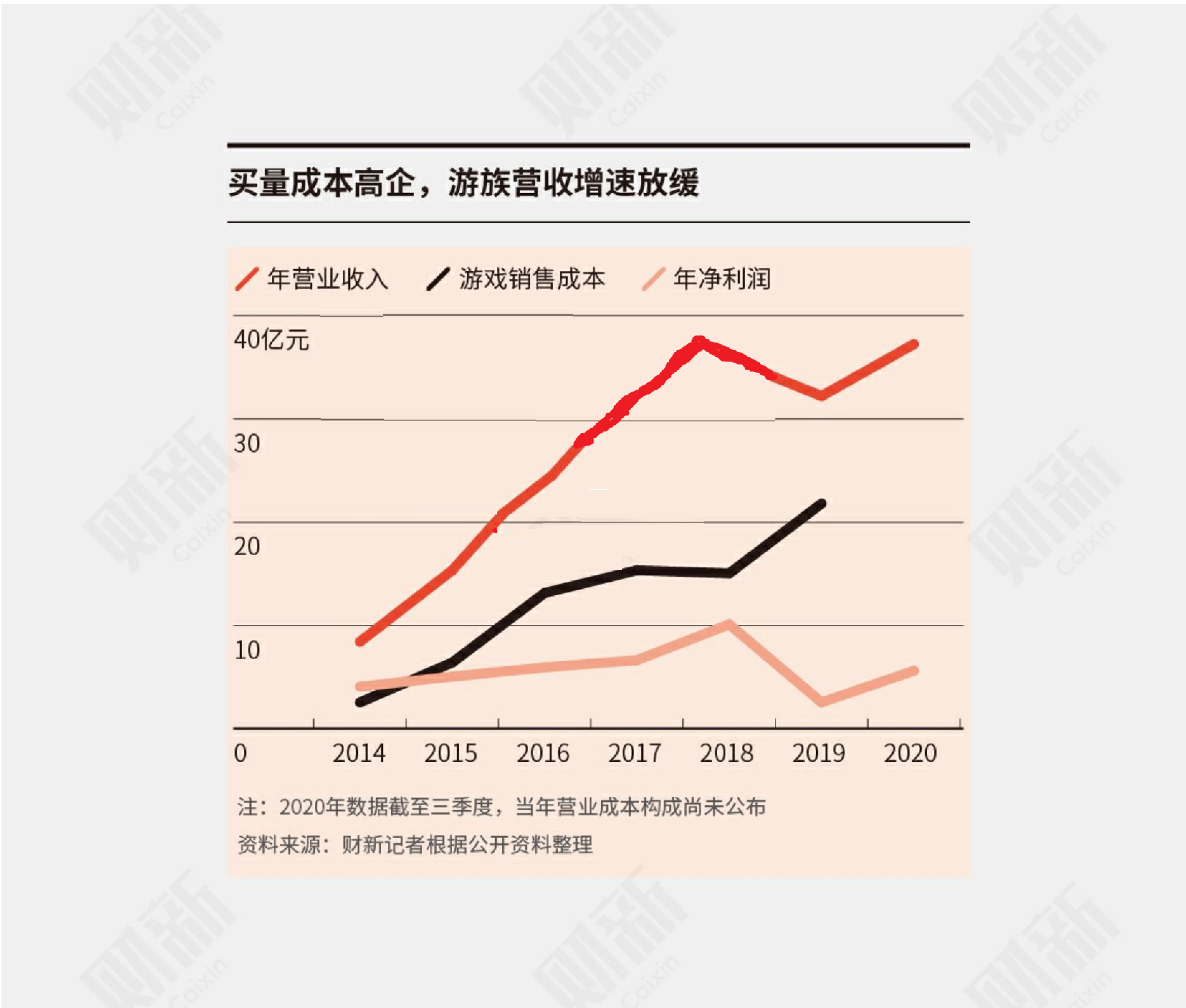
离奇命案的背后，是围绕中国科幻第一IP《三体》的一地鸡毛。实际上，一路自研开发碰壁的林奇，已开始转向外部合作之路，局面正渐次打开： 2020年9月，就在他生前三个月，与

国际流媒体平台奈飞（Netflix）达成合作，《三体》英文版电视剧版权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制作经验的团队，主创将来自《权力的游戏》《星球大战》等知名全球IP；此外，腾讯视频和林奇合作的《三体》网剧，拍摄工作也于近期杀青。

好时光逝去

上市不到一年，页游起家的游族靠手游《少年三国志》，在移动时代初期的游戏江湖站稳了脚跟。2015年，老牌游戏厂商完美世界的“大牛”老狼程良奇带队，改编家喻户晓的三国IP，《少年三国志》上线很快闯入苹果应用商店前三，20天流水成功破亿元，年创收近10亿元。依靠这一超级爆款，游族顺利完成三年业绩对赌。

林奇旋即开启了东南亚、日韩等海外市场的扩张，2017年，手游业务超越页游，同时海外收入也超越国内。2018年，游族业绩走到上市后的最高点，全年营收35.81亿元，净利润达10.09亿元。



点击查看大图

尝到了大IP的甜头，林奇开始了一系列版权收购。

2017年—2018年，中国科幻第一IP《三体》、盗墓探险类小说《盗墓笔记》、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被林奇收入囊中，从华纳兄弟手中拿到全球热播美剧《权力的游戏》的游戏改编权。

“当时公司手握几个精品IP，林奇觉得这个时候应该静下心来，提升产品的品质。”一名前游族管理人士说，林奇在参与产品测试时表达了做自研游戏的决心。

就在林奇雄心勃勃之际，中国游戏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政策冲击。2018年，中国游戏行业版号审查暂停，这意味着新游戏无法上线，即使上线也无法商业化。包括腾讯、网易在内的游戏大厂也“勒紧裤带”过日子，而游族等开发公司和游戏代理则面临生死考验。

2019年版号恢复后，游族业绩却差强人意。同时近年来游戏获客和分发成本高涨，《少年三国志》这类卡牌手游获客成本从几元飙涨至过百元。为确保排行名次，游戏行业普遍采用“自充”手段：“如果你进入前十，流量会对你进行倾斜，公司不得不用自己创建的账户登录游戏，一部分钱给了渠道，一部分钱又收回来，造成成本越来越高。”一名游族前员工透露。

2019年，游族共花费21.8亿元买流量，远超2018年的15亿元，游戏板块营收减少3亿元，毛利率跌去四分之一，净利润更暴跌了四分之三。为维持报表观感，游族将研发费用缩减了5100万元，掩饰难看的成本项。

游戏的渠道资源越来越向腾讯这样的超级巨头集中。游族2019年上线《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由腾讯独家代理。“除了腾讯，其他游戏公司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ARPU值（户均收入）。”上述前员工称。

游族的现金流波动相当大。2016年至2019年，公司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分别录得3.83亿元、13.21亿元、6.05亿元、12.5亿元。公司不得不持续向银行借款，其负债在三年内从19.83亿元增加到39.8亿元，有息负债占比达79.77%。

2014年开始，诸多游戏公司试水“影游联动”、IP多元开发，游族也不甘落后。林奇先后以个人资本注册成立了游族影业、游族置业，主营电竞和马拉松赛事的游族体育。他还通过游族置业在上海徐汇滨江西岸传媒港买地，投建总部“游族大厦”，账面由此多出一笔3.06亿元的银行长期借款。

大举购买版权，跨业经营和买楼，钱从哪里来？近五年，林奇累计质押所持游族网络股票129次，仅2018年就达57次；持股比例从2019年二季度末的34.84%降至目前的23.99%，累计质押股份数量1.72亿股，质押率为78.18%，对应融资额11.67亿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游族总市值才120亿元左右。

“林奇本身不是很在乎钱，但他愿意花钱实现自己的梦想。”一名接近林奇的公司管理层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一有需要，林奇就会选择质押股权。

公司负债水平逐年走高：2016至2019年，负债从19.83亿元增加到39.8亿元，八成是有息负债。

2019年7月起，此前一直增持公司股票的林奇，连续27次以竞价等方式减持股份，套现近7.97亿元。

“林奇认为游族应该专注自研，但他同时又在做很多事情，影业、体育、金融，都是布局生态的动作，做主业的精力可能不够了。”上述接近林奇的人士称。

《三体》“魔咒”

正是《三体》深深吸引着林奇跨出游戏圈，闯入电影圈。

“我们不要温良地来到这个（电影）行业。”2015年上海电影节期间，林奇在游族影业发布会上引用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句子，来阐释自己对影视IP的理解，并释放投资《三体》电影的消息。

发布会后两个月，美国传回《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消息，刘慈欣成为首次获得这一奖项的中国科幻作家，林奇的IP选品眼光得到验证。

游族影业的实体是游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由林奇个人投资成立。彼时，游族已拿到《四大名捕》等多部文学作品IP，但花销极大的授权费让林奇觉得不划算，因此萌生了做影视公司的念头，自己创造IP。

林奇找来曾为游族执导网剧《四大萌捕》的孔二狗（本名孔照祥），由其担任游族影业CEO。在此之前，孔二狗曾因作品《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走红，在影视公司小马奔腾当了三年的董事长特别助理，林奇看中的正是他的人脉和经验。

林奇给公司选定了最容易改编成游戏的两个方向：魔幻和科幻，在其中又分别选出《权力的游戏》和《三体》作为潜在的IP开发目标。林奇和当时拥有《三体》版权的张番番、宋春雨夫妇达成协议，由游族出品电影，张番番、宋春雨分别担任导演和编剧，刘慈欣在游族影业小份额持股，为作品提供创作支持。

《三体》要被搬上银幕，读者在网上一片欢腾，电影“未映先火”。电影预算2.2亿元，顺利融资2亿元，仅光线传媒一家就拿出8000万元助阵，时尚集团、腾讯、阿里影业以不到10%的份额跟投，项目同时还拉来大批品牌商业植入。

电影集结了冯绍峰、张静初、吴刚、杜淳等知名演员，于2015年2月正式开机，同年8月5日杀青。原计划2017年上映的这部电影，直到现在官方都未更新进展。

多名游族影业员工称，电影粗剪版本低于预期。“张番番坚持当导演，但他在这类电影上没有太多经验，撑不起这种体量的作品。”一名游族影业前员工透露，导演和特效导演的争执成了拍摄过程中的家常便饭，团队只好不断从中协调，“纠结的问题往往是这部分到底该不该用特效”。

特效是决定科幻电影视觉感染力的命脉。完成实拍时，电影项目仅花去了一半的预算，还有1亿元专门留给特效制作，游族影业接触了十多家国内外特效公司，但都因为成本或难度告吹。实拍完成后的两年，整个游族的高层都在想办法把《三体》完成，公司甚至专门成立美国分公司对接外部资源，但因为对美国电影产业不够熟悉，“交了不少学费”。

就算是拿下47亿元国产科幻电影票房冠军的《流浪地球》，也曾因大幅度投入特效而让制作团队赔钱，前期与之合作的两家物理视效公司，一家倒闭、一家重组。2019年2月，刘慈欣在和美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对谈时提到,“中国的科幻电影没有像美国那样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做起来很艰难。”

由于长期没有实质进展，“三体电影”官方微博评论中挤满了影迷的关切：“电影怎么样了？”实际上，电影杀青后不久，包括孔二狗在内的游族影业高管和项目团队已在失望中散伙，原有70余人的团队流失过半，两年内换了三任CEO。在采访过程中，财新记者曾接触部分剧组成员，得到的答复多为“那是段不愉快的经历，不愿意谈。”

除了《三体》，游族影业也在尝试电影投资。2014年，吴宇森导演的《太平轮》成本达3亿元，仅收获2亿元票房，林奇投资3000万元后巨亏，还和8亿元保底发行的乐视影业扯上了官司。两年后，林奇再花1200万元投资赵本山主演的《过年好》，占30%以上份额，但也因为票房不理想败北。林奇在电影投资上连连失手，据上述游族影业前员工透露，2016年中，游族影业账面亏损超过1亿元。

2017年，曾在橙天院线担任高管的伊简梅接下游族影业CEO的位置，为游族带来《奇门遁甲》《一出好戏》《恐龙飞车》等投资项目，但收益甚微。上述游族影业前员工透露，伊简梅院线出身，并不擅长IP经营，和林奇思路有较大差异。“赚到钱的也就是《和平饭店》《一出好戏》这种参投项目。”

彼时，伊简梅裁掉了《三体》电影项目的一些老员工，公司作剧本研发的电视剧团队则集体出走，游族影业元气大伤。

“林奇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热爱而做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会出那么多钱。”上述游族管理层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作为《三体》的忠诚读者，林奇有过无数幻想，希望把它做成像《星球大战》和漫威那样的电影大IP。“可能直到前不久，他的思路才真正清晰起来。”

《三体》原著宇宙观宏大，情节复杂。时至今日，这部近80万字、人物超过100余人的长篇科幻小说，在获得“雨果奖”之后的五年中鲜有衍生作品，目前有改编同名舞台剧以及动画番剧《我的三体》，但迟迟未能登上银幕和荧屏。

交了巨额“学费”后，林奇逐步意识到无法独立完成这部作品的影视开发，开始尝试寻找外部合作。2020年9月宣布和全球最大在线视频平台奈飞展开英文版权合作。

12月，腾讯视频也宣布《三体》网剧杀青，导演是曾经打造过《老九门》的白一骢，版权

来自林奇。一名《三体》网剧制作方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仅仅剧中一个聚会场景的演员站位，导演组就参考了数十种宗教仪式的礼仪，“视觉化难度相当大，我们只能尽力满足影迷的预期”。

“谈下奈飞，等于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到了最后五千里。”上述接近林奇的人士说，“如果留给林奇的时间再多一些，等到这些影视剧都悉数亮相，或许大家对他的评价又会有所不同。”

许垚的角色

2017年，打算做成网剧的《少年三国志》项目因网游题材改编限制未能通过申报，又给林奇浇了一盆冷水。

在主创悉数离开后的一年间，游族影业仍在为特效和补拍的各种事情奔波。一名前员工透露，电影项目每周开周会，但更新进度都不太乐观，“直到2018年，一直推进的补拍没了消息，大家就觉得项目可能遥遥无期了。”

2017年，林奇下决心要把《三体》版权拿到自己手里。他找来游族高管崔荣、影业公司总裁张大伟一起参与到同张番番的版权收购中。历时一年，耗资超过1亿元买到了《三体》版权。而在三年前，张番番夫妇成立的公司百星社从刘慈欣手中拿到包含《三体》改编权在内的全球范围永久性全部权利，对价不过几十万元。

财新记者了解到，许垚在后期参与到了版权收购中。不过这并不是许垚第一次涉足游族影业的业务。《三体》电影被“散伙传言”缠身时，许垚就曾被林奇搬来当救兵，配合处理危机公关。许垚的专业能力很快得到认可。“律政精英的感觉，思路清晰。”一名接近林奇的人士说，许垚能很快听懂林奇的意思，“别人不一定能听懂，但是他可以”。

许垚与林奇是同年生人，2003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前往法国、美国留学。2017年，林奇在为《三体》版权发愁时，许垚经复星高管推荐，出任游族首席风控官，执掌公司法务和政府关系事务。

为消弭电影没有按期兑付的负面影响，林奇成立一家叫做三体宇宙的新公司专门负责《三体》版权，并在这家公司给了刘慈欣近10%的股份，准备把作者也打造成IP。林奇个人控制三体宇宙约70%股份。“大刘很支持林奇，但后面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上述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三体宇宙成立之初，林奇曾准备把刘慈欣的另一部科幻小说《带上她的眼睛》也改编成电影，最终未果。

2018年中，伊简梅从游族影业黯然离场。林奇将游族影业交给许垚打理。半年后，许垚不再兼任游族网络董事，只专门负责《三体》项目。许垚同时带来了一部分法务专才，为《三体》解决了不少纠纷。

彼时，《三体》IP开发陷入了原地打转的僵局，令员工苦恼的是，公司手中是大名鼎鼎的《三体》项目，但从来没有什么声响出来。《三体》曾向线下发力，开了一家主题咖啡厅，还和作家韩寒的餐厅“很高兴遇见你”联名。最终咖啡店倒闭，联名餐厅也因为和原著元素关联甚少而籍籍无名。几年下来，能持续下去的线下商业项目仅仅是一部授权的舞台剧和广播剧。

版权市场逐渐走上正轨，《三体》稍见转机。“2015、2016年IP授权不成熟，现在知道怎么玩了，品牌方也会逐渐参与进来。”一名IP衍生品从业者告诉财新记者。许垚在任期间，三体宇宙找来了曾在迪士尼负责IP开发的人才，以更商业化的角度注入IP。《三体》先后吸引了服装品牌361°、中国银行信用卡、Thinkpad、vivo手机做联名，2019年起着手打造《三体》时空沉浸展。一名游族影业员工评价：“许垚在的时候，《三体》的IP开发起码要比之前健康。”

但在这时，林奇观念转变，对《三体》不再局限于自己改编IP并输出影视作品，三体宇宙开始“走出去”。这或是林、许之间滋生嫌隙的原因之一。

腾讯作为此前电影的投资方，有意将原作改成网剧。2019年2月，林奇和腾讯进入商定剧本阶段，但谈判并不顺利。据一名前员工透露：“腾讯一开始不愿让游族影业有太多参与，在分成比例上要求也高。”但双方最终还是签下了合作协议。

一些迫不及待的书迷开始自发创作《三体》的互联网影视作品。B站上一部由粉丝"神游八方"自制的动画番剧《我的三体》吸引到林奇的目光，其第一季播放量超过2000万次。林奇将《三体》改编权直接授权给原作者，从第二季进入到制作中。

2017年，由亚马逊牵线，林奇在好莱坞接触多家影视公司后等来了奈飞。2020年9月1日，奈飞（Netflix）宣布制作《三体》电视剧的消息立即被送上热搜。林奇和三体宇宙副总裁赵骥龙作为监制方，现身官方公布的英文剧集主创名单，但未见三体宇宙总裁许垚的名字。上述接近林奇人士透露，三体宇宙和奈飞的合作是两年前林奇带着几个年轻人谈下来的，"许垚的贡献几乎为零"。

"或许从那时起，林奇就不打算用许垚了。"该名接近林奇人士推测。这位曾被认为最能读懂林奇的游族影业高管，却未能参与到最具价值客户的谈判中。

多名接近林奇的人士认为，游族影业的问题在于用人。"事实证明，高管一直都没找对。"上述前游族管理人士评价，林奇在进军影视行业的时候过于自信，游族影业在专业度上有缺陷，本身就难以吸引到真正有能力的影视人才，"林奇其实一直没找到真正懂自己的人"。

林奇入院期间，坊间曾有许垚因"欠下巨额债款而萌生杀心"的传言。财新记者就此向多名接近林奇的人士求证，得到的答案均为"不太可能"。"游族影业用的还是林奇自己的钱，花在哪里他不可能不知道。"一名游族前影业员工认为，"况且游族影业不至于花去20亿元。"

一名接近林奇的人士认为，项目亏钱在林奇看来不是大问题，林奇曾对一名下属说过，"你的钱亏了还不上，到底还不是我的钱？"意即他能为业务亏损兜底。

没有林奇的游族

林奇逝世后的第三天，公司对外宣布管理层调整：游族公司董事许彬暂代董事长职务，副总经理陈芳暂代总经理职务。陈芳继续负责业务线和公司战略线，许彬负责资本市场、投资等，二人的职责相较此前变化不大。公司业务战略、重大事项等由管理层集体决策。

暂代林奇职务的许彬、陈芳并未持有公司股权。林奇在游族网络持股23.99%，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而在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其他个人股东无一在"董监高"中任职。

接近林奇的人士透露，陈芳是公司二号人物，2018年作为专业骨干引入。陈芳先后在盛大游戏和昆仑万维担任高管，曾是昆仑游戏的CEO。

2020年，从公司成立之初就和林奇联手的崔荣、陈礼标先后离任。崔荣自己的游戏公司在上市前被林奇吸纳到游族，而陈礼标与林奇经历相似，"林奇和早期高管之间的信任度都很高。"一名接近林奇人士透露，即使后来从外部找来新人加盟管理团队，林奇对他们也足够信任，给了很多时间。

一年之前，游族流失了曾经撑起公司半边天的两位研发主力。一手缔造《少年三国志》的"老狼"程良奇和主导《天使纪元》的王鹏飞双双离开游族，另起炉灶创业，王鹏飞的吾未网络接受了林奇投资。

"林奇是个讲道理的老板。"一名游族影业人士说。林奇在不少离职部下的创业公司占股，其中包括前游族影业总裁张大伟后来加盟的陆川导演工作室。"林奇知道我们委屈，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支持我们。"

但林奇的另一面并不受人欢迎。多名员工评价，林奇性格爽利，面斥下属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些员工在被骂之后，直接被叫去结工资走人。"一名前员工认为，这直接导致了公司流动性大，因为公司管理层身上普遍带着林奇的影子，"喜欢随便开人，强压式的工作习惯，不是特别友善"。

"游族2000多人，每年离职员工超过800人，仅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就在三年间换了七八个。"一名游族员工透露，"新人培养不出来，只好去买人才。"在游戏这样的轻资产行业，人才是各家公司不惜重金的目标，一名游戏制作人的年薪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但提升的人力成本不一定能换来符合预期的产出。新入局者在爆款出来后，流量变现力惊人。一名游戏行业人士告

诉财新记者："2017年左右，米哈游200多人，和游族2000多人赚的钱一样多。"

过去五年，林奇在游族之外任职的公司数量从5家增加到17家，据财新记者了解，林奇在游族影业、游族体育等个人投资的公司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其手中质押的1.72亿股股份将在未来一年内到期。他这些庞杂的资产和债务未来将如何处置，尚不得而知。

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认为，鉴于林奇逝世事发突然，其所持公司股份继承以及未来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尚不明确，公司面临一定的治理风险，因此将游族网络公司主体及"游族转债"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本资源仅供试读，如喜欢需要更多期，请去官方渠道购买，试读微信公众号：六六精品阅读

近年来，独立游戏公司频频曝出丑闻。就在林奇逝世的同一天，和游族同属第二梯队的独立游戏公司恺英网络（002517.SZ）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悦，因犯操纵证券市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游戏产业第一股掌趣科技（300315.SZ）实控人姚文彬，早在2016年就减持套现10亿元全身而退，公司在经历一轮疯狂并购后，2018年商誉减值超过20亿元；同样在并购后进行巨额商誉减值的还有天神娱乐（002354.SZ），其亏损额一度超越市值，股东还在网上公开曝出内讧。

上述接近林奇的人士感慨，即使不断有中小游戏厂商被巨头收购，林奇从未想过要卖掉游族。12月29日，游族网络管理层在面向机构投资者的电话会上表态，将以"更好的"集体管理延续游族的经营；并透露，从业务发展或规模增长看来，2020年是游族历史上做得最好的一年，但利润有一定滞后性。在2021年，公司将坚持卡牌游戏的核心赛道，同时关注老游戏的利润产出。公司同时宣布，《三体》游戏项目正式启动，此后将陆续展开两款《三体》IP授权产品的开发，并同外界合作。▫

财新记者张宇哲、实习记者田宇辰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许金玲

财新周刊｜卡车变道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在新一轮竞争中，不合规、不环保、跟不上新技术迭代的卡车将被市场淘汰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安丽敏

2020年，卡车创造了奇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月11日发布数据称，卡车已连续八个月刷新当月销量历史纪录。行业预计，全年商用车销量有望超过500万辆，其中卡车占九成以上。

卡车上市公司大都业绩飘红。中国重汽（000951.SZ）第三季度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234.5%，前三季度累计增长近七成。福田汽车（600166.SH）前十个月重卡销量同比增幅达83.5%。

商用车关键零部件企业采埃孚全球市场负责人对财新记者称，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了全球卡车销量，中国市场需求占据半壁江山，拯救了全球市场。

商用车主要包括九座以上的客车和卡车。卡车依据长度和载重量不同，又划分为重卡、中卡和轻卡等种类。按照2016年施行的国家标准，卡车最大载重量为49吨。

多重因素推动卡车销量暴涨。采埃孚商用车控制系统事业部副总裁、亚太区总裁于素杰认为，行业加速淘汰“国三”排放标准柴油卡车，主管部门治理货运乱象，监管政策刺激了新增需求。此外，为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国家出台一系列措施稳定经济发展，如免缴高速通行费、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等，卡车销量因此受益。



点击查看大图

这轮卡车行情与行业整体转向有关。卡车是生产资料，“多拉快跑”才能赚钱。监管缺位时，竞争失序。国内公路运输价格严重偏低，司机尽可能降低使用成本，企业提供可以超载的车型。如此往复，形成恶性循环。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出现。近年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中，多有超载卡车的身影。司机为了省钱，使用排放不达标车型和燃油，卡车尾气污染也远高于乘用车。

从2016年开始，一系列监管措施逐步推出，行业技术标准不断加严。近期在一场行业会议上，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原董事长李大开称，国内还有九成卡车在使用国际市场淘汰的鼓

式制动器，使用手动变速箱；现在乘用车技术扩展至卡车，例如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盘式制动器和自动变速箱等，燃油卡车正在加快升级。

采埃孚方面称，2020年可以说是中国卡车的自动变速箱元年。采埃孚在全球商用车自动变速箱市场占有率接近一半，其他关键零部件也属于高价值产品。其提供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卡车技术装备水平的相对落后：当前，中国单车使用采埃孚零件的价值为300美元，意味着产品定位相对较低，而欧洲单车为1700美元。采埃孚希望两地市场可以逐渐缩小差距。

产品定位高端的外资卡车企业也看到了机遇。中国汽车行业正在逐步开放，2020年对商用车外商投资解除股比限制。1月，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增持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股权至100%，公司名称变更为现代商用汽车（中国）有限公司。11月28日，斯堪尼亚宣布在江苏独资建设重卡工厂，计划2022年投产。12月2日，奔驰母公司戴姆勒宣布，将在中国合资公司即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奔驰品牌卡车车型。

与乘用车领域合资品牌产品占据中心地位不同，外资企业卡车产品长期无法进入主流。一名卡车行业资深人士认为，此番外资产品大举国产，将影响长远市场格局。

行业已经开始探索新能源和自动驾驶技术在卡车领域应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欧阳明高认为，换电重卡在特殊场景有竞争力。他判断，新能源卡车元年即将到来。

在自动驾驶方面，多家着力于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公司，开始扩展卡车业务。小马智行在11月上海进博会期间展示了高级别卡车自动驾驶软硬件系统。12月，小马智行获得广州首张自动驾驶卡车测试牌照。

层层外力推动，卡车正在走上一条与以往不同的发展道路。

监管迫使转型

2020年10月4日，吉林省松原市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轻型货车所载16人全部死亡。工信部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联合约谈涉事车辆生产企业，称北汽福田时代牌轻型货车存在"大吨小标"违规生产销售问题。

"大吨小标"和"小吨大标"都是卡车货运领域常见现象。前者是指卡车重量造假。例如车辆实际载运能力为30吨，但车辆各项信息显示登记为20吨。这样可以减免部分依据卡车重量收取的费用。"小吨大标"则是载货重量造假，原本只能运输10吨货物，车辆登记信息却显示为12吨，通过实际上的超载赚取更多运费。

在超载猖獗的地方，"百吨王"并不鲜见。2019年10月，无锡一座高架桥垮塌，事故直接原因即两辆超载的大卡车压垮桥面。事后查明，两辆卡车实际载货量均超过150吨。

行业乱象加之各类非法改装，使得卡车成为道路上的"危险品"。有经验的司机都会避让大卡车。交通运输部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发生的较大以上道路运输事故中，卡车肇事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总数的70%和64%，同比上升14个和10个百分点。交通运输部称，卡车整体安全性能不高，是制约道路运输安全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2016年卡车计重收费开始，国家不断加大对超载的打击力度。2020年9月，交通运输部官网数据显示，高速公路平均超限超载率已由2004年80%左右下降至目前的0.5%以下，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严重超限超载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2020年4月，国务院安委会印发《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2年要基本消除货车非法改装、"大吨小标"等现象。7月，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严厉打击货车"大吨小标"、倒卖合格证等行为。

在车辆技术层面，交通运输部于2018年发布了《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多项强制技术标准分别于2020年9月1日和2021年5月1日起实施。

于素杰介绍，新的技术标准要求车辆安装多项安全智能辅助系统，包括制动防抱死装置、车辆电子稳定控制系统、车道偏离预警、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等，标准中最严苛的是要求牵引车辆安装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她告诉财新记者，欧洲已经实施类似强制要求，但中国标准有所不同。欧洲标准中，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只需要监测其他车辆并采取相应措施，安装一个传感器就能满足要求。中国标准除要求监测车辆，还要求监测行人，这极大增加了技术难度。

在环保方面，卡车尾气排放标准不断升级。重型卡车“国六”标准计划于2021年7月全面实施。“国六”是指国家第六阶段尾气排放标准，与国际通行标准基本看齐。

中国公路货运量是美国的3.7倍。生态环境部向财新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公路运输单位污染物排放是铁路的12.5倍。公路货运主力柴油卡车，也是机动车整体排放量的主要贡献者。一辆超标重型柴油车相当于200辆小汽车的排放量。

为了加速淘汰老旧卡车高排放车型，2018年7月，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对柴油货车提出升级要求。按照计划，2020年底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要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中型和重型柴油货车100万辆以上。

计划还要求，重点区域要采取经济补偿、限制使用、严格监管等方式，大力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除了上述地区，重点区域还包括长三角地区。

这些强力措施正将卡车从恶性竞争中推回正轨。卡车产品竞争焦点，从以往的发动机排量和超载能力，变为轻量化技术、百公里油耗、车辆出勤率等新标准。这对国内卡车企业来说是一套新概念。

外资加快布局

中国现代汽车工业是从商用车起步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一汽和东风集团生产中型卡车，中国重汽生产重型卡车。中国重汽产品技术主要来自奥地利斯太尔。

熟悉中国卡车发展历程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起初中型卡车是主流产品，主要供应给军队，重卡市场需求不大。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经济飞速发展，工程建设和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猛增，商用车重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当时车型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筑工地上使用的自卸车，另一类是运输大宗货物尤其是煤炭钢铁的牵引车。

前述人士说，这两类车型都要求“皮实耐用能装”。市场需求反馈给生产企业，企业不得不对产品进行特殊加工，使其适合超载。“如果你的产品不能超载，或者因为超载导致车辆出了问题，客户反而会找企业索要赔偿，转而寻求其他更能超载的产品。”

中国企业在追求重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装更厚的钢板和车桥，发动机排量一路攀升至13升；其他方面能省则省。

在这个阶段，外资卡车产品售价太高，在中国根本无法打开局面。一名外资卡车企业销售人员告诉财新记者，他们的主要客户局限于少量危化品运输，或者对运输质量更加在意的大型企业。一些外资卡车企业仿照乘用车模式与中国企业组建了合资公司，例如曼恩（MAN）与中国重汽、戴姆勒与北汽福田、沃尔沃与东风商用车等。

这些卡车合资公司与乘用车合资公司状况迥异，中方话语权更强，一般采取引入外方技术等方式开展合作，并不直接引入外资品牌整车产品。实际上，外资卡车企业没能通过合资方式找到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

中国卡车发展道路转换，为外资车企打开了机遇之门。

东风集团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帆称，物流行业正在发生变革，车主主体将由散户逐步过渡至企业用户。他认为，卡车正从运输工具向运营工具转变，用户购车更加追求TCO（Total

Cost of Ownership）和一站式解决方案，而不是注重单一购车成本支出。现代物流模式高效运作，新技术介入，也要求车辆出勤率更高，故障率更低。

此外，王帆指出，卡车司机群体年龄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现在“80后”年轻司机占比达到七成以上，他们对车辆的舒适性和个性化提出了新要求。

斯堪尼亚看好中国市场前景。该公司书面回复财新记者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卡市场，2020年中国市场更是一枝独秀。中国商用车市场已经出现高端化、合规化的明确趋势，高端产品会受到市场欢迎。

行业资深人士认为，合资卡车企业会推出不同定位产品系列，上下通吃。戴姆勒与北汽福田组建的合资公司成立于2011年，至今还没有引入奔驰品牌卡车。双方合作推出了“欧曼”品牌，相较北汽福田其他卡车品牌较为高端。2020年前三个季度，欧曼累计销量达10万辆，同比增速超过60%。

12月2日，戴姆勒和北汽福田共同宣布，计划两年后建设一座新工厂生产奔驰品牌卡车。这些产品国产后，将具备一定的价格竞争力。

王帆判断，卡车市场竞争将更加精细化，在新一轮竞争中，弱小企业跟不上法规升级等挑战，将会逐步掉队，最终淘汰。

新技术试验场

乘用车领域兴起的电动化和智能化风潮，正在吹向卡车和工程机械等领域。

2020年12月，国家发改委称，产业发展司调研了新能源重型卡车及“换电模式”推广应用情况。河南一家矿业公司使用纯电动重型卡车，一次充电可满足八小时运输需求，能耗及维修费用可降低50%以上，使用过程完全实现零排放。北京一家使用新能源重卡和工程机械的公司，还投运了三座换电站，几分钟便可完成电池更换，可提高运营效率，节约运营成本。

欧阳明高看好换电重卡前景。他介绍，纯电动卡车面临续航里程和电池成本两大难题，换电模式是一种解决方案。电池租赁运营方可成立“电池银行”。一方面，电池量比较大，电池运营方可以从厂家以较低价格提货；另一方面，大量的电池成为储能装置，运营方可以从电力交易中获益。

欧阳明高认为，卡车要算经济账，油费是其生命周期中最大的成本，电动卡车最大的优势就是使用成本低。换电模式攻克电池价格和续航里程两大难题后，电动卡车就具备了和柴油卡车竞争的实力。

2020年9月，相关协会、院校和企业组建了“中国电动重卡换电产业促进联盟”，主要工作即推动换电卡车标准化。

近期已有多家产业链巨头投入“换电重卡”项目。上海融和电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下称“融和电科”）前身为中电投的融和租赁新能源汽车事业部，是国家电投集团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锂电池龙头宁德时代（300750.SZ）也是公司股东。该公司目前已建成十座重卡换电站，服务超过700辆换电重卡。

宁德时代在2020年7月与北汽福田合作了换电重卡车型，近期又与宏大爆破等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为矿山领域重卡和工程机械提供电动化解决方案。

卡车领域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新能源技术是氢燃料电池。欧阳明高判断，氢燃料电池更适合长途运输。在氢燃料产业中，氢气瓶储气增压和生产成本降低是重要环节，需要大型能源和化工企业参与。

事实上，国内对氢燃料电池技术的探索也集中于卡车。12月22日，博世中国与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资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和销售燃料电池解决方案。庆铃汽车是一家高端轻卡公司。6月时，丰田汽车与五家中国车企签署合资合同，成立联合燃料电池系统研发（北京）有限公司（下称联合公司），主要研发商用车氢燃料电池系统。

自动驾驶是汽车行业革命性技术，但真正的无人驾驶乘用车技术落地困难。脱胎于谷歌的Waymo已经研发自动驾驶技术十余年，至今只推出小规模示范运营项目。

近年来，部分企业将目光投向卡车自动驾驶领域。12月17日，中国国内初创企业主线科技宣布，联合天津港、中汽中心共同打造天津港港口自动驾驶示范区，获得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批准。三个月前，主线科技与天津港合作的港口无人驾驶集卡实现了商业化运营。

赢彻科技成立于2018年4月，选择从较低级别自动驾驶入手，尽快实现商业化。赢彻科技的投资者包括G7、普洛斯和蔚来资本，于2020年4月完成1亿美元融资。同月，赢彻科技宣布与东风商用车合作的自动驾驶卡车样车通过验收。

2020年，卡车销量暴涨以及各路玩家进场，带来市场将持续高速增长的错觉。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专家委员会会长戴定一认为，长远来看，随着主管部门不断推进合规化，公路运输成本会有所上涨，公路干线物流将面临铁路和水路运输挑战。

王帆认同上述判断。他认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物流体系，当前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例还是偏高，中长期看，公路货运周转量将出现下降态势，卡车销量不会持续高速增长。他预计，2021年中国商用车市场整体跌幅为10%。

资料视频：2017年11月16日，特斯拉CEO马斯克发布了备受期待的电动卡车，他表示，该车的外形设计酷似一颗“子弹”，内室方向盘位于驾驶室中间，续航能力最高可达500英里，即使满载8万磅货物，从0加速至60英里只需20秒。

版面编辑：许金玲

专栏｜实现碳中和承诺需要“大棒和胡萝卜”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相比仅依靠各国承诺和自愿遵守，更可靠的让各国实现碳中和承诺的方式是协调构建全球统一的碳关税和碳税制度，契机就在眼前，莫让其溜走

文|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
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拜登将于2021年1月下旬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望积极起来。中国领导人2020年9月作出了中国将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日本、韩国随后也作出类似承诺。目前已有超过120个国家给出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

要推动这些承诺落地，成为真正的应对气候变化成果，需要有“大棒和胡萝卜”的政策激励，这些政策还可以为其他国家树立减排目标创造激励。虽然新冠疫情引致的封锁措施令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但类似疫情前的高排放量将会在2021年卷土重来。

如何才能以及时、有效且公平的方式真正应对气候变暖的危局？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国需要将人均碳排放量从高出中国当前水平约200%减少到约80%（从每人每年约18吨减少到10吨），德国需要将人均碳排放量从高于中国约80%降低到低于中国水平（从每人每年约10吨减少到6吨），中国则需要在2030年之前让其人均碳排放量达峰。

对那些常常听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人来说，这些数字可能有些意外。从近年的碳排放量来看，中国确实在全球排第一位，美国排第二位，但从人均排放量看，德国人一生的碳排放量要比中国人高出80%；美国人则比中国人高出200%。

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并不是所有公民都充分意识到自身所负有的责任。原因至少有三点：

首先，我们经常听到发达国家政客和媒体宣扬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这是事实，但并非事实的全部。

其次，欧美在控制更易被肉眼观察到的颗粒状污染物（PM）方面比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但这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并非一回事。

第三，富裕国家的进口产品通常比其出口产品的碳强度（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更高，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居民高碳生活方式中，有一部分碳排放“外包”到其他国家。无论经常账户处于平衡状态还是有较大贸易逆差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比如美国维持着碳强度远高于其国内活动碳强度的生活方式。

因此，实现碳中和承诺，首先需要所有发达国家力争2050年前在消费端实现碳中和，而不仅仅是在生产端。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应尽早做到这一点。

中等收入国家应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碳强度通常要高于其进口品的碳强度，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生产端的净零排放比消费端更难。国际社会应向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条件是它们承诺力争在2075年前实现碳中和。

相比仅依靠各国承诺和自愿遵守，更可靠的方式是设计新的“大棒和胡萝卜”。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欧洲、北美、中国、日本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协商一致对碳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并在本国国内对碳排放征收碳税。这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提高排放温室气体的成本。碳关税和碳税所产生的收入不仅可以用于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也可以投入研究以降低碳捕获和存储的成本，或是支持因低碳转型而利益受损的群体。

对中国来说，碳关税会降低碳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可能倒逼中国加速向低碳生产转

型，以实现碳排放承诺。如果主要经济体联手推出的碳关税能变为全球高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均参与的全球性碳关税体系，还会减缓中国高碳产品出口份额流向其他环境标准较低的出口国的速度，从而促使中国更有动力加快生产和经济向低碳转型的步伐。

毫无疑问，缺乏美国和中国参与的碳关税体系将无法有效涵盖足量的全球进口和消费量。美国候任总统拜登的胜选和各国碳排放承诺给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一个契机，我们不该让它从手边溜走。□

版面编辑：许金玲

财新周刊｜信用评级如何去泡沫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破解评级虚高、区分度不够等问题，需强化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和问责；也需要完善制度环境，改善债市分割、隐性行政干预等缺陷



2020年12月29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中诚信国际予以警告、暂停银行间债务类工具相关业务三个月的自律处分。此外，中国债券市场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缺陷、挥之不去的行政干预等，是评级泡沫难去、评级悬崖常见的深层原因。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张宇哲

中资评级行业龙头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诚信国际"），因对河南国企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永煤控股"）评级的违规行为，吃下一张颇为严厉的罚单。

2020年12月29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公告称，对中诚信国际予以警告、暂停银行间债务类工具相关业务三个月的自律处分，并责令其对本次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整改。

此前，2018年8月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国际"）因在企业评级中出现严重的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等违规违法行为被停业整改一年，最后从股权到管理层都进行了彻底的重组；2020年12月中旬，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下称"东方金诚"）被停业整改三个月，且原总经理金永授等人因涉嫌腐败等被移交司法；而中诚信国际一直是本土评级机构里相对最为专业和规范的一家，此次是因为被认为在永煤案评级中未能尽责而被罚。

一个多月前，AAA评级的永煤控股信用债意外违约，引发债市震荡。违约后第二天，中诚信国际才将永煤控股的主体信用评级由AAA直接降至BB，未能体现评级预警功能；加之近期华晨汽车、清华紫光集团等多家AAA级国企连续违约，引发债市对评级预警功能的质疑。随后，交易商协会宣布对主承销商、中诚信国际、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中介机构启动自律调查。

交易商协会公告称，中诚信国际为永煤控股、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河南能化"）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违规行为包括：一是未按相关自律规则对永煤控股开展实地调查访谈，未对永煤控股管理部门及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进行现场访谈；二是对了解到的永煤控股或河南能化拖欠薪资、偿债安排、关注类贷款等异常情况，未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调查核验，未能有效揭示信用风险相关信息；三是质量控制等内控机制未有效执行，合规部门监督审查不到位。

据财新记者了解，监管部门原处罚力度更大，经中诚信国际申诉后才改为现在的处罚。12

月28日，监管与中诚信国际就处罚事由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间。

第二天，自律处分公告发布当天傍晚，中诚信国际称，已收到交易商协会有关“永城煤电”项目对公司的自律处分决定，公司表示诚恳接受；已就“永城煤电”事件在第一时间启动自查工作，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并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全面整改。

评级虚高、区分度不够、跟踪评级不及时、风险预警功能弱等现象，正是当前监管部门强化评级行业监管的重点。

2020年12月3日，交易商协会发布《2020年第三季度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下称《通报》）显示，针对监测到的评级动作滞后等情况，协会分别对中诚信国际和大公国际进行约谈，强调评级机构应持续监测影响受评对象信用水平变化的风险信息，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所给予的评级结果应有效反映信用水平，发挥信用评级的风险预警作用。



12月11日，央行组织召开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座谈会强调，要加强债市评级行业监督管理，强化市场纪律，推动评级技术的进步，提高评级质量，提升信用等级区分度，真正发挥评级机构债市“看门人”作用。

也有资深评级业人士指出，要解决中国评级行业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强化对评级机构职业操守和尽责的监管，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中国债券市场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缺陷。“制度环境是否能做到位，能否保证评级机构真正独立，有没有有效手段解决各方力量对评级的干预，这是问题的关键。”

评级悬崖频现

在国际评级机构看来不可思议的“评级悬崖”现象，近几年在国内债市频现。

“评级悬崖”，即从一个较高的评级垂直下调到低评级。例如，紫光集团私募债违约一周前（2020年11月12日），中诚信国际才将其主体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此后相关主体评级一路断崖式下调，11月16日又从AA下调至BBB。又如，在华晨汽车集团信用债违约后一个月之内，大公国际和东方金诚对其主体信用评级也从AAA级一路下调到CCC。

2020年10月10日，在永煤控股违约仅一个月前，中诚信国际在跟踪评级中还给出了AAA的主体评级。本应提前预警的评级信号，为何失灵？

据财新记者了解，此次交易商协会调查发现，中诚信国际的问题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跟踪评级没有去一线核实；二是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提供的信息没有合理质疑。“对了解到的永煤控股或河南能化拖欠薪资、偿债安排、关注类贷款等异常情况，未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调查核验。”交易商协会前述公告称。

“中诚信国际已经按照行业内的通常操作尽职履职。”一位接近中诚信国际的知情人士解释，此次未能及时发现永煤控股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疫情限制了员工出差，2020年的跟踪评级未能去现场调查；在此前的现场调查中，中诚信国际曾向企业提出过关于拖欠薪资等问题，但被企业否认，而没有企业协调安排，评级机构无法直接与企业一线员工交流核实。

该知情人士透露，评级人员去了位于郑州的企业总部，但未去一线现场。通常首次评级会去一线现场，但跟踪评级很少会去一线核实，“这是行业普遍现象”。

一位国际评级公司资深分析师看来，在国际上，跟踪评级的现场调查不是必要的。“难点在于，评级机构要能事前觉察到与一线员工访谈的必要性。”

在永煤控股债券违约之前数月，有永煤员工在一些网络论坛上爆料数月未发工资。“这说明永煤控股的现金流已现重大问题，如果觉察到这个问题，发现风险判断跟原来的预期趋势不一致，就应合理质疑，通常这时评级人员会向企业管理层提出看现场。现场指工厂作业一线，不仅是企业总部。”前述国际评级公司人士称，若企业拒绝安排，就相当于这个疑问没有得到解决，这单业务就做不了；但如果评级人员并未明确要求访谈一线员工，这属于缺乏经验、操作失误。

一位资深债市人士更指出，像中民投和海航这种早已爆发流动性危机的企业，“已有多期债券违约，至今还维持着AAA评级”。

中民投和海航集团均由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出具主体信用及债项评级。早在中民投密集违约的2019年4月，中民投的中债隐含评级已从2018年3月的AA-，经过两次调整降低至C。中债隐含评级由负责编纂各类债券指数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推出，根据市场价格信号的综合评估得出结论。

“中债隐含评级和投资者付费的中债资信，都远远好过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现在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一定程度上已经失灵，基本上等到企业不还钱时才调低评级。”一位债券市场人士说，比如2020年11月20日，在冀中能源的债券到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公国际、东方金诚就在发行人现场盯着，如果下午4点还不打钱还债就调低评级。

“靠蹲点判断是否下调评级的确可悲。”前述接近中诚信国际人士表示无奈，“评级下调滞后是行业缺陷，但也是体制因素、经济结构因素、隐性行政干预等综合影响的结果，评级机构只能看谁到期不偿付。”

“我们基本不看外部评级了。”一位券商债券投资人士的话，道出目前中国债券评级的尴尬处境。

至2020年三季度末，中国评级市场有中资评级机构14家，其中10家采用发行人付费，包括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联合资信”）、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下称“联合信用”）、上海新世纪、东方金诚、大公国际、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证鹏元”）、远东资信，以及近两年成立的外资机构标普信评和惠誉博华；另外4家为投资者付费，包括中债资信、上海资信有限公司、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北京中北联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18年央行和证监会启动的跨市场评级牌照互认政策，2020年2月中诚信国际和中诚信证券评估完成了业务整合，统一由中诚信国际开展评级业务；10月，联合资信和联合信用也完成业务整合，统一由联合资信开展评级业务。

交易商协会数据显示，至2020年三季度末，从承揽债券产品只数看，中诚信国际的市场占有率最高，占比为34.36%，联合信用、联合资信和上海新世纪市场占比在10%—18%，东方金诚、中证鹏元、大公国际占比在6%—10%，远东资信占比1.12%。

从发行人付费的评级结果看，据华创证券固定收益部研报分析，中国的信用债主体信用级别基本位于高级别区——AAA、AA+和AA级，这三个级别主体的信用债存续金额占市场总存续规模的九成以上，AAA、AA+级别主体发行的信用债约占80%，主要是央企、地方大型国企和城投平台。“大型国企，不是个AAA，都不好意思发债。”市场人士称。

近期违约的华晨集团、永煤控股，均为AAA级地方国企，实控人均为地方国资委。多位债市人士认为，当前对国企的风险判断已不能简单按标签描绘风险。

如何提升区分度

永煤违约事件在制度建设层面的“成果”之一是，监管当局希望改进评级技术、提升信用等级区分度。

在前述央行召开的座谈会上，聚焦的主题之一就是提升信用等级区分度。对此，多位债市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目前整个评级市场信用风险评估维度和标准体系，包括金融机构投资标的信用评级门槛，或将重构。

据财新记者了解，在这次会议上，国际评级机构标普的在华全资子公司标普信评，受邀介绍了其评级方法。这是因为相较于中国国内的评级级别主要集中于AAA、AA+和AA，“标普信评的评级有较宽的区分度”，一位监管部门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

过去两年，两大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全球和惠誉相继入华，两家在中国均采用专门针对本土市场的一套评级方法和标准，与其在全球市场推行的评级方法和标准没有一一映射关系。

“标普信评的评级方法来源于标普全球，加入了本土化考虑，并简化了全球评级分析中的‘国别风险’因子。不同信用等级之间可以实现更大程度的细分，信用实力最强的主体、债项可能获得AAA评级。”标普信评评级总监王雷告诉财新记者，标普信评根据公开信息对中国近3000家发债主体的案头分析显示，其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在16个子集，最高是AAA，最低是B-，大体呈中间高、两边低的正态分布，大部分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为BBB或以上。

和中资评级公司一样，标普信评也是遵照央行规定评级符号的使用，据自己的评级方法对永煤控股潜在信用质量变动做了分析。“在2019年初，标普信评第一次对永煤控股案头分析时，其潜在信用质量就位于BB序列；第二次案头分析是2020年6月，根据标普信评对永煤控股的跟踪评估，将其潜在信用质量下调至BB-。”王雷表示，永煤控股的财务风险一直偏高，其实2020年6月永煤的化工业务已有实质性拖累。

王雷表示，最近一次根据方法论对永煤控股的复盘显示，假设标普信评三年之前介入分析，得到的判断仍是永煤自身信用质量是朝风险升高的方向变化，“复盘结果仍是把永煤放到BB-的位置。这说明，按照标普的方法论，可以起到评级预警作用，这套方法论在全球也经过了160多年的验证”。

在债市投资人看来，虽然信用债的风控要分析基本面，但在中国债市，对于占比相当高的国企发行人，政府对国企的外部支持力度直接影响企业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评级中如何评估这一因素将是个难题。“永煤控股属于河南大型支柱国企，在违约前几天还一直对外释放当地政府会大力支持偿债的信号。”

“一些国企债务扩张累积到已经扛不下去了，如果累积太多，最终的刚兑责任能不能由政府兜底，这种情况下风险怎么体现在评级上，评级机构要去反思。”一位评级机构高管告诉财新记者。

“我们也在思考如何调整政府救助意愿以及具体救助措施可能短期难以实质变现等系列问题，相关评估方法正在研究改进。”前述接近中诚信国际人士向财新记者坦承。

王雷亦表示，财务风险是考量企业信用质量的维度之一，标普信评的评级方法也会考量外部支持因素，即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

他介绍，针对产业类国企和城投平台，标普信评对于外部支持的评估，都会应用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框架。一般分为三步：一是识别支持主体；二是分析支持主体的支持能力，从五个维度综合判断，包括地方经济、财政实力、地方政府负债情况、流动性情况、财政管理能力；三是分析地方政府的支持意愿，“这取决于这家企业对当地政府有多高的重要性”，并据此把企业分成极高、高、中等、偏低、有限五个等级。

他解释称，如果受评的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一旦违约，可能引起区域性风险，该企业对政府的重要性通常比较高；如果该企业在行业内有领先地位，但不属于龙头，也不提供公共服务，可能会把其对于政府的重要性放在中等档位；“如果有一些理由能够让我们相信政府可能不会支持该主体，或者政府可能会选择出售所持有股权，可能会认为该企业对政府的重要性属于比较低或有限这一档。”

“对于永煤控股的政府重要性分析一直都属于中等地位，并且有可能会进一步下降。”王雷称。

对外部支持力度的考量方面，还可以看地方政府是如何管理流动性的。以山西和河南为例，王雷表示，根据山西国资委的公开信息，山西国资委建立了一些流动性管理的机制，比如成立了调节流动性的基金来帮助这些企业管理流动性，“毕竟降杠杆是个挺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流动性管理能力，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都需要重视”。

中债资信人士介绍，作为中国首家投资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其在评级方法上也引入了偿债意愿评价，从外部支持方的实力和意愿双重维度评价国企偿还能力。如从2017年2月，中债资信就将华晨汽车纳入预警，并向客户定向发送预警提示及风险解析报告。

类似标普信评的正态分布，中债资信的评级结果是以A-为中枢、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类正态分布。其数据显示，中债资信AA及以上级别主体占比为17.62%。从违约前的评级调整看，根据对2014年以来违约企业统计分析，中债资信在违约前19个月平均级别由A开始下调、前6个月降至BBB+。

一位中资评级机构分析师反思道，且不论级别高低和区分度的方法论，只从评级报告内容反思，“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报告都是八股文，观点雷同，但是标普的报告观点是很明确的。此外，中资评级报告的分析多是基于过去财务数据的分析，而评级结果和评级展望是对未来偿债能力得出结论，两者之间如何挂钩？中资评级机构的分析对此说服力不强。但标普的报告中对未来的预测，比如资本充足率的预测，是实实在在的定量预测，说服力很强”。

评级如何去泡沫

在一位接近监管部门人士看来，尽管标普的评级方法论客观且有一定前瞻性，可以拉开区分度，但如果给出的评级不能满足发行人需要的各监管部门设置的可投资债券门槛，恐怕很难用于发债。

“标普才进入中国不久，躬身入局来试试看。拉开评级区分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一家排名靠前的评级公司高管告诉财新记者。

外资评级机构入华被寄予厚望，监管当局和市场参与者都希望通过引入国际评级机构，发挥“鲇鱼”的作用，倒逼中资评级机构提升合规意识和评级方法。目前，先行者标普入华近两年，总共完成的评级业务仅十几单，且评级对象大多数为金融债和资产支持证券。交易商协会数据显示，目前标普信评和惠誉博华合计的市场份额不足1%。

一位资深监管人士认为，评级泡沫化是长期以来各种因素造成的，包括债市分割导致的市场竞争、监管部门要求的可投资债券门槛、隐性行政干预等。

“交易商协会主管的银行间债市和交易所债市存在发行竞争。”前述资深债市人士指出，“几年前，在信用债市场，公司债连‘小弟’也算不上，但如今交易所中长期公司债存量早已超过银行间债市的中票存量规模。但交易所债市发了不少非上市公司的烂债，评级放水，由于都是非公开发行，外界还不知道。”

前述《通报》显示，跨市场发行的评级不一致率环比上升。截至2020年9月30日，有35家发行人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评级结果不一致，较上季度末增加8家；有18家发行人的交易所市场级别高于银行间市场，占比51.43%，其中东方金诚最多，有7家；银行间市场级别高于交易所市场级别的17家发行人中，大公国际最多，有6家。

各监管部门设置的各种门槛，加剧了评级竞争。目前，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与外部评级挂钩的业务指引，比如银保监会对于银行和保险机构可投资债券的门槛、交易所债券质押回购的债券入库标准、发债绿色通道标准、储架发行标准等。

这些外部约束，导致本应给出真实基本面评价的评级，似乎成了摆设。“貌似只有监管部门需要这些评级机构的存在，市场根本就不需要，这些评级机构基本都是拿牌照按照监管要求‘收过路费’而已。”前述资深债市人士说。

有的发行人通过更换评级公司来获得更高评级。交易商协会前述《通报》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共有136家发行人更换评级机构，其中17家发行人的新承做评级机构所给级别高于原级别，占比12.50%，同比提高1.29个百分点；在变更评级机构后级别上调的发行人中，大公国际上调家数最多，有13家。

最令评级公司感到无奈的是隐性行政干预。“有些企业很明显存在流动性紧张，但正在想办法筹钱，此时候若降低评级，导致企业筹不到钱，评级公司怎么办？我们还要跟监管部门沟通，否则调低评级会被监管部门指责引发系统性风险。”前述评级公司高管说。

据财新记者此前了解，2018年，随着经济下行，在交易所发行的企业ABS出现违约风险，评级公司曾把自查结果报给了证监会。正常情况下，如果发现基础资产质量恶化，现金流无法覆盖发行规模，评级机构应下调该ABS产品的跟踪评级，但相关监管部门出于避免违约担忧、情绪扩散等因素，不让下调评级（参见本刊2018年第37期《中国式ABS乱象》）。

再如，交易所债市在降评级前要跟交易所沟通，因为涉及上市公司和中证登的债券质押库。“中证登怕降级后引发违约，扛不住。”前述评级公司高管说。

交易所债券质押回购是债市加杠杆的重要工具。根据中证登的要求，信用债需要满足债项评级为AAA级、主体评级AA（含）以上的要求，才可以入库开展质押回购，其中主体评级为AA级的，其评级展望应当为正面或稳定。当债券违约、评级下调时，不符合前述评级的债券将移出质押库，中证登作为中央对手方将面临较大的损失。

“这个市场从一开始就不是市场化发行。”前述债市资深人士指出。更令监管投鼠忌器的是，当前约25万亿元的信用债市场中，大量发行企业都是“债滚债”（即发新债还旧债）的融资模式；有接近70%的债券都是各种非法人理财产品持有，背后对接的是银行理财或资管产品，穿透之后都是老百姓的钱。

前述资深监管人士指出，如果真的按基本面分析，一旦下调评级到AA-以下，很多地方国企、城投平台将难以再融资，“而且将引发现相关存量信用债的加速清偿、提前偿还，甚至引发大量国企违约”。

在评级业人士看来，现在的僵局就是评级实际降不下去。“现在的债项评级报告给出一个中性的展望负面，还没有降级，投资人都作为触发提前赎回、回售的一个条款，这等于把评级行业给绑架了。”

据财新记者了解，由于近年企业普遍债务杠杆高企，“如果大面积地评级去泡沫，企业再融资的链条可能会就此断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急转弯，评级行业逐步去泡沫要时间”，前述资深监管人士坦承。

多位市场人士建议，是否可以逐步取消债券强制评级的监管要求，倒逼投资机构建立自己

的内部评级，根据债券实际风险做投资决策。“只有弱化监管要求的投资门槛对外部评级的依赖，鼓励投资人自主判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评级泡沫虚高的问题，倒逼评级回归揭示风险、促进市场合理风险定价的本源。”

2020年8月证监会曾就修订《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取消公司债的强制性评级要求、淡化发行人对评级的依赖。据财新记者了解，该办法的正式版本有望近期出台，但是否取消强制评级在证监会内部还有争议。

利益冲突何解

利益冲突甚至腐败行为，是近几年中国评级业比较突出的乱象。

2018年8月，大公国际因评级业务搭售公司软件，以咨询名义直接向受评企业收取高额费用，具有严重利益冲突，被监管部门严重警告，限期整改，并暂停业务一年。

近期财新记者从多位债市人士处了解到，继大公国际之后，中资评级公司的又一次“创新”来自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其持有联合资信71.85%的股权，同时持有联合信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联合咨询”）68%的股权。“联合咨询打着能给城投公司保持或提高评级的旗号来谈业务。一些地方城投和这家公司合作结构化发债，规模达上百亿元。”

联合咨询是一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证券基金。财新数据显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少波，也是联合资信法定代表人，并担任联合资信董事长。

2019年12月27日，天津证监局公告了对联合咨询有关利益冲突的处罚，责令其采取改正措施。处罚事由之一是：由同一部门负责证券投资顾问业务和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未进行有效的风险隔离，未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无法有效防范利益冲突。

市场人士透露，前述处罚中所指的投顾业务和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的利益冲突，就是指结构化发债。“同一集团下既有评级公司，又有咨询公司从事私募基金管理，本身就有利益冲突。”

此外，中诚信国际也有类似投资人付费模式的咨询业务，在中诚信国际内部属于非评级业务。“这一业务和评级业务是完全切割的，因为存在潜在利益冲突。”一位中诚信国际内部人士透露。

2020年12月4日，远东资信与贵州省铜仁市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领域包括为地方政府重点发展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实施等筹集社会资金，打造央地合作共赢且可持续发展的新标杆。“这种评级公司和地方政府的所谓战略合作，可能意味着给地方相关企业提供评级，令人担心会不会变相放水。”有评级行业人士称。

“根据协会的有关规则，在利益冲突管理方面，前述行为必须在其评级报告里履行告知义务，把该评级公司与当地进行战略合作的相关信息进行披露。”接近交易商协会人士说。

2019年5月，交易商协会发布《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业务信息披露规则》，首次要求在评级报告中披露利益冲突管理等内控制度。不过，目前还很少在评级报告中看到相关信息披露。

曾在标普全球供职多年的资深评级人士廖强认为，“评级行业强调透明度，程序透明、保证避免利益冲突就可以了。主要看市场是否认可，投资者不认可，评级公司就没有生意。”

他援引过去多年在标普全球的从业经验称，对利益冲突的管理，要靠评级机构自身的内部制衡机制以及外部监管。在国际评级机构，评级委员会是由完全独立于商业活动的分析师组成。评级活动中，任何一方以及内部合规人员都可能很自然地将行为不当报告监管部门。“这是一种靠多年来的法治法规、高额处罚形成的成熟的诚信文化。”

廖强认为，中国监管当局需要有一套明确机制防止利益冲突和增加透明度，并保障合规文化能够在评级公司内部得到执行，并不断强化。

比利益冲突更严重的，是评级公司的寻租和腐败。2020年12月14日，北京证监局公告，对

东方金诚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期限三个月，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证券评级业务；违规事实包括信息系统不足以支撑开展评级业务的内控及合规管理要求，部分项目评级模型定性指标上调理由依据不充分，未对影响受评主体偿债能力的部分重要因素进行必要分析等。

同日上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了东方金诚原总经理金永授、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原总经理崔润海被“双开”的消息，称前述两人收取“评级费”，为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案情触目惊心，例如崔润海帮助江苏某企业调高信用评级，收取巨额好处。

廖强认为，“部分国内评级公司目前急需解决的利益冲突，是非常低级的操作风险，有些甚至涉嫌个人犯罪行为，是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应该去做的腐败行为。具有有效公司治理的公司极少会有这样的操作风险，更不会成为一个需要上升到提出明确监管要求的事情，这说明内部控制完全失效了。”

财新记者彭骁骁、王娟娟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许金玲

财新周刊｜交易所市场化改革起步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即将挂牌的广期所将引入民营股东，能否突破中国交易所强监管现状？能否开启市场化之路？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刘彩萍

即将挂牌的广州期货交易所（下称“广期所”）之所以引发关注，不是因为它是十几年来中国首次批准的全国性交易所，也不是因其计划交易的碳排放权等绿色交易品种，而是引入民营股东成为最关键的制度安排。

2020年12月19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第16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上透露，新设期货交易所工作进入尾声。方星海说的就是广期所，而广期所民营股东的持股份额，已经历了多方数月的博弈。

据财新记者了解，广期所拟采用公司制架构，在股东方面，在不改变国资控股的格局下，将引入民营和社会资本，实现突破性创新。“不管民营资本的比例最终确定为多少，广期所的开设将引导中国的交易所头一次走向市场。”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资本市场有沪深证券交易所和四家期货交易所。其中，除中金所为公司制外，其他几家交易所均为会员制。不管是会员制还是公司制，所有交易所实质上均不以营利为目的：例如，四家期货交易所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条，明确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沪深交易所虽未明确，仍强调会员制治理机制，但从多年运行的结果看，也不以营利为目的。与此同时，几家交易所的负责人均由证监会直接任免，理事长、总经理及高管均对应相应行政级别，接受证监会的统一监管，交易所也成为证监会的下属单位。



点击查看大图

AEX控股公司创始合伙人黄杰夫表示，欧美发达国家受监管的交易所在几十年前就完成了由会员制向现代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的进程；主要交易所都完成了IPO上市进程，治理结构透明化，很少由监管部门直接插手交易所的股东结构和日常运作，更不用说直接“任命”交易所

高管。

“由于参与交易的多空双方诉求不同，交易所应该是一个中立角色，如果附加其他理念，必然难以中立。期货交易所有这个问题，证券交易所也同样存在。”一位外资投行人士表示，“比如期货交易所不断调整的保证金、持仓，证券交易所设定的融资融券比例等，都会直接导致对多空不同的影响，实际上也反映了交易所的理念，到底是以保证价格平稳为目标，还是以发现真实价格为目标？”

他还表示，中国的交易所长期被行政管制的好处是市场比较稳定，易于控制风险；但长远看缺乏竞争力与发展潜力，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不断开放，早晚要面对其他竞争对手，亟待市场化改革。“管钱管人只是表面现象，如何定制度才是根本问题。”

引入民营股东

广期所在治理结构上采用公司制，在股东方面引入一定数量的民营、社会资本，被市场视为交易所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

作为一家定位于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创新型交易所，其主要产品目前聚焦于绿色金融题材领域，业内人士对广期所的市场化运营充满期待。黄杰夫对此提出了四条建议：一是市场化的运作机制，采取高管聘任制而不是派驻式，按经营结果决定任期；二是上市品种备案制，依据经济特征和实体机构参与程度自行决定上市和退市品种；三是依靠粤港澳大湾区特殊试点政策，在跨境货币和互联互通上给予适当支持；四是利用最先进的金融科技，打造全球科技领先的一流市场化服务平台。

不过，对人事任命的建议恐难以落实。据财新记者了解，广期所筹备小组成员来自四家期货交易所，并配备一名组长和两名副组长，组长为中金所董事长胡政，副组长分别为大商所副总经理朱丽红和广东证监局副局长曹子海。广期所筹备完成后，胡政将担任董事长，朱丽红将担任总经理。

多位业内人士预计，广期所最大的创新可能体现在上市品种上。2019年2月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2019年10月，时任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何晓军在第八届岭南论坛上披露，广期所跟“绿色”和“碳排放”相关。

实际上，碳排放作为广期所首个上市品种的进展并不顺利。生态环境部对设立广期所虽然不持异议，但是表示由于目前碳排放现货市场尚未启动运行，现阶段推出碳排放期货条件不成熟，把上市品种限定在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过于狭窄。广州市政府建议，将上市品种调整拓展为“服务绿色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期货品种”，根据目前广州市政府官网公布的广期所进展落实情况，2020年四季度原本要实现广期所落地筹建。

黄杰夫建议，广期所可以通过场外交易、场内集中清算的方式，借鉴美国洲际交易所（ICE）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等北美能源期货交易所的成功经验，服务中国未来天然气、电力、碳排放、绿证等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助力中国能源市场的两大转型：一是计划向市场转型，如中国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二是传统能源向低碳新能源转型，实现中国经济在2030年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国际承诺。

“除能源板块的创新产品外，大湾区本身存在不少交易市场，比如有色金属交易所、塑料交易所、茶叶交易所等，它们对各自的现货市场非常熟悉。”黄杰夫称，广期所可以同这些交易中心一起，合作研发在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标准合约，为实体企业管理价格风险提供有效服务。同时，广期所的介入，也会促使这些交易市场的管理更加专业和规范。

一位接近期交所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当前期货交易所会员大多为期货公司，应该尝试放开自营会员的限制，引入大型产业机构参与竞争，这不仅能促进期货价格发现，也有利于提升中国期货品种的国际定价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只对会员进行了笼统的定性，即‘应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大机构直接成为自营会员的路并没有被堵死，这个口子早晚是要打开的。”

方星海在上述期货大会上也提到，一些大型国际现货贸易商（比如嘉吉公司），既拥有覆

盖全产业链的现货网络，同时又具备丰富的衍生品交易经验，可以将其现货信息、仓储物流、专业交易等优势充分转化为定价优势，为产业链上各环节客户提供低成本的风险管理综合服务，增强了客户黏性，实现了多赢发展。期货业协会要积极将这样的具有衍生品服务功能和能力的机构吸纳为会员，给予它们应有的身份，培养其成为衍生品市场重要的中介机构。

至于采用公司制的广期所能否将利润向股东进行分配，一位接近证监会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目前期货交易所的设立不能突破《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即便将来账上形成利润，也不能向股东分配。

一位期货公司总经理表示，既然引入民营股东就应分配利润，否则股东只出资、没有回报，就没人愿意参与，这也是民营股东名单迟迟未敲定的重要原因。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大印表示，公司制最大的挑战在于需要拥有极具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和策略，无论从人还是从监管理念上，广期所短期内恐怕难以实现。

中国特色会员制

会员制原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全球交易所的普遍组织形式，由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并通过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专业委员会对交易所实行管理。会员大会是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

会员制交易所属于非营利性的事业法人。为了维持交易所的日常营业，只向证券交易所会员收取会费，会费的数额和缴纳由交易所以章程形式确定。交易所的财产积累归会员所有，其权益由会员共同享有。

正是看中了会员制交易所的非营利性，中国的交易所在组建之初，也选择了会员制，不过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金鹏期货董事长常清告诉财新记者，国外会员制交易所的会员力量十分强大，规则都是由理事会制定，交易所层面只需要执行这些规则即可。中国在1990年新设交易所的时候，会员散、小，没有成规模，也不知道如何行使权力、如何管理，因此多由交易所的创设机构直接管理，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等。1993年，清理整顿期货交易所过程中，证监会对获批试点的15家期货交易所进行会员制改造，剥离利润算作国有资产，同时将注册资金分为均等份额，作为会员资格费，强调非营利性，并任命高管。

"说白了，这些会员只是作为经纪商，缴纳会费买交易席位而已。交易所这些年产生的利润，并没有分配给会员，都属于国有资产。"一位接近交易所人士称。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向财新记者指出，在集中的证券监管权面前，中国的会员制交易所实际上变成了监管机构直接控制的"市场一线"监管者，其自律空间被限缩、自律功能也被扭曲，贴近市场、灵活管理的机能没有得到完全实现。

此外，会员制下交易所的财产、财务制度问题一直备受市场关注。卢大印告诉财新记者，从全球角度看，会员制交易所的公司制改革是解决历史资产问题的一种方式，会员资产直接转化为会员股份，会员变股东即可；但中国的交易所积累的财产性质上虽然归会员所有，但不能分配，也无法使用。

这一问题在2019年底《证券法》修订期间就引发了讨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财政部原副部长史耀斌表示，证券交易所名义上是会员制，实际是凭借国家权力和信用支持垄断开展业务的。会员初始缴纳的交易席位费，从本质上讲是支付进场交易的成本，不是资本性投资，交易所收取的业务费用，本质上属于特许经营收费，所以累计形成的资产应当归属国家所有，不宜在法律中继续规定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财产积累归会员所有。

他指出，证券交易所还存在"资产和财务监管缺失、投资和资金使用不规范、有钱任性"等问题，建议进一步加强对证券交易所资产和财务的外部监督，健全制度。鉴于财政部门是主管资产和财务的职能部门，建议明确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证券交易所的资产和财务监督办法"。

据财新记者了解，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收入为证券市场各类交易的经手费，比如A股、B股、优先股、基金等，还包括发行、上市、交易席位等收费业务类别，每项业务的收费标准也不尽相同。而期货交易所的主要收入为交易手续费和客户保证金利息收入。交易所从未对外披露过收入情况，根据市场股票和期货的交易情况来看，业内人士预估沪深交易所每年收入超过百亿元，而中金所也在70亿—80亿元之间，其他几家商品交易所加起来也有上百亿元。

按照《证券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交易所的收入除了日常成本，可以计提相应比例的风险准备金，其余部分并不能随意支配。交易所每年的巨额收入在不断盖大楼、买设备之外，只能沉淀。2015年，中央巡视组对深交所的巡视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包括非主营业务投入较大、违反“四风”等多项问题。“钱太多，又不能光明正大地用，几个交易所都一样。”接近交易所的人士称。

公司化改制憧憬

20世纪末发达经济体上市资源的扩大和潜在市场的增加，使得会员制交易所竞争压力陡增。经验目标模糊、决策效率较低、容易出现会员的过度控制、筹资渠道受限、对外界变化反应慢等，成为会员制交易所受人诟病的主要缺点，公司制改革成为全球证券交易所的一大发展趋势。

汤欣告诉财新记者，交易所的“非互助化”或者“公司化”曾经在若干年以前就有过很多讨论，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证券交易所应当进行“公司化”改革。一方面，选择公司制有助于改变中国证券交易所准政府职能部门的地位，增强证券交易所的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从国际角度观察，交易所的公司化在海外市场越来越普遍，如果仅在中国实践中把交易所的组织形式限定为会员制，很可能会制约交易所市场化改革步伐。

由于中国的交易所属于特殊的会员制，交易所主体地位缺失，因此在改革上，业内学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由准会员制直接改制为股份制公司，进而谋求自我上市；二是先由准会员制改制为会员制或会员所有的私人公司，进而改制为股份公司，并最终谋求上市。

一位接近上交所人士认为，第一种方案为最优。因为当前交易所为政府直接控制，会员在交易所治理中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且会员也基本为国有，如改制为会员制或会员所有的私人公司，政府在交易所中的控制地位将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改制实践意义很有限；而直接进行股份化改制引入非会员股东，则能够实现交易所治理水平的较大提升。

改为公司制的交易所，应该如何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业内、学界认为应按照《公司法》进行架构搭建，并参照国际惯例。公司治理目标包括交易所董事会独立、参与者与交易所联系密切、治理过程透明与公正，通过部分监管与业务分离、建立新型自律监管组织或监管权利移交等方式，保证监管的市场效率、公平和公正。董事会成员中，必须有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数目的独立董事代表公众利益，独立董事实行任期制，可由证监会提名，由交易所股东大会委任；董事长不得兼任总经理。此外，可设利益协调委员会，作用在于对交易所与股东之间、交易所商业角色和监管角色之间、上市公司之间的商业安排进行审查，协调利益冲突的问题。

然而，业内也有学者认为，公司制证券交易所的缺点，集中体现在作为以营利为目的商业组织与作为自律监管性质组织的冲突。汤欣告诉财新记者，这并非不可克服，一般需要通过区隔交易所的交易平台功能和监管功能来实现。

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早在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卓越的交易所纷纷向股份制模式过渡，而且寻求公开发行并且上市，但通过监管审查和引入适当的措施，可以激励和解决与自我上市相关的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比如，NYSE Regulation作为NYSE（纽交所）的非营利子公司，成为专门负责市场监督和执行NYSE相关规则的主体。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各经济体政府监管部门以及交易所等自律组织被赋予相应的资本市场监管权限。证券和期货交易所作为市场交易的组织者，与市场数据有着最直接的联系，由其承担市场秩序监管职能的技术成本最低。

接近交易所人士向财新记者介绍，中国香港证券及期货业的“三层监管架构”设计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由一个贴近市场的营运机构——香港交易所——负责前线监管；由聘有具备专业知

识及市场经验人员的独立监管机构——香港证监会——加以监察；政府则对金融市场发展制定整体政策。

而政府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等自律组织的职责权限应该如何划分，并无标准答案。根据政府介入的程度，主要分为政府主导型监管和市场自律型监管。前者的主要代表是美国、日本、中国以及新加坡，后者的典型代表为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前者通常由国家立法机关授权全国性证券监管机构或政府部门对全国性证券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监管，各种自律性组织如证券交易所和行业协会等在监管体系中主要起协助作用；后者政府一般较少干预证券市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主要由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市场组织进行自律监管。

在政府主导型的证券市场监管中，交易所大多为公司制。通过政府严格的监管以及交易所辅助的自律监管，使得这类交易所反应更迅速，服务成本更低，技术更先进，且在决策时不必担心有利益冲突的会员的抵制，能有效化解监管冲突。但是，会员制下过分强调政府的监管，反而会导致某些环节出现监管真空，证券交易所缺乏自律的保障和动力，其作为自律监管主体的独特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

上述人士认为，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应该借鉴香港市场，优化政府监管部门与自律组织的职权划分。同时，适时就监管职权在三者之间的分配进行磋商，并以备忘录或行政命令形式予以确认并执行。

版面编辑：许金玲

财新周刊｜公募REITs等待规则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试点项目已进入最后审批环节，但复杂的产品结构和专业的治理要求，尚待制度明确



随着公募REITs大幕的拉开，仓储物流，收费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设施，污染治理、信息网络、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被列为重点行业。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全月 岳跃

中国版公募REITs试点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首批近30个公募REITs项目2020年12月初在国家发改委完成答辩后，目前已有5个项目正在向证监会和交易所提交产品申报材料。

2020年4月30日，证监会、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同时，证监会还对《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下称《指引》）公开征求意见。公募REITs大幕由此拉开。

《指引》对重大事项表决的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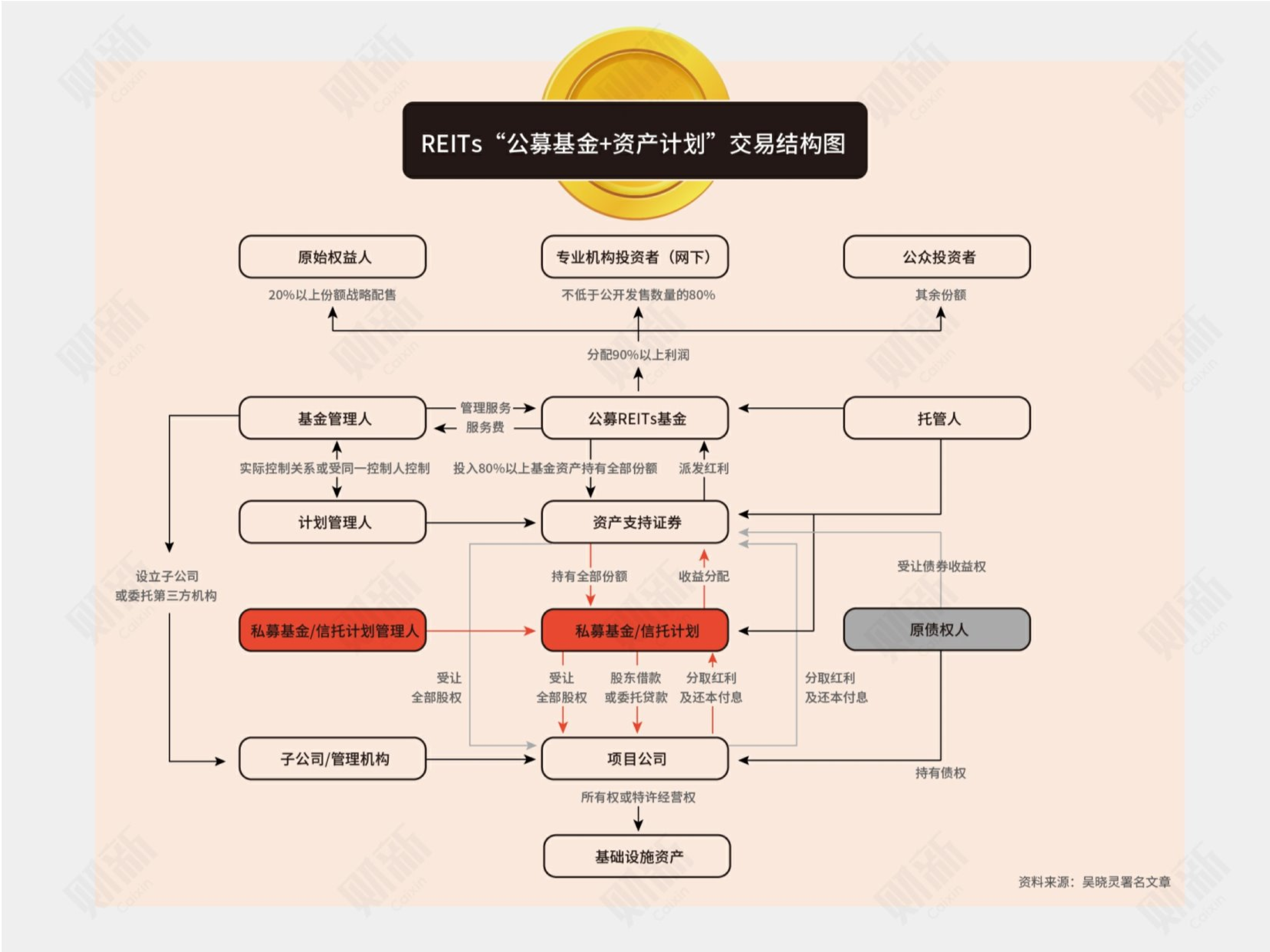
表决要求 / 重大事项	项目购入或出售	基金扩募	关联交易	其他事项
二分之一以上	金额超过基金净资产 20%—50%	金额低于基金净资产 50%	金额在基金净资产 5%—20%	基金管理人解聘外部管理机构
三分之二以上	金额超过基金净资产 50%	金额不低于基金净资产 50%	金额超过基金净资产 20%	对投资目标、策略等作出重大调整

资料来源：《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

点击查看大图

试点申报工作虽于7月末开启，上述征求意见的《指引》文件也在8月6日发布终稿，但基金公司一度十分迷茫，不知道如何具体着手推进项目。“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准备材料，应对发改委答辩；最近，也在提前和证监会沟通产品设计细节。不过，公募REITs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产品，并无任何先例可借鉴，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连项目运营人员资质是否达标，我们都想拿着简历去问问会里。”一位公募REITs人士介绍。

公募REITs是国家发改委和证监会以“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支持证券”模式引入的试点，并在未彻底修改税收制度、基金等立法情况下的尝试——用证券投资基金为抓手，实现基础设施为底层资产的ABS（资产支持证券）的公开发行。相较于“类REITs”产品，此次试点的最大特点是可向公众发行并上市交易。



点击查看大图

但是，对于市场各方参与者，上市交易这一金融创新的成本并不低：投资标准化产品见长的公募基金需要转型为类似投行的角色，对非标类基础设施资产定价、发行；在当前税收环境下，多层嵌套和多层级委托代理的产品结构亦有摊薄产品收益率的可能；原始权益人让渡资产后运营管理的主动性有待激励；如何防范利益冲突更是常被提及的话题；个人投资者合计最高持股比例调升后，增强产品流动性的同时又担心二级市场价格被爆炒，投资者教育工作压力大。

然而，监管层面推行公募REITs的决心显而易见。此前，债权融资支持了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发展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宏观杠杆率到达高位，尤其是城投平台需要降杠杆、盘活资产。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REITs或将成为地方政府回收前期投资、防范地方债风险、为项目构建股权类融资渠道的途径。

不过，惠誉评级公司认为符合条件的城投公司能够通过基础设施REITs回收资金，但可能无法大幅降低其杠杆率。究其原因是，原有的成熟项目将由新项目取代，而新项目需要时间产生收入且可能不如之前的项目稳健；有稳定收入的项目本就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占比较小。因此，公募REITs将作为补充性而非主流的融资解决方案。

一位未参与REITs试点的公募人士也表示认同："有持续、充沛现金流的项目，想融资的早就做了，不管是银行的收费权质押贷款，还是ABS、类REITs业务；有更多利润空间的更是早就IPO了。治理结构清晰、还未运作过的优质底层资产并不好找——从这个角度看，公募REITs的项目数量和原始权益人的主观参与动力都有限。"

底层资产门槛高

公募REITs申报工作启动后，各省级发改委推荐的项目共计约50个，国家发改委正式通知答辩的近30个，规模多在数十亿元，并在2020年12月中旬给出两轮反馈意见。目前，已有答辩通过的项目在与证监会沟通产品设计细节，等待国家发改委正式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推荐至证监会，以启动产品申报工作。

若进展顺利，最早2021年一季度或有公募REITs产品获批并上市。不过，市场人士对此持

谨慎态度："由于产品结构复杂，公募里面还有ABS的部分，除了证监会机构部、债券部，还包括交易所的固收部和产品创新中心都要同步做实质性审核，涉及的部门一多，难免影响进度；同时，预计2020年底正式出台的配套规则和指引也未发布；此外，在真正上市之前，公募REITs还会经历类似IPO的流程，项目路演、网下询价、定价、打新都少不了。"

国家发改委于2020年7月31日发布的申报通知（业内称为"586号文"），对试点项目的地区和行业范围、基本要求、合规程序及流程作出说明：仓储物流，收费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设施，污染治理、信息网络、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被列为重点行业。值得注意的是，酒店、商场、写字楼、公寓、住宅等房地产项目不属于试点范围。

"在'房住不炒'大背景下，房地产没在试点范围内完全符合市场预期。从试点的重点行业就能看出，基础建设的资产类别是非常多的，经过前几年经济的增长，每个细分领域现在都是万亿级的赛道，但每个赛道的期限、收益都不太一样，研究REITs就是在变相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不同资产类别的特征。"中金公司固收部董事总经理陈健恒在出席REITs主题会议时表示。

尽管基础设施存量资产规模庞大，但真正适合做公募REITs底层资产的项目需要仔细搜寻：试点项目必须权属清晰、资产范围明确；相关股东已协商一致同意转让；项目运营时间原则上不低于三年，近三年内总体保持盈利或经营性净现金流为正；预计未来三年净现金流分派率原则上不低于4%；在地区分布上，需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

"除了基础资产、权属资料，审核时比较看重项目现金流的情况，重点是其收入来源的合法合规性、分散度。比如，部分地区的招商引资政策会有税收支持和奖励，因此对于相关产业园这一部分收入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占比会仔细讨论。还比如，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收入来源需以使用者付费为主，这些都是发改委重点关注的。"一位参与项目评审的法律专家指出，项目最近三年的经营性净现金流为正也是评估的焦点。"这涉及目标资产评估净值，数据的公允性和客观性需不动产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专门的报告。"

正是由于上述所需的详尽信息披露，亦有原始权益人选择临阵脱逃。北京一家大型公募人士介绍："同行本来有一单谈得很好的项目，因为老板旗下另一家公司登陆了科创板，他觉得公募REITs成本不低而产品运行和市场表现完全未知，更不想再经历一遍上市流程，因此拒绝再推进相关工作。"

此外，不缺融资渠道的央企，有何种动力参与公募REITs？上述北京大型公募人士表示："国资委对央企投资的考核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二是资产负债率不能太重。当下，后者受重视程度压过了前者，央企的资产都很大了，但债务负担这么重显然不合适。从降杠杆转型的角度看，央企是有动力的。"

产品结构复杂

为了规避ABS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公开发行的问题，公募REITs采用"公募基金+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产品结构是此次试点最为复杂的部分，但也最适配当下的立法环境。简单来说，从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散户募集来的资金通过公募REITs基金及其投资的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下称"基础设施ABS"），最终流向具体项目中的基础设施资产，投资者享有该资产的定期强制分红。

这其中，80%以上公募REITs基金的资产持有基础设施ABS全部份额，基础设施ABS必须持有项目公司全部股权。从上至下穿透后，公募REITs基金通过ABS和项目公司等载体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

同时，公募基金管理人与基础设施ABS管理人需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受同一控制人控制。"两层管理人如果是'母子关系'可能稍微好些；'兄弟关系'难免会扯皮，权利义务不清晰的话很难协调。这个规定的初衷，就是想在本就复杂的交易结构下，尽可能减少交易流程。"一位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表示。公募基金的管理人是公募REITs的持牌载体，负责产品销售和信息披露；ABS专项计划的管理人牵头设计公募REITs方案，协同存续期管理。

《指引》要求，REITs产品采用封闭式运作；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合并后基金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90%，每年分配次数不少于一次；公募基金管理人还需主动运营管理基础设施项目，以获取基础设施项目租金、收费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

但在ABS和项目公司之间，是否应有私募基金或信托计划作为夹层，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例如在已披露申报REITs发行材料的交易架构中，光环新网（300383.SZ）就未将私募基金纳入。中金公司研究团队认为，取消私募基金层面的架构有利于精简交易结构、减少决策流程，强化公募基金的管理人责任，更好地避免出现治理问题。

“监管也想要拿掉私募基金这一层，以缩减交易链条。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做ABS的券商直接当项目公司的股东，各地工商局是否同意，有待观察。”前述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表示，私募基金主要对资产运营情况进行监督，职责包括资金的归集、划付和基金的收益分配。

为了尽量减少交易结构中的税收负担，公募REITs产品仍将采用“股权+债权”的类REITs传统持有模式，通过“大债+小股”的形式来减少所得税负担。一位华南地区公募REITs负责人向财新记者解释：“股债比例一般是1∶2。举例来说，1亿元的投资资金，3000万元走股权，7000万元以股东借款的形式给到项目；项目层面满足一定条件的利息支出可以用偿还借款的形式向上划付，无需再交企业所得税，这个方式是得到监管认可的合理避税。”

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给有关部门的建议中指出，公募REITs最大的问题是较多的层级使得这一金融产品显得结构较为复杂，多层嵌套令投资人难以理解。“多交易层级不但可能使公募REITs管理成本和税收较高，存在收益率逐层摊薄的问题，而且结构涉及多个参与主体，远比普通的证券投资基金复杂，对内部治理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对此，吴晓灵建议，应该单独制定两部条例：一是《资产支持证券（ABS）管理条例》，二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管理条例》。前者规范资产支持证券的公开发行和上市，应以《证券法》为上位法，在发行主体、发行条件、申报材料、审核流程、信息披露等方面制定相关条款，并对ABS公开发行的注册事项进行规定，对其发行、交易等相关业务环节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后者可以通过《证券法》的授权，规范信托基金公开发行上市。

吴晓灵认为，各类投资基金均是证券，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与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共同点是公开募集基金份额，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独立托管，投资人享受收益并承担风险。但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投资已上市的证券，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专门投资于各类有稳定现金流的不动产。

“在强制信息披露、反欺诈、投资者保护、法律责任、监管架构上，公募ABS和公募REITs将直接对接《证券法》的要求，强化持续管理、防控风险，保护持有人利益。在《证券法》的框架下发行公募ABS和公募REITs，可以解决目前设计的‘公募基金+单一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产品结构复杂的缺点，架构层级减少、管理人责任清晰，也利于穿透监管。”吴晓灵建议。

公募治理难题

在全球范围内的REITs治理，大致可分为内部管理模式和外部管理模式两种。前者多见于美国市场，美国REITs一般为公司型，由公司内部管理团队进行主动管理，治理机制更为灵活，有助于降低成本；后者以日本REITs为例，内控严格、独立性高、激励机制更合理、可发挥专业能力的规模效应是其特点。

《指引》更倾向于基金管理人作为中国公募REITs主要的责任主体，也就是上述的外部管理模式。基金管理人不仅要做好基金发行、投资者关系与信息披露、财务、合规风控管理，还要对投资收购与处置、资产改造、招商租赁、营销推广等投后工作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起步阶段的中国公募REITs更像是外部管理下的内部模式。一位北京的公募REITs项目经理表示：“一些基础设施不动产涉及的管理技术非常专业：例如一条铁路的管理人数可能超过2000人，单靠公募根本无法管，铁路、交通部门也不会让公募管。”目前，基金公司都选择将部分管理职责直接或间接委托给原始权益人或其关联人，另付管理费，同时对其实施监督、评估。”

上述委托管理虽然符合《指引》要求，但使得本就复杂的REITs结构又做了加法，多层嵌

套叠加多层级委托代理，无疑将加剧利益冲突。一方面，《指引》规定原始权益人参与战略配售比例不低于20%，锁定期5年——这样一来，原始权益人很可能成为公募REITs的第一大持有人，在持有人大会上处于控制地位；另一方面，原始权益人或其关联方还负责基础设施的运营管理职责。

"原始权益人对底层资产的持股比例从上市前的100%降到20%，如何设计激励措施保障其运营管理的有效性？当REITs资产与原始权益人表内同类资产发生竞争了，如何公允地分配业务量？"对此，中金固收团队认为，可在运营管理机构的收费上设置基于业绩考核的浮动费用，以增强运营管理机构的动力。基金管理人和原始权益人都需要具备长期运行基础设施基金的意愿和决心，认同发行REITs基金并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通过扩募可以运营的资产管理平台。

针对关联交易，《指引》明确实施分层表决机制，严格管理利益冲突。例如，金额超过基金净资产5%但低于20%的关联交易应经持有人大会二分之一表决通过；超过20%的须经持有人大会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关联方需回避表决，并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但是，业内人士对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仍高度关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王娴撰文指出，《基金法》没有设立类似公司董事会这样的"治理主体"，《指引》是通过赋予持有人大会"事前权利"强化持有人利益保护。集合投资计划的治理，在全球都面临因持有人高度分散、"搭便车"心理严重，而使得持有人的约束和制衡不平衡。

前述参与项目答辩的法律人士建议，提前对委托方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如果项目审核时还未确定最终的资产运营服务机构，基金公司至少要给出非常细致的核心条款。例如，委托方的资质要求、管理范围、运营目标、业绩，甚至如果委托方丧失管理能力后的补救措施。"

"按照海外市场的主流做法，REITs应该是运营商的角色，而我们的公募基金欠缺运营能力，虽然不排除有的基金慢慢开始做专业的运营商，但现阶段还比较难，公募基金没有这个基因。"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寿双此前对财新记者表示，国外REITs管理人大多是专业的运营商，并没有限定只能公募基金做，"我们受制于现有监管体制，限定了通道和载体"。

吴晓灵也认为，金融机构的优势在于具有完备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在投资者保护和信息披露上有完善的架构体系，但不动产投资是非常专业的投资领域，应吸引更多的专业不动产管理和运营主体参与进来。"从美国REITs的立法过程看，也经历了这一融合的过程。1986年美国新税收改革法案拓宽了REITs的投资范围、允许REITs进行积极的内部管理后，使得从前主要由金融机构设立REITs的局面发生改变，房地产开发商和运营商也开始参与到REITs的组建里来。"吴晓灵建议，可以让基础设施的投资管理人和运营主体参与REITs的设立，适时建立不动产基金管理的专业牌照。

难预期的收益与税制

公募REITs是介于股债之间的创新产品，其特征和普通的债权、股权均不完全相同。REITs的定义不是固定收益资产，属性更偏股权，但又具有固收的特征，例如，依赖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进行强制大比例分红。在美国市场，REITs的回报比股票稳定，又和传统的资产证券化有差异：ABS是存在优先、劣后分层杠杆的债；REITs是平层设计，投资者购买的都是权益层，不涉及信用评级，没有票面利率。

正是因为上述产品属性，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险资、资管产品、政府专项基金等对公募REITs兴趣颇大。而在个人投资者层面，最高持股比例虽由征求意见稿的16%上升至终稿的24%，但在机构投资者网下发售后，留给个人投资者的额度预计也不会太多。

一位公募REITs人士认为："散户购买比例较低有监管控制风险的考虑，也是市场化的选择。老百姓买公募REITs产品，年化5%左右的收益，波动非常低，对散户的吸引力也不大，完全能找到替代的理财产品。散户多一点肯定有助于流动性，但我们也不想看到产品上市后被爆炒。"

投资日本光伏REITs项目、有丰富经验的上海和逸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庞阳指出："发行上市后的REITs如果价格波动太大，无论是暴涨还是暴跌，之后进行再融资都是非常

困难的。对此，我们曾花了近两年时间，历次和销售渠道以及管理方沟通，把我们认为不太合适的投资者剔除，真正吸引希望拿到固定分红的投资者。投资者教育对产品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针对个人投资者，虽然暂无明确的投资者适当性安排，但业内普遍认为公募REITs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更为复杂。一家大型券商的公募总经理表示：“公募REITs销售时间只有三天，和传统公募基金三周的发售时间比，周期上的紧迫之外，公募REITs可能还需要个人投资者签署各类纸质版风险揭示书，有些‘小白’投资者甚至不知道场外认购份额要转托至场内才能参与场内交易。”

机构投资者的挑战也不小。陈健恒表示：“公募REITs相当于是基础设施项目拿到市场上定价，过去普通的债权、股票的定价，都有很成熟的模型和经验。而对于基础设施，其产品形式是基金、可交易的证券，是更特殊的一类资产，有很多新的东西要研究。”

基础设施项目评估原则上以收益法作为主要估价方法，并在评估报告及其附属文件中披露评估过程和影响评估的重要参数，例如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剩余期限、未来现金流预期、折现率等；监管机构还为资产评估设置了明确的时效及频率规定。

“评估报告是对未来几十年的收益预测，没有那么准确，折现率差1%，结果都是天差地别。但不管怎么样，充分信息披露非常有必要。现阶段接触的机构投资者，对于首批项目的现金流是有信心的。”前述公募REITs经理表示。

此外，资产证券化是一项较为复杂的业务，在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下，ABS和REITs在产品设立及运营环节均面临较高的税负成本。从境外成熟市场情况看，各国政府在制定REITs法规的同时，均出台了REITs产品设立及运营环节的税收中性政策，确保不存在重复征税的情形。

吴晓灵建议，中国应明确公募ABS和REITs的税收中性政策，建立和完善符合国情的ABS和REITs税收支持政策体系的基本原则，在产品设立环节考虑免征或递延不动产转让相关的税费，在产品运营期间避免重复征税，并允许ABS和REITs投资者适用优惠税率。

市场普遍预期，对于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税收环境，短期内并无实质性改变的可能。中金固收团队认为，“公募基金+ABS”的模式基本解决了投资者端的税收问题；在项目公司层面，类REITs实践中探索出了“股+债”的持有模式来减少所得税税负，但仍然存在一些操作层面的困难。如果税务部门能够参考海外成熟市场的方案，明确REITs产品独立的税收方案，例如对税收进行递延或者减免，则将明显提高产品的吸引力。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华区税务合规及咨询业务主管合伙人谭绮认为，由于公募REITs层级复杂，在税务法规推行过程中，可考虑先行选择部分潜在目标基础设施资产。例如，在基建行业、仓储行业和数据中心等及公募REITs项目较聚集或活跃的地区小规模试点，推出阶段性的政策或征求意见，完善法规的合理性后，逐步推广至全国，最终形成一套长期有效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募REITs税收制度。

“财税部门的意见还是先试点，税收政策的出台是建立在大量实践基础上的。目前看来不会专门针对REITs出台办法，今后可能会在一些现有税规税则中去适用。比如，有些规则是给上市公司制定的，如果REITs刚好满足条件，就可以适用。”一位资深REITs人士此前对财新记者表示。▫

版面编辑：许金玲

专栏｜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比重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推动提升居民收入政策的同时，政府应考虑如何在向劳动力倾斜时不损害企业竞争力

文|陈昌华

Aletheia Capital中国策略分析师

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发布后，市场开始关注“需求侧改革”。其中，一个重点是通过制度性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消费占比。那么，中国居民收入（特别是非财产收入）比重的提升有多大空间？如何提升？

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较高水平持续下降，到2010年左右跌至谷底，近几年有所回升，但仍低于90年代水平。从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看，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1993年至2002年的64%，降到2003年至2012年的58.5%，在2013年至2018年回升至60%。在这三个时期，非金融企业收入占比为17%、21%和20.5%；金融企业收入占比为1.4%、2.8%和4.1%；政府部门为13%、14.2%和14.3%；经过二次分配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更快。简单说，过去20多年，居民在头十多年“让利”给企业和政府，但情况在近几年稳定下来。

如果把居民收入分为劳动收入（包括工资和个体户/自由工作者收入）和非劳动收入，这两类收入在前述三段时期的势头基本上跟总收入一样。这个观察可能跟普遍预期不太一样：过去20年间，随着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上升，居民财富总额应以几何级增加；但考虑到资金流量表只统计财产的现金流收入——如租金和利息，而这些现金流的增长应远低于财产总额的上升，因为大量居民房产多为自用，再加上财产相关支出（如按揭贷款）增加很多，收支相抵后，增长便跟劳动收入的速度差不多。同样，经过再分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基本走势也是一样的。

企业与居民劳动收入分配格局的转变，主要受同期经济政策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国企为主的中国企业盈利水平都很低，因此当时中国国企大刀阔斧地改革，裁减了3000多万国企员工，这次改革效应在2003年至2012年开始浮现，再加上同期中国经济起飞让企业的经营环境大幅改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同期政府税费征收的能力上升和大规模的卖地收入则带动政府收入上升。直至近十多年，政府才开始重视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问题，政策上开始倾斜，叠加劳动人口减少带来的工资上升压力，居民收入开始从谷底回升。

那么，居民收入比重能否进一步上升？这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劳动力供需平衡；二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提高速度；三是其他制度安排，例如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工会力量是否强大等。

从劳动力供需角度看，中国劳动力供需在未来一二十年间只会更紧张，这对工资和居民劳动收入上升肯定有正面作用。生产力进步是另一个推动企业盈利上升和工资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制度安排上，一些欧洲国家的工会力量比较大，但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不同国家的效果不太一样，如在德国和瑞士，因企业能提高自身竞争力，企业和工会也较为合作，因此纵使分配较倾向劳工，也不致对企业竞争力有太大影响；但如法国，向劳工倾斜的制度则令劳动市场缺乏弹性，引致失业率长期处于高水平，得不偿失。因此，政府在推动提升居民收入政策时，同样应考虑不损害企业竞争力。

在这方面，瑞士可能是值得参考的国家。相对其他欧洲发达国家，瑞士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较低，但法定最低工资却很高，十分鼓励居民就业而不等待救济；而支持高工资的是很优秀的职前训练课程。跟大多亚洲和美洲国家不同，瑞士初中成绩较差的学生不会被简单淘汰或被勉强留在不适合他们的传统教育制度内，而是被转到职业训练学校学习。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瑞士在拥有大量国际一流企业的同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水平也在世界名列前茅。当然，瑞士只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其经验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但相关政策思路值得借鉴。▫

回溯｜一周回溯（《财新周刊》2021年第01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2020年12月31日，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2021年新年贺词。

2020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举行，习近平强调，坚定改革信心，汇聚改革合力，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2020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强调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情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2020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北京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2020年12月28日，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两国元首互致新年问候，并祝中俄两国人民新年愉快；同日，李克强同阿尔及利亚总理杰拉德通电话。

2020年12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额约2.3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支出法案，以应对日趋恶化的新冠疫情，为美国家庭和企业提供经济援助，并避免联邦政府关门。

2020年12月28日，日本暂停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新入境，至2021年1月底。

2020年1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约谈了蚂蚁集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就有关情况答记者问。

2020年12月24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2020年12月27日，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段开通运营，京雄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雄安站同步投入使用。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任命曾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的陈小江为国家民委主任，曾任甘肃省省长的唐仁健为农业农村部部长，曾任黑龙江省省长的王文涛为商务部部长。

2020年12月28日，按中国民航局要求，运营中英定期客运航班的航空公司暂停中英间定期客运航线航班运行，至2021年1月10日24时。

2020年12月24日，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表示，确定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适用于土人民，有效且安全。

2020年12月30日，北京公布顺义区本轮聚集性疫情源头，初步判定为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北京近期出现多点零星散发新冠病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进入应急状态，顺义区、朝阳区、西城区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大规模核酸采样。

2020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批准朴道征信有限公司个人征信业务许可。这是继百行征信有限公司之后，第二家拿到牌照的个人征信机构。

2020年12月30日，针对京东、天猫、唯品会三家平台涉不正当价格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对三家公司分别处以50万元罚款。

2020年12月27日，辽宁省开原市发生一起持刀伤人系列案件，造成7人死亡、7人受伤。犯罪嫌疑人杨某峰丧子离异，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进而采取极端行为实施犯罪。

2020年12月27日，欧盟多个成员国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的疫苗由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

2021年1月1日，由于出现传播能力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印度尼西亚暂停所有外籍人员入境印尼，至1月14日。

2020年12月29日，克罗地亚中部发生6.4级地震，已造成7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

2020年12月25日，美国南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市中心发生爆炸事件，造成3人受伤；爆炸事件嫌疑人63岁，已在爆炸中死亡，作案动机有待调查。

2020年12月29日，98岁的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巴黎逝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皮尔·卡丹在北京举办时装展示会并开设马克西姆连锁餐厅，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

版面编辑：许金玲

前瞻｜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总统选举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扎帕罗夫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陆文

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将在2021年1月10日举行总统选举和修宪公投。

2020年10月初，吉议会选举结果曾引发数日骚乱，议会大厦和总统办公室建筑一度被示威群众占领，时任总统热恩别科夫被迫转移至隐蔽居所。随后，吉中央选举委员会（下称吉中选委）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乱局中，2020年3月被控参与绑架遭判处11年6个月监禁的反对派领袖扎帕罗夫被群众释放出狱，之后又被议会选举为总理。

2020年10月15日，热恩别科夫迫于压力宣布辞职。吉宪法原本规定，在总统任期提前终止的情况下，由议长履行总统职务直到新总统当选。但由于时任议长无意履行代总统职务，扎帕罗夫宣布由自己代理总统。

吉中选委随后于10月24日决定，将于2021年1月10日举行总统选举。

2020年11月14日，扎帕罗夫宣布辞去代总统职务并暂停行使总理权力，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参加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他辞职后由他的政治盟友、议长马姆托夫代行总统权力。

2020年12月12日，吉中选委宣布，本次总统大选共有18名候选人角逐。虽然候选人数众多，但普遍认为，由于扎帕罗夫以外的阵营缺乏核心领袖，扎帕罗夫大概率可获得足够多数的选票直接当选，而不需要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决选。

事实上，虽然辞去代总统和总理职务，扎帕罗夫目前仍掌握实权，他在竞选上的花费也远超其他竞争者。自2020年12月15日正式竞选期开始以来，扎帕罗夫已花费了62.8万美元的竞选经费，是排名第二位的候选人花费的7倍。

在举行总统选举的同时，还将举行修宪公投，决定是否要将该国的政治制度由现行的“议会—总统制”，改为赋予总统更广泛权力的“总统制”，或者维持现状。

此前，扎帕罗夫曾提出修改吉宪法的提议，主张取消现行的“议会—总统制”，将议会成员从120人缩减到90人，将行政部门的责任从总理转移给总统。但法律专家认为宪法修正案存在诸多不合法性，缺乏治理授权，恐使吉滑向类似邻国土库曼斯坦的专断体制。

吉尔吉斯斯坦是整个中亚地区惟一赋予议会较大权力的国家，政治环境相对开放，共有16个政党，大多数党派分别代表着吉不同民族的利益，政党竞争比较激烈。自2005年以来，包括

刚去职的前总统热恩别科夫在内，已有三任总统在群众运动浪潮中未能完成法定任期，被迫提前下台。

版面编辑：许金玲

国风｜一波三折“百香果女孩”遇害案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王梦遥 实习记者 王梦阳

广西“百香果女孩”被奸杀案再审落槌。2020年12月28日，广西高院对该案公开宣判：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凶手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再审宣判后，被害女孩的母亲陈艳（化名）向财新记者表示，对再审结果感到满意。

2018年10月4日中午12点左右，广西钦州市灵山县10岁女孩杨晓燕独自前往百香果收购点售卖百香果，回家途中遇到同村29岁青年杨光毅。杨光毅企图强暴她，遭反抗后掐晕女孩，扛至山顶，之后又用刀刺伤她的双眼和颈部，等到杨晓燕身体无法动弹后实施奸淫，随后抛尸。杨光毅还拿走了杨晓燕售卖百香果所得的32元钱。

2018年10月11日，灵山县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批捕杨光毅。2019年7月12日，钦州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杨光毅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责令其退赔32元给女童母亲。杨光毅不服一审判决，以存在精神疾病、申请精神病鉴定和有自首情节为由提起上诉，请求减刑。落款为2020年3月25日的二审判决书显示，广西高院审理认为，杨光毅对其犯罪行为性质具有明确认识能力，能控制自己实施犯罪的行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对其申请精神病鉴定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自首情节，广西高院认为，杨光毅强奸幼女并致被害人死亡，且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应予严惩。鉴于杨光毅父亲规劝陪同杨光毅到公安机关投案，且投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自首，且自首行为对案件侦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广西高院认为一审判决量刑不当，决定予以改判，除维持一审判决中责令杨光毅退赔32元给被害人家属及没收作案工具，改判杨光毅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对其限制减刑。

此判决引发舆论哗然。2020年5月10日上午，最高法院通报称，对广西高院二审终审的杨光毅强奸一案进行调卷审查。11月11日，最高法院指令广西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

是否认定杨光毅的自首情节，仍然是再审的焦点问题。广西高院经再审认为，杨光毅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大，罪行极其严重。杨光毅虽有自首情节，但结合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其不予从轻处罚，对该案作出前述改判。

财新记者注意到，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此前的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12月27日，最高法院召开学习贯彻“两法”加强新时代少年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重申，要坚决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严把握缓刑、减刑、假释，对性质恶劣、危害重大，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版面编辑：许金玲

心智｜运用负面偏差育儿不再焦虑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插画|董必奇

文|赵昱鲲

清华大学心理学博士

人类天生都有负面偏差，我们的心理会无意识地、系统性地受到更多负面影响，表现出过多的负面心理，比如焦虑、抑郁、仇恨、自卑等等。

这些心理本身并没有错，之所以能够进化出来，就因为它们能够保护我们祖先的生存和繁衍，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已经不像祖先的环境那么危险，因此这些负面心理经常显得过度。所以，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建设自己的正面心理，对冲掉负面心理的过度影响。

比如说育儿。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直很关注各种育儿理论和书籍的学习。但是越学也越心惊胆战：这育儿也太难了，既要关注语言发展，又要关注数学思维，还要英语启蒙，发展音乐技能，并且给予无条件的爱——意思是：既要给他报语言班、数学班、英语班、钢琴班，他不愿意去的时候还不能发火??

好在我是学心理学的，当我把负面偏差的原理应用在育儿时，一个结论就呼之欲出：避坑比拔苗重要。

父母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明显错过孩子的某方面发展，而不是着重培养TA某方面的发展。原因在于：缺失对孩子的影响远远大于支持。

比如，如果家长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或者家中给予的智力刺激不足，那平均说来，孩子发展出的智力会低于其基因所预测的智商；但反之未必然，父母拿了博士学位，或者给孩子上各种家教或私立学校，并不能显著提升孩子的智商。

很多研究都是在考察假如缺失了某个条件，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结论往往是如果缺少它，孩子会发展不好，因此这个条件很重要。但这并不能推导出，这个条件给孩子越多，TA就能发展得越好。要得到这个结论，需要另外的研究。

但是这样的研究往往没有，原因也很简单，研究者需要发论文，因此会优先研究那些效应比较显著的机制，不会冒险去研究可能没有结果的"正面支持效应"。可是很多普及者并没有Get到这一点，仍然是看到一篇"没有×××导致了严重后果"的论文，就大力呼吁要给孩子更多的×××。

有时候正面效应也确实存在，就是投入得越多，结果就越好。但这仍然不意味着在这方面投入得越多越好，因为其中还有机会成本。举个例子，婴儿出生之后应该和母亲有大量的皮肤接触。也有大量证据表明，皮肤接触能促进婴儿的大脑发育、降低压力和疼痛、稳定血糖和心肺功能。因此，有人建议，只要婴儿不拒绝，就要尽可能多地和妈妈有皮肤接触。

这个理论给很多妈妈带来了心理负担。有新妈妈就问过我：孩子是不是应该一直贴身抱着？我一天只能抱孩子三小时，是不是会对孩子将来发展有影响？我就告诉她：没关系。三小时已经够了，再多抱一点可能会更好，但是那个边际效应衰减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不值得投入。你还是把精力用在自身康复和其他比如哺乳之类的事情上更好。要强调的是，不要夺走孩子任何一方面的起码投入，转移到你觉得有前途的地方上去。

现在很多父母，牺牲了儿童的社交、体育锻炼、自由玩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中去，本质也是一样的。这些时间花在学习上，对儿童未来发展的提升很有限，但社交、体育、自主一旦降到了正常范围之下，影响就非常大了。

如果是家庭资源不足，那只能牺牲某些投入，那也要注意，最好是平均牺牲，而不要把某些方面牺牲到了靠近阈值的地方。

反过来，对于资源充裕的家庭，虽然是支持越多越好，但过了一定的范围之后，能够促进的也是微乎其微（注意这里说的是家庭支持对孩子发展的影响，而不是孩子自己的投入与TA发展的关系。家庭支持对孩子发展的影响，到了一定程度就几乎没有增长了，但孩子本身的投入，作用会更大）。

当然，以上各个假设和一个家庭的真实情况可能相去甚远，比如各个指标的重要性显然不同，投入和产出比也相差很大。但我想借此大概说明一个道理：孩子就像一株植物，最需要的是合适的条件生长，阳光、雨露、土壤，任何一项出了问题，就会长成畸形。给他们更多的光照、灌溉、施肥，会有帮助，但也大概只能使他们更加茁壮一点点，其效应远远不如防止出问题。

所以，与其孜孜于研究孩子的天赋，从小就开始大力培养，不如注意一下孩子的成长环境，和传统环境（最好是想象一下原始社会，不然农业社会也可以）有什么不同，补齐最起码的人际交往（爱、责任、合作、谈判、反击、情感交流等等）、体育、自然、挑战（挫折、艰苦、劳作）等因素，再慢慢地发展TA的优势。

孩子从小缺少环境刺激，智力会发展不好，但并不是说你给TA整天各种刺激，就能使TA成为天才。孩子如果缺乏爱，会形成不安全型依恋，但并不是说你每时每刻都给TA稳定而又温暖的反馈，TA就能发展出完美的性格。差不多就行了，你更要注意的，是不要在某一领域差太多。

好消息是，这也不难。正常投入就可以了，别为了某一个目标投入过多精力、忽略了其他目标就行。孩子只要有一个正常环境，就能很好地成长。

从负面偏差的原理出发，我就再也不焦虑了。我不再妄图成为完美的父母，而只要成为“还不错”的父母就行。因为要达到完美，成本太高，而收益仅仅比“还不错”高一点点。相反，在达到完美时，你更可能会犯错误，比如忽略了孩子某一方面的必须条件，而这种忽略带来的负面影响，会远远大于你的那一点收益。这就是负面偏差帮助到我生活的一个例子。

更多精彩请阅读：【专题】心智

版面编辑：许金玲

天眼｜暴雪降临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图|视觉中国

2020年12月30日，山东省荣成市，樱花湖畔，游客冒雪观赏天鹅。受强冷空气影响，荣成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雪天气，市气象局于当日下午4时继续发布暴雪橙色预警信号。随着今冬“霸王级”寒潮快速扩张南下，北方多地跌破0℃，局地累计降温超16℃。与此同时，中东部雨雪持续，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局地迎来大雪。

版面编辑：许金玲

回声（《财新周刊》2020年第50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财新网友：改革之路是确定性。

《惟改革纾困迎新》

8456395：事前监管意味着和现有利益体“硬刚”的问题，确实比较棘手。政策能否顺利推行，监管者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艺术”。

《难的是事前监管》

8678193：希望中国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伟大人物，把保障人权、依法治国、公平公正的理念普及到每个人的心中，推动社会进步。

《蔡定剑身后十年》

莫西干：从破坏式创新到烧钱式垄断，中国互联网玩家缺乏那种厚积薄发的王者气质。

《在线教育融资备战》

俏皮太阳：这件事情发生在短板核心领域的龙头企业身上，确实重创了对科技创新体制的信心。

《中芯国际调路线》

版面编辑：许金玲

读周刊看视频（《财新周刊》2021年第01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伴随一个物种进入临终时刻——@《财新周刊》《中国最后一只斑鳖》，相关视频：濒危动物的影像合集

相比产品打磨和盈利业绩，各机构现阶段更看重规模增长，但最终决定胜负的是教学能力——@《财新周刊》《在线教育融资备战》，相关视频：新东方在线孙畅：在线教育小企业不能把钱都花在营销上

美国资深东亚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于2020年12月20日意外去世，享年90岁——@《财新周刊》《张开眼睛看亚洲》，相关视频：傅高义与《邓小平时代》

宪法学者蔡定剑离世的十年里，他的家人、朋友和学生们合力推动其未竟事业前行——@《财新周刊》《蔡定剑身后十年》，相关视频：世间已无蔡定剑

2020年12月21日，部分影视从业者致媒体公开信，声讨近期在综艺节目中现身的编剧于正、导演郭敬明——@《财新周刊》《百名同行抵制郭敬明和于正》，相关视频：郭敬明谈电影与人生

版面编辑：许金玲

财新视听内容精选（《财新周刊》2021年第01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财新时间】高福：疫情仍存暴发风险，做好防护“三大件”

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各种场合向公众解读新冠疫情信息、提供防疫指导，提醒“保持警惕、做好防护”

【音频】财新Morning Call

监管部门对蚂蚁提出整改要求/国家发改委排查企业债风险

版面编辑：许金玲

答疑（《财新周刊》2021年第01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联系编辑部：邮箱newsroom@caixin.com或电话（010）8590 5000

深圳读者 向西：

流行在年轻群体中的"盲盒"是什么？为何近期争议四起？

本刊产业新闻部：

"盲盒"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时不清楚样式"盲买"，买到这一系列里的哪款全凭运气。其底层逻辑是抽彩式购买，具备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受外观、造型等因素影响，即便同一系列的产品也分为"身价"不同的热门款和冷门款。隐藏款通常因其稀有程度而身价最高，在二手市场能获得数倍溢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消费者低买高卖的投机心理。

在宣传中，盲盒运营商一般声称盲盒中的玩偶随机放置，抽取的概率相同（隐藏款除外）。在此条件下，盲盒消费是用户自愿参与购买的"游戏"，其数量供应的透明度就非常重要。

近期引发争议的"二次销售"问题，本质上影响了盲盒的供需，破坏其消费的随机性。而从现状来看，盲盒在不同款式的供应上是否公平、做到真正的"随机"，监管仍存在诸多不透明之处。

太琨律合伙人管理委员会主任朱界平认为，盲盒这种消费模式，具有一定的赌博特征，与正常的商品交易有本质区别。此外，如果盲盒运营商隐瞒购买到某款玩偶的真实概率，或投放的商品种类和实际公布的不相符合，均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

前述资深消费者告诉财新记者，盲盒圈内黄牛猖獗，主要以直接端空限量款为主。黄牛并非爱好者且扰乱市场。而对于黄牛"买空""摇盲盒"等行为，商家也不怎么管，有时会采取限购措施，但并非每次都限购。

版面编辑：许金玲

显影｜2020：挺住意味着一切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往年驻足岁末年关时，回望的目光里往往有温情和眷恋。而在2020年的末尾，回望却显得尤为残酷和艰难。新冠阴翳遮蔽了整个2020年，让全世界“宕机”；从年初到年尾，一连串伟大的名字从此黯然静默……2020年的每一页日历，都被忧伤所浸透。疫情未竟，尽管新的一年中我们仍要在口罩下大口喘息，但与此同时，每一双眼睛也都在祈望新的黎明



《财新周刊》 图|财新记者 郭现中 梁莹菲 陈亮 蔡颖莉 丁刚 魏姝敏 文|财新记者 郭现中

一

这一年，就这样踉踉跄跄地来到了尽头，然而旧日难辞，国内此起彼伏的新冠报告不停在告诉我们它依然如幽灵般在暗处潜伏，随时会将人瞬间吞噬。而全球感染人数也已经逼近1亿，从来没有一种疾病如它一般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更可怕的是，它还远远没有到顶，一眼望去的“新”年，除了日历是新的，其他一切的艰难困苦都还在继续。

难说缅怀，可也无法怀恨。如果怀恨，也许我们也只是把一切的不是都简单草率地丢给了时间。我们确实是在这段时间里不停地失去，一些自由、一些习惯、一些风景或是一些人，以及与此相关的故事。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获得与失去都是人生同样重要的一课，只是我们太执着于前者，太恐惧于后者，直到不停地失去，直到你失去痛感。

二

我的职业首先是一个摄影记者，惯于手拿相机，到第一线去，去看见、去经历、去记录，在镜头或者心里。

只是现在更多的时候，我就像一个教练，必须坐在第一排，看着年轻一代的记者去冲锋陷阵，看着他们流汗或者流泪。

有太多难忘的瞬间，一直会在我的脑海里闪回。 忘不了梁莹菲拍摄的那张广州抢购口罩时，夹着钞票的枯枝一样的手，像极了等待领取食物的灾民，同样，我也会记得只穿着简陋防护服的她独自在空旷的街头徘徊的样子；忘不了丁刚拍摄的武汉医院门口披着雨衣当防护服的无助妇女，同样，我也会记得同样缺少防护服的他，采访结束把自己关在房间默默吞咽恐惧的样子；忘不了陈亮去内蒙古拍摄感染布鲁氏菌，被日夜折磨面对镜头目光呆滞的兽医们，同样我也会记得他主动跟我说：“还是我自己去吧，我已经有孩子了。”（注：布病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染，感染后除了疼痛，还会影响患者的生育能力）；忘不了魏姝敏镜头里蜂农自杀的那片油菜花田，明晃晃的耀眼，蜜蜂的嗡嗡声还在，人却已化作一缕青烟；忘不了蔡颖莉拍摄的被洪水洗劫一空的百姓的眼泪，同样，我也会记得，她惊魂未定地跟我说下午冲锋舟被树枝划破了船底，一边舀水才得以返回；忘不了张芮雪把自己埋在齐腰深的冰冷淤泥里采访的样子，同样的，我也会记得她拍摄的凉山棒球少年时说的，如果成不了运动员，那就努力实现下一个梦想，如果还不能实现，再努力实现下一个梦想??

连接起来，就是这些记者的一年。

年末团建时，在中路藏寨客栈的楼顶，暖洋洋的太阳底下，这些稚气未脱的记者终于脱下盔甲，四仰八叉，横七竖八地躺着、哼歌、睡觉、玩无聊的游戏。他们都做回了孩子。

就算是我，也想知道，这些可爱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而拍摄？他们又为什么而如此拼命？

三

《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R.卢斯70年前的话：看一看生活，看一看世界，亲眼目睹重大的事变，留心观察穷人的脸庞和得意者的姿态；看一看奇异的事物：机器、军队、芸芸众生、丛林和月亮阴影；看一看男人的工作：他的绘画、城堡与各类发现；看一看男人爱慕的女人以及众多儿童；看一看千里以外的事物、一旦趋近就有危险的事物，隐匿在墙壁后面和屋子内部的事物??

这，说的是作为一个记录者首先需要的好奇心。

除了好奇心呢？

这一年，世界充分展现了它复杂凛冽的另一面。瑞幸作假、蛋壳破碎、蚂蚁叫停，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你来我往，裹挟其中的每个人也都像极了某种野兽，要么四散奔逃、要么引颈就戮，用“认命”来向命运告饶。

这一年，我们愤怒、我们悲伤、我们歇斯底里、我们颠沛流离。我们在黑夜里唾骂，醒来又睡去；我们在天亮前辗转，记得又忘记。我们怯懦又慌张，却只能装作镇定如常，哪怕前一刻已经是一摊泥，喘息片刻你还是会把自己塑成人样。

电影《至暗时刻》里有句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记得我们的记者拍摄的张玉环出狱的纪录片里最后一个镜头，他的前妻宋小女一字一顿地说了一句话：再爱、再爱、再爱，都埋在心底吧，那是回不过去了。

万般无奈地一笑。

27年啊！没有谁知道她是怎样熬过长到无涯的挣扎，一次次心死又一次次发芽，最后才能在见到爱人的那一刻在脸上开出了一朵花。

这可能是这一年里最让我感动的画面之一了，而坐在对面的记者们，他们其实和宋小女一样，也经历着自己世界的惊涛骇浪。但他们的内心必定住着一样的小孩，永远好奇、永远心存善意，无论多少次摔倒，还是能爬起来对世界微笑。

能让人挺住的，只有爱、再爱、再爱。

四

我们终于可以和2020年说再见了，虽然我们知道，很多的再见其实就是再也不见，很多的生离就意味着死别。

爱，是惟一的凭借和凭证，爱是你的来处也是你的归途。

霍金说，如果没有我爱的人在那里，它只不过是一个空荡荡的宇宙。

去爱你所爱，你的父母、子女、你的爱人、你的世界，你脚下的土地与远方的陌路。我们用力画下一个句点，但愿新的一年我们能不再重复尝过的苦。

且行且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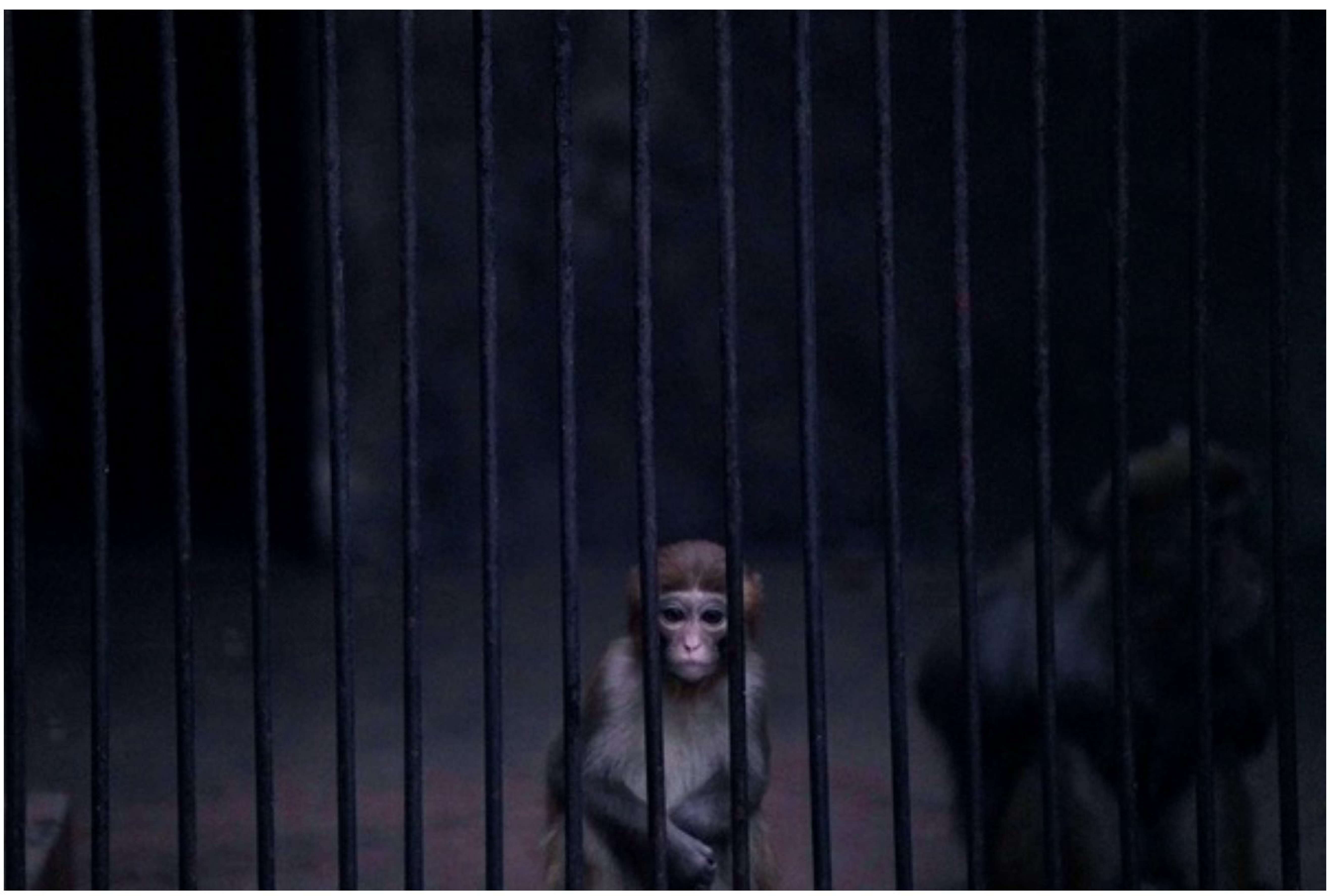
01.2020年2月25日，云南省禄丰县彩云镇，16亩滞销的尤加利被烧毁。这种被花艺界誉为“百搭之王”的灰绿色调植物，每亩年产值在1.2万元至1.5万元。在云南，它还有另一个名字：脱贫攻坚的“钱串子”。老去的尤加利没有经济价值，为了不误下一季的收成，农民只得将它们烧毁，把希望寄托于新生。云南省花卉产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温玉杰称，受疫情影响，云南花卉产业一季度预计损失近百亿元。图/财新记者 陈亮



02.2020年2月4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诊抢救室外，一名没有防护服的家属，头裹身披塑料布当作防护服，戴上了三层医用口罩。其丈夫因癫痫发作入院抢救，因得知急诊抢救室内收治多位新冠肺炎患者，没有防护服的家属用塑料布替代。这是武汉最艰难的时期，大量新冠患者使医疗系统几乎瘫痪。图/财新记者 丁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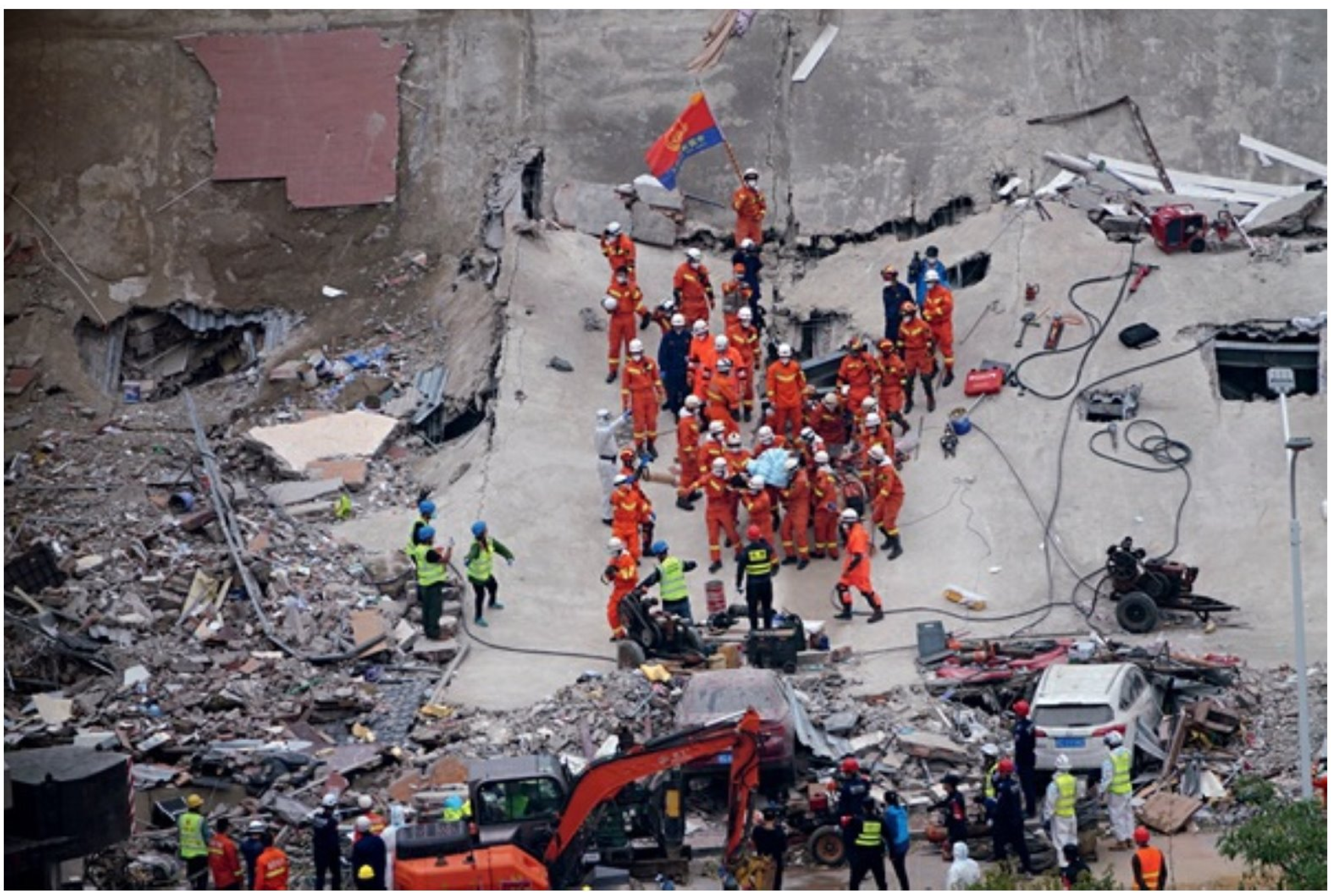
03.2020年1月22日晚，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内一位疲惫的候诊患者。武汉“封城”的前一晚，我进入了离华南海鲜市场几公里外的红十字会医院，大厅、门诊室、住院病房被挤得水泄不通，充斥着抱怨和咳嗽声，门诊部的人越挤越多，我立即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口罩戴得很严实，在全是水汽和雾气的护目镜里，我在紧张的氛围中拍下忙碌的医护人员，眼神中透露焦灼、无助甚至绝望的病人和家属。图/财新记者 蔡颖莉



04.2020年3月28日，“封城”期间的武汉动物园。傍晚，我们在无人的动物园中迷路，遇见了一只小猴子，我和它对望拍下了这张照片。也许是它很久没有见到过游客，一会儿看看天空一会儿警觉地看看我们。 图/财新记者 丁刚



05.2020年1月24日，武汉“封城”第二天，广州开始实施公共场所严格佩戴口罩的规定，市民需要网上预约才能购买口罩，然而这种方式施行的第一天，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随着国内口罩产量快速提高，恐慌才得以缓解。 图/财新记者 梁莹菲



06.2020年3月7日19点，福建泉州鲤城区欣佳酒店发生坍塌。新冠疫情暴发后，欣佳酒店被改造为区级医学观察点，用作隔离观察湖北（武汉）、浙江省温州等重点地区返回鲤城区的人员。事发时楼内受困人员71人。此次事故共造成了29人死亡、42人受伤，其中有一家五口全部遇难；直接经济损失5794万元。7月14日，事故中违纪失职的49名公职人员被严肃追责问责。图/财新记者 魏姝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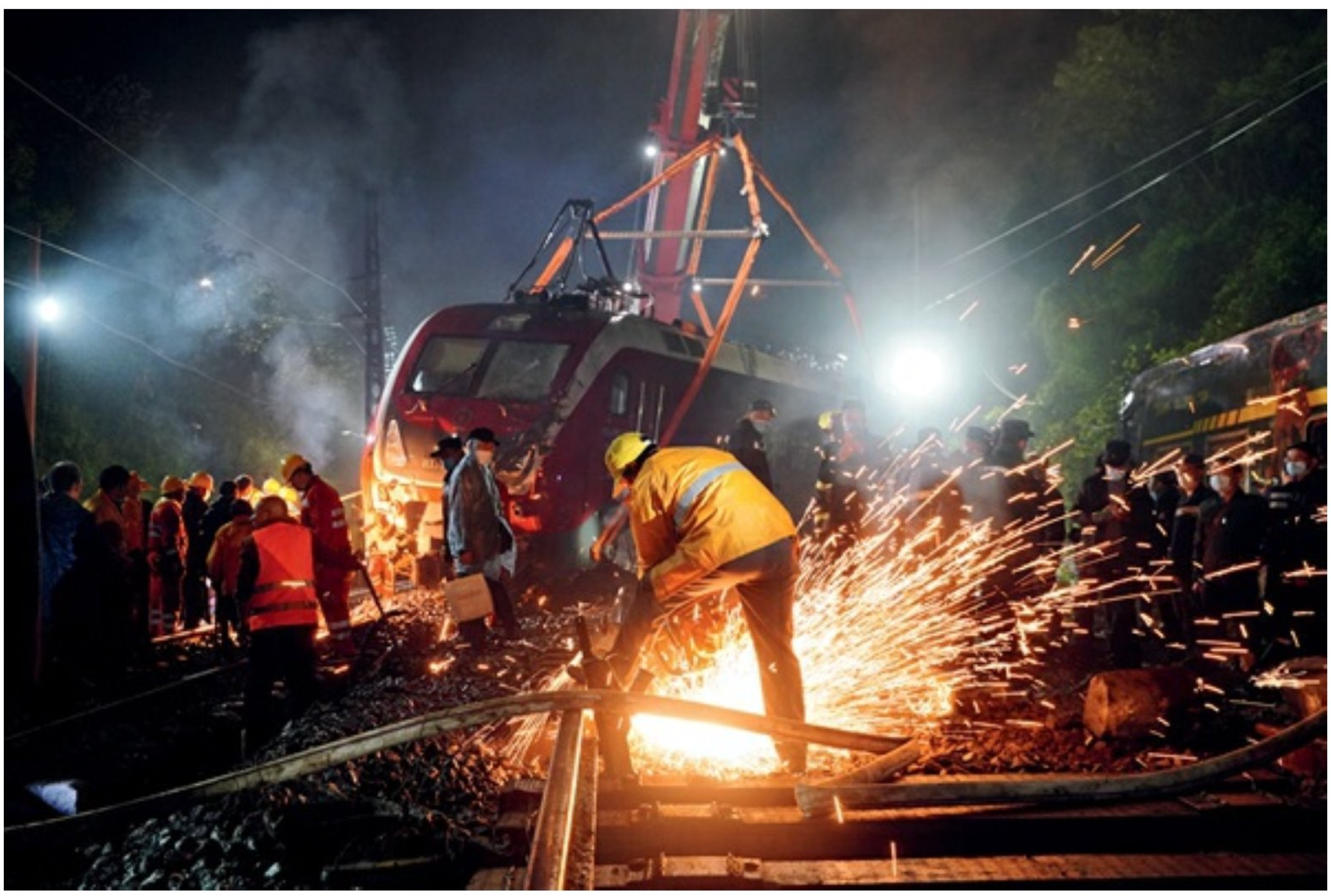


07.2020年4月18日，广州大塘村，村里的公寓经营者走到街上，表达希望房东减免租金的诉求。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广州各个城中村采取封闭式管理，流动人口大幅减少，公寓的生意额也一落千丈。大塘村是广州著名的“湖北村”，聚集了大量来自湖北的制衣厂老板、制衣工。2020年下半年，随着国内疫情平复，外贸订单不断增长，大塘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图/财新记者 梁莹菲


08.2020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降半旗致哀，一对年轻情侣在国旗下相拥。国务院发布公告，在这一天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在此期间，全国和驻外领事馆下半旗致哀，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哀悼，各界民众自发悼念逝者。 图/财新记者 蔡颖莉



09.2020年6月14日，浙江温岭，槽罐车爆炸事故现场，罐体严重扭曲变形，附近的工厂和民居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浙江温岭6月13日发生的槽罐车爆炸事故造成20人死亡、24人重伤，再度引发公众对液化石油气等危化品运输管控问题的关注。图/财新记者 梁莹菲



10.2020年3月30日上午11时40分，T179次列车经行京广线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境内，火车司机突然发现山体塌方，虽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但已经来不及，最终列车撞上塌方体脱轨侧翻。事故致1名乘警殉职、127人受伤。当晚11时许，抢险救援人员仍在冒雨进行工作。 图/财新记者 魏姝敏



11.2020年7月25日，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南棚村石大圩塌陷决口处上游堤坝，为应对未来几日巢湖流域的降雨，解放军正在用钢板和木板加固土坝。这条河叫白石山河，本是巢湖一条平静的小支流，如今已是地上悬河。站在堤坝上，另一侧是村庄和农田，肉眼可见有洪水从土坝底部冒出，不敢想象一旦决堤将面临何等场面。我下意识地思考着，一旦决堤，我该如何求生。堤坝上的土踩上去像棉花般松软，我不小心失足踩在土上，几乎整条右腿陷了下去。想起这一瞬间如今还感到后怕。 图/财新记者 丁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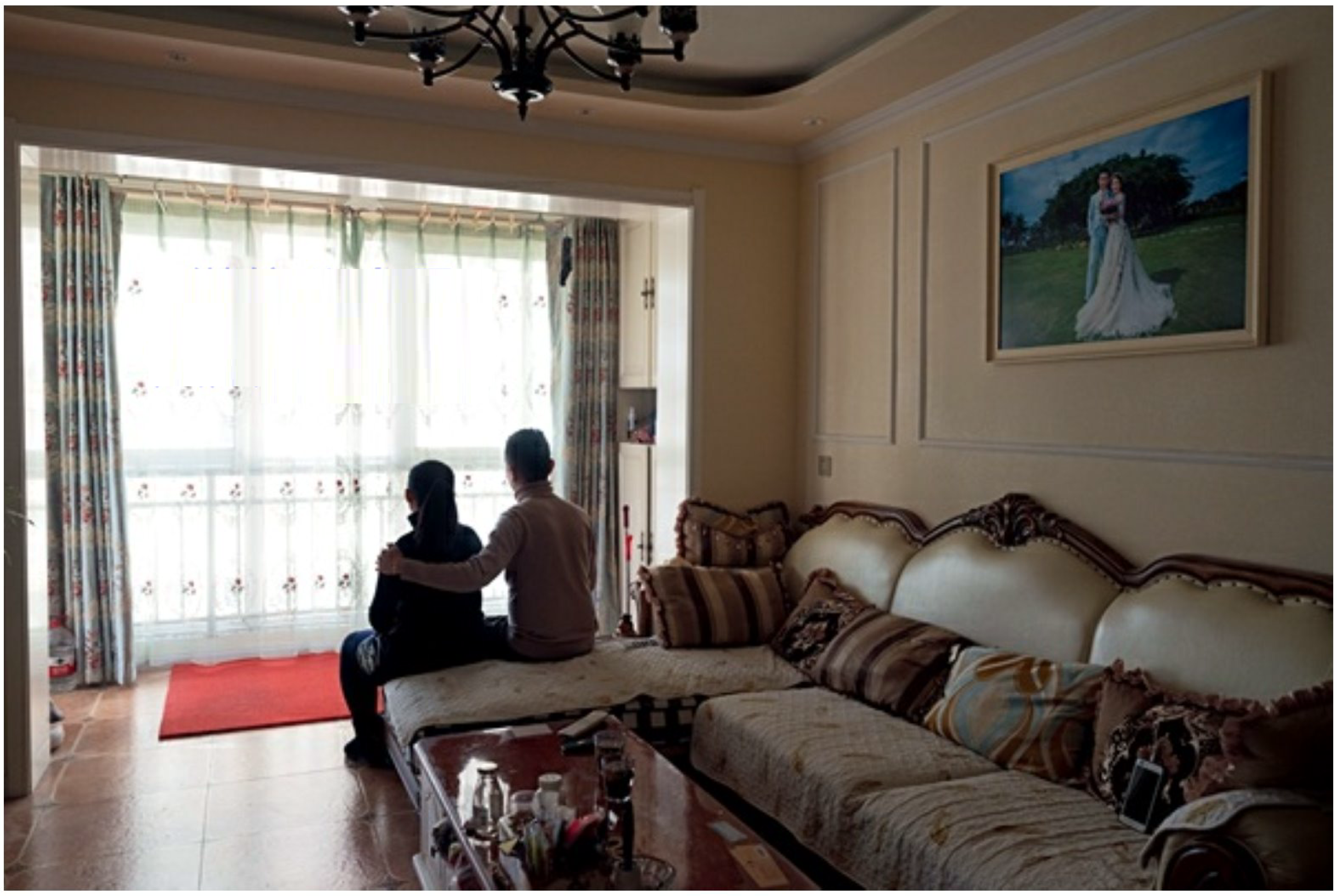
12.江西鄱阳县油墩街镇，连场暴雨过后，居民们撑着伞在涨水的河道旁走过。2020年7月上旬，受安徽等上游地区降雨及泄洪影响，以及县内持续降雨，鄱阳县内河流、湖泊水位暴涨。8日下午1点，横贯油墩街镇，直通鄱阳湖的西河漫过北堤，并先后冲出四处决口，堤旁的五个行政村顷刻间遭洪水围困。约9000人紧急转移，9栋房屋、两座桥梁被冲毁。 图/财新记者 梁莹菲



13.2020年9月，云南昆明西山区碧鸡名城小区，住进“烂尾楼”的业主燃烛照明。他们在网上留言反映情况，昆明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称，云南碧鸡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取得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预售许可证明后进行销售。目前该项目在引入新的投资人方面进展不大，项目全面重启难度较大。并称，“省、市住建部门已启动全力清理整治‘烂尾楼’的工作，该项目已列入范围”。截至目前，该小区“烂尾楼”问题仍未解决。 图/财新记者 陈亮



14.2020年11月伊始，正值交易旺季的“皮草之乡”河北肃宁县，生皮交易市场内人头攒动。皮肉下附着油脂和血，让我略感生理不适。堆成山的皮张之上，是等待售卖的商贩，像是一场残酷的饕餮大餐。近年来市场低迷，大量皮草从业者亏损、转行。疫情的到来，让皮草之争再起。与此同时，丹麦水貂感染新冠，更是让皮草行业如履薄冰。 图/财新记者 蔡颖莉



15.2020年1月，张涛和怀孕中的妻子对布菌感染这个事实手足无措。他们参加过马拉松，一直自信身体很好，无法想象陌生的布病会感染自己。此时妻子已经怀孕三个月，咨询的多家医院说法不一，留着孩子可能生下来就带病，流掉可能再难怀上，纠结到最后还是没舍得流掉。12月3日上午，兰州市政府召开新闻通气会称，截至11月30日，当地实际检测68571人，经省疾控中心复核确认，抗体阳性人员10528人，是2019年12月底公布数字的50倍。图/财新记者 郭现中



16.2020年11月11日，沈阳，一名HIV感染者郭醒正在租住的村子后山收集柴火，以度过漫长的严冬。郭醒今年59岁，对感染者来说刚刚步入了老年。和衰老一同到来的，是病毒的威胁不断加重，是独自面对晚年生活的寂寞。在社会里饱受歧视，郭醒选择独自搬进一座小山村里，努力过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抗病毒治疗的普及，更有效的药物被不断研发出来。健康活到老年的HIV感染者也越来越多，如何为这一群体的晚年生活提供医疗保障和社会支持，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图/财新记者 梁莹菲



17.森林深处的猎民点，雨果看着手机里下好的短视频，母亲留霞喝着啤酒。"鄂温克最后的森林女王"是我的一个长期选题，我和他们像家人一样共处，留霞给我取了鄂温克名字"贝尔"，是月亮的意思。上一次去森林中找留霞，是一个傍晚，雨果第二天才上山，我就先去了。她眼睛不好，开始她并没有能认出我来，本能地问我找谁，让我离开。后来我指着天上的月亮说道："我是贝尔呀，月亮！"她突然反应过来迅速转变了脸色，跳起来拥抱我，"是贝尔啊，我的好儿子，你怎么才来呀"，拉我进温暖的"地窨子"，那一刻我能感受到热泪在眼眶打转。 图/财新记者 丁刚

视频说明：**2020，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席卷全球的疫情充斥着我们的记忆。其实，疫情之下，我们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回首2020，你会想起什么呢？**

版面编辑：许金玲

随笔｜你好，大白鲨！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就像男人永远不可能体会到女人的分娩之痛，一个健康的正常人也注定不会理解强迫症究竟意味着什么



文|宋朝

媒体人

不速之客

2002年5月下旬，朝阳区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门房接待了一位中学生模样的访客。

“请问董兴文老师在不在？”访客进来便问。

“董兴文？您找他有什么事？”门房是位四十多岁的阿姨，中等身材，留着短发，看起来非常和善。

“他写过一本书，我是他的读者。”来者把手上那本《战胜挑战：心理保健和调节艺术》的书给她看。

其时，离高考仅剩一个多月，得知对方从河南赶来，又在读高三，阿姨顿时有点哭笑不得：“现在不该忙着备考吗？你竟然还有时间跑来跑去！”她边让座边说道，“我女儿也在读高三，她都快忙死了。”接下来，她很快了解到，与曾在这里做高级编辑的董兴文一样，这孩子也有强迫症（OCD）——他正是为此事而来。

“董老师每次去卫生间，洗手洗得出不来。这我可知道。可你来晚了，他已经退休回天津了。”阿姨为孩子感到遗憾。

在小说《无尽的玩笑》中，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将抑郁症比作“痛苦的大白鲨”。某种程度上，强迫症是另一条大白鲨，准确地说，是一条被渔网困住的大白鲨。很多人对强迫症的理解，只停留在“洁癖”层面；就像男人永远不可能体会到女人的分娩之痛，一个健康的正常人也注定不会理解强迫症究竟意味着什么——你只是看到他在洗手，却不知道，他的头脑中有个小剧场，在那里，为了存活而挣扎的戏码无时无刻不在上演。

“我不想死。”一个声音说。

“死了也不错。”另一个声音不甘示弱。

我对那个剧场再熟悉不过，原因很简单，上面提到的那个不速之客就是我。

董老师提前退休的消息，浇灭了我上考场前彻底治好强迫症的最后一丝幻想。现在回忆起来，这想法很天真，因为没人能用如此短的时间治好强迫症。要是那时有人告诉我，你很有可能要一辈子带着这种病生活，就像糖尿病人带着高血糖，唐氏综合征病人带着“国际脸”那样，你会不会更绝望？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事情虽然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好，但也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坏。这个法则大概可以用到所有人身上。

最后悔的事

2018年，《卫报》发表了女作家帕特里夏·格里萨菲的文章《可怕的“要是……会怎样”：强迫症如何让每一天变得生死攸关》。她在文中回忆了12岁那年，她和朋友在商场美食街消磨时间，有个手指缠着创可贴的店员递过来一个肉桂卷。

“谢谢！”她说。就在那一瞬间，她感觉身后的楼塌了，噩梦从此开始。只要在外面吃饭，她便担心有人“尿到、吐到、拉到”她的食物里。和很多强迫症患者一样，对疾病和不洁的恐惧完全支配了她。实际上，格里萨菲的强迫症状在她8岁那年便已显现。比如，每次进卧室之前，要将门把手向右旋转，必须数到8，如果感觉良好才能进去——她脑中有个神秘的念头：若是做得不对，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强迫症不是精神病，只是一种心理障碍。我自己的感受是，这种心理疾病之所以痛苦，源于理智从来不曾缺席。一方面，你为自己的想法或行为感到羞耻；另一方面，非理智的求生欲又如此强烈，在精神交互作用下，它大多数时候会占上风，说是场拔河比赛也不为过。

和格里萨菲不同，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习惯是“数到3”。之所以选择这个数字，大概是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此外，我会把一段楼梯分解成三步，跳上去或跳下来；放学时经过一座小庙，我会默默拜三下，不一而足。久而久之，已经变成习惯——我就是带着这些习惯读完了小学。严格说来，“数到3”并没有让我痛不欲生，它顶多给我带来一些不便。不可避免地，我很早就过着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与此同时，强迫症的种子已经悄悄埋下。为了消除不安，小小年纪我便发明一套仪式，殊不知，仪式也在塑造我的性格。

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我考上了县城初中，作为少有的几个农村寄宿生之一，有段时间我借住在亲戚家，还有段时间借住在同学家。由于缺少生活常识，三年时间，我把痢疾、疥疮和沙眼得了个遍。感冒了，就去附近一个眼科诊所看病，有位从医院退休的老太太给我开了副药，等药物不良反应开始发作，我才知道那是眼药。随着学业压力与日俱增，加上严重的自卑感，我感觉自己得了神经症：不断地回忆琢磨老师在课堂上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甚至每一个眼神背后的含义；某日上体育课时，突然对“星期五”有了不祥的预感，为了弄清根源，我日夜苦思冥想。

凡是看过电影《小孩与鹰》或是《征服者佩尔》的人，恐怕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和大人一样，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弱者，有时同样需要面对一个不确定且充满敌意的世界，那是成人社会的倒影。可想而知，作为一个远离家人的小“神经病”，日子只会更难。至今记得，我的同桌，一个自制力强、嘴唇没有血色的女生，整整一年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她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惩罚我叫她“小米汤”——那是她嘴唇的颜色。印象中，母亲也经常用不说话这种方式惩罚父亲，但她很少能超过两周。和我这个乡巴佬不同，“小米汤”很爱干净，上晨读课前，她会用湿布把课桌擦干净，而且永远只擦半边。

初中毕业前，有一天接连发生几件大事：我的学生证被政教处一位小个子老师没收了，那上面有张卡通不干胶贴纸，他看着不顺眼；上数学课时，我的右眼突然睁不开了；奶奶去世了。

又过了几天，家里托人给我捎信说：奶奶晚上入殓，放学后马上回家，见她老人家最后一面。“如果今晚回去，你妈妈就会死掉。”这时脑中有个声音说道。我挣扎很久，最终没有回去。这成为我初中时代最后悔的事。

致命接触

从初中到高中，强迫观念（伴有自由浮动性焦虑）折磨我长达六年。由于环境封闭，大多数时候，我连个倾诉对象都找不到。别人只会告诉我，“只是青春期综合征”“不要胡思乱想，你想太多了”“把精力用到学习上，比什么都强”。我只能庆幸，自己很早就从书中找到了那三个字，“强迫症”。

最痛苦的时候，精神科医生给我开过盐酸氯米帕名片，还有别的什么药。那是高一上学期，某个周末，我在书店看书，发现有一页染成了红色。这是一次“致命接触”，起码我是那么认为的：它不像印刷事故，更像是片血迹，也许是艾滋病人留下的。回到学校，我开始不停地洗手、洗衣服，甚至不敢吞咽唾沫，只是可惜，“病毒”的观念已经在我脑中生根，再也无法摆脱。又过了个把星期，班主任终于发现我有些异样，那时我的座位下面已经变成小河——那是我的口水。此外，他还注意到这孩子上课经常回头看，有时一堂课回头几十次，仿佛鬼上身。

他把我叫到教室外，先帮我整了整衣领，然后问道：“你为什么总是回头看，可以告诉老师吗？”

我身后坐着一对双胞胎。为了不影响她们，我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座位换到一个角落里。

时过境迁，今天再去回顾自己的高中时代，很像在密闭的潜水钟里待了几年。毫无疑问，潜水钟不利于强迫症患者。和初中生活的刻板乏味相比，高中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旁边是门，经常会冒出某个念头，比如，要不要脱光了跑出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类似荒诞不经的想法只是在脑中一闪而过，并不会太在意，因为很清楚，想和做是两码事。但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赤身裸体跑出去的画面一旦出现，对抗便开始了。这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是干预（“我会变成大笑话，无论如何不能那样做”），跑出去的冲动反倒越发强烈。强到什么程度呢？似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我总想一丝不挂跑出去。”后来我终于有机会把这个烦恼对心理医生说了。

“那又怎样！”她坐在那里，像个女将军，一副镇定自若的表情。

“那样大家都会看见。”

“没什么大不了，看见就看见吧。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她看着我说道，就好像她也干过同样的事。

“还有件事……我总是一遍遍回忆，自己有没有引爆家里的煤气罐，却又想不起来。我有可能做了，也可能没做。”

“想做就做。”她说，神态依然很轻松。

“那样家人都会死的。”

“那又怎样？！”

不得不说，我后来之所以能回归正常生活，“那又怎样”女士有一半功劳。2002年北京之行，虽然没有见到董兴文，我却遇到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她在北京广播学院素质教育院工作，就是上面这位。

“任何人都有陷入精神危机的基因。”晚年致力于森田疗法研究和推广的冈本常男先生曾说。在《克制自我的生活态度》一书中，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了自己与森田疗法邂逅的过程。“现在，我每天生活得十分愉快。”书的开篇这样写道。

2003年，我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其时我正在湖南读大学。更早之前，我已经接触过森田疗法，确切地说，是在高二。现在很难想象，在那所县城高中，有位爱好舞剑的老师，他的业余爱好如此广泛，正好收藏了一本森田正马的著作。“看完一定要记得还给我。”他特意嘱咐。和冈本常男一样，森田正马也是神经症的受害者，两人的性格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敏感且过度内省。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神经症之所以在日本非常普遍，某种程度上和日本文化是耻辱感文化有关，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治疗强迫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森田疗法”是在日本诞生的。

有人为了战胜强迫症，跑到非洲去猎狮，这是森田先生讲的真人真事。除了“顺应自然，为所当为”八字箴言，我对书中“非洲猎狮”的印象最为深刻。故事的结局是，狮子被勇士打败，死在了“仇人”的枪口下——他以为自己从此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问题是，等他从非洲回来，强迫症也回来了。

最后一次祷告

“二战”时有过从军经历的法国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曾说，“1939年我正好22岁，对此我非常满意。这是特殊恩宠。”对于残酷的记忆，人类有种矛盾心理：过去确实不堪回首，但不堪回首本身又蕴含魅力。尤其当我们慢慢变老，才会意识到，残酷也许是一次生活的机会。因为很有可能，这样的机会以后再不会有。

既然大多数青春都令人不快，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某些人的青春由于格外痛苦，以至于会被选中永远留在那里？就像少年维特永远是少年那样。强迫症最让我受益的地方，是它让我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和思考，某种程度上，它让我见了世面。现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很狭窄——外部世界的动荡不安，或是遭遇一次精神危机，反而使现实得以不断扩展。

6岁那年目睹母亲被打，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记忆。起因是一块宅基地的纠纷，为了驱赶我们一家人，邻居在屋顶放起了鞭炮。那些打母亲的人，是本家的几个叔叔和大伯。有个怒不可遏、满脸青春痘的年轻人，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准备当场把母亲拍死，幸亏有人及时拦下。看到眼前一幕，父亲吓得逃走了。

“离炮仗远点……”他远远地冲我喊了一句，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那以后，母亲经常抱怨头疼，这毛病是当年被打留下的后遗症。“要心胸开阔，眼光放长远，”这是她教育子女的方式；“要记住那些打妈妈的人，记在脑子里……你还记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每次犯病，她就判若两人。她是个要强的女人，和丈夫吵了一辈子，两人从白天吵到黑夜。由于生活不顺心，平时很少见她笑。上世纪80年代末，在农村，女人如果苦闷到极点，又找不到出路，就会选择自我了断。至于了断的方式，无非是上吊、投井、喝农药。

“也许哪天你放学回到家，妈妈已经死了。”小时候，我不止一次听她这样说。

死亡的阴影笼罩了我整个童年。即便在学校，我也过得提心吊胆——既然母亲把自杀挂在嘴边，在一个孩子看来，它早晚会真的发生。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这个计划推迟。从上学前班开始，我就养成一个习惯：上学前，一定要把家里的剪刀藏好，就像父母怕孩子贪吃，会提前把糖果收好那样。为了不让她产生自杀联想，有时候，我会特意把剪刀尖头朝里摆放。为了自我安慰，我迷上了做各种仪式，包括祷告。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秋日奏鸣曲》里有句台词：母亲的不快乐将会变成子女的不快乐，就像脐带从未剪断。很大程度上，强迫症是母亲早年送给我的礼物，可以这么说。那些家庭幸福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冬天一个人跑到地里，扒着井沿找母亲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有一点我得承认，强迫症让我认清了自己的性格缺陷，比如敏感、自卑和怯懦。真正意义上的转变，是我准备复读那年。这一次，我想换个环境，确切地说，是去黄河以南30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小县城。不出所料，母亲坚决反对，再一次，她以自杀相威胁。那年我已满18岁，我当时对她说，希望你不要那么做，但是如果你非要那样做，我也没办法。

等我上了火车，突然有种预感，这次真有可能失去她。和小时候一样，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在这一刻，至少从精神上我把脐带亲手剪断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祷告。

两个月后，等我放假回到家，母亲正在晾晒玉米。那天天气很好，屋里屋外到处是黄澄澄的玉米棒子，和所有庄稼人一样，她喜欢蹲着干活。她向儿子抱怨粮食的价格太低，却对他当初离家出走只字不提。显而易见，她已经接受了现实。重要的是，母亲还活着，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

找到彼此

当我踏上那列火车，当然不会知道，300公里远的前方，有个真正的朋友在那里等我——就像诗人里尔克说的，在共同的时辰，在共同的风暴中，在彼此遇见的小屋里，我们找到彼

此。

事实上，他是另外一个我。我俩身上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包括虚荣心、小聪明以及城乡接合部的背景。惟一的不同，他是个心宽的胖子，而我不是。远离家乡的好处不胜枚举，这里没人认识你，所以你没有过去，跟刚出炉的面包没什么区别，当周围全是硬邦邦的棍子面包在行走，只有你酥酥软软。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尽情发挥最好的一面，而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

真像做梦一般，我在新学校不仅交到了新朋友，还自作主张摇身一变成了美术生，开始学画画。为了庆祝新生活，也为了将来的艺术生涯，我给自己起了个艺名。有意无意地，我在实践“森田疗法”，以前只在书上看过，现在我要去做，去验证。

“森田疗法”的理念很简单，任不安常在，同时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像，但毕竟不是，所以在这里，假装很重要。并不难理解，因为在现实中，“假装”无处不在：假装是个大人，那是孩子进入成年生活的必经之路；假装在睡觉，那是在为入睡做准备；假装是自己的母语，那是学会一门外语的前提；就连C·S·刘易斯都说，俗人想成为基督徒，假装信仰上帝是个捷径。

强迫观念将人置于一种异常荒诞的境地，我对此深有体会。有多荒诞呢？首先，它与人的真实意愿相悖，你越是恐惧什么，它越怂恿你去做，周而复始，像上了发条一样。天长日久，你跟现实慢慢脱节，生活在一个纯观念、虚假的世界。该干什么干什么，森田正马如此鼓励强迫症患者，因为做的过程就是与外部世界连接的过程。总有一天，你会听见“咔嗒”一声，那是进入真实世界的信号。对我来说，除了“咔嗒”，还有一块蛋糕。

离开家乡之前，我的朋友少得可怜。当我需要倾诉时，就会写日记，这个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高中三年，我与别人交流最多的一次，是失窃的日记被同学传看，那里面有我对每个人（包括老师）的看法。如果不是因为复读，遇到那个心宽的胖子，我的青春期将是一片空白。说得夸张点，是电影让我们认出了对方。认识他之前，我已经看过一些电影杂志，巧合的是，他的人生志向是做个导演。就这样，在一次画室举办的聚会上，我主动和他攀谈起来——用极其蹩脚的普通话。多年以后，他对我说，“你的普通话有股马粪味，幸好我喜欢马粪。”当天晚上，晚自习结束后，这位朋友出现在我的教室门口。

“今天是我生日。”他说，手里拿着一块蛋糕。

就这样，刚认识几个小时，我就去了他家。通过他，我认识了更多朋友。后来，我们又一起去北京参加专业课考试，也许是因为共同经历了太多，直到今天，虽然不时碰面，可是只要打电话，还能聊个通宵。这么说吧，我人生一半的朋友，最初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学是我的朋友，他的妻子是我的朋友，他的妻子的姐姐、表妹和表弟也是。正是在这个小圈子里，我学会了与人交往，建立了自信心。“森田疗法”告诉你，去生活；友谊最伟大的地方，是它赐予你生活的动力。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你的强迫症彻底好了吗？没有。我只能说，它不影响我正常生活。这个回答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但话又说回来，世界上有“彻底”或“绝对”这回事吗？冈本常男治好神经症后，说他“每天生活得十分愉快”，那是一种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心情。问题是，爬出来之后呢？正常人有正常人的苦恼。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为现实烦恼，比盯着一个开关连续琢磨几小时要好。

感谢所有人！

版面编辑：许金玲

专栏｜责任有限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在一个有风险的社会，如果我们想要享有权利，想规避自己承担不起的责任，就得承认“有限责任”这个前提，它是现代社会的基石

文|维舟

作家、书评人

2020年令人一言难尽。在疫情带来的不确定风险面前，即便是那些一贯乐观的人，也都难免“压力山大”。这也可以说是对社会的一次压力测试——人们在面临异常变动时，自然而然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回应，这既是个体在面对风险时的选择，也体现出社会的某些结构性特征，甚至决定后续的走向。

毫无疑问，当压力超出自己承受范围时，一个人很难始终保持精神振奋。如今很多年轻人选择“躺平”，不管怎样，至少对其本人而言也算是减压；但也有一些人可能连退出也无法做到，面对茫茫无际的庞大世界，孤立无援的原子化个体往往不得不在无力、无助中陷入抑郁。

按理说，原本应由相应的社会机构提供协助或心理干预，使个体能够打开心结，重新面对自己的问题。然而，当下社会既缺乏这样的专业机构，也没有成熟的干预机制。在很多院校，广泛采用的是筛查手段：逐个甄别出有抑郁症倾向的“问题学生”，予以重点关照。

乍看起来，这是负责任的积极干预，但不幸的是，在现实中它常常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些辅导员、班主任、任课老师或家长往往不具备专业的心理干预技能，在简单判断一个人“心理有问题”后，就拼命想办法试图让人“回归正常”。更要命的是，越是这样毫无节制积极干预的师长，越缺乏隐私观念，很可能在有意无意中就将你“心理有问题”这事给抖搂出去了。甚至有教师非但不保密，还全部告诉校领导，最后导致学生被迫休学。

在欧美国家，有相当多的机构可供人咨询，但你不去找它，它也不会主动来找你。这对于某些已经困难到不会主动求助的人来说似乎相当冷漠，但也谨守着个人权利的边界，隐含着“如果你需要，可以来找我”的意味。当然，与此相对应的，无论院校还是机构，他们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即便有学生不幸出事，校方也就公告一下，表示遗憾，提醒大家如果心里不舒服可以上哪里求助，仅此而已。

然而在中国，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当下很多院校、单位之所以在“筛查”，说到底不是“以人为本”的，而是把人看作是团体中的一个基本单元，尽心竭力地主动干预，都是为了让你重新成为合格的一分子。汉语中常说的“重新做人”，其实也隐含着这一层意味：不是说你犯了错误就不是“人”了，而是说“做人”本身就要遵循一定的社会角色规范，才能被接纳为团体的一员。

这样的理念所在意的，不是个人权利的边界，而是每个人都要为整体负责。落实到现实中，说到底就是三个字：怕出事。因为照此逻辑，那个理论上无微不至关照所有人的“大家长”是负有无限责任的，任何成员出事都得找他，其结果，学校因为怕担责任，反过来如临大敌地“排雷”，免得出事了自己被动。

由于权利边界不清晰，个体又被看作是无法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未成年人，管理者就被认为应当负起无限责任；但全面负责的结果是不能出一点差错，以至于为了防不胜防的风险，上面累，底下也累。至于防患于未然的“排雷”，虽然美其名曰“为你好”，实质却是一种风险规避的免责手段，潜台词是“你别给我惹事”。这就出现了一个吊诡的结果：“无限责任”太沉重，导致无人敢承担责任。

在当下社会，不时可见这样的管理方式。日前，我在一个公园还看到，湖泊四周都被高耸的铁丝网围了起来，原因是以免有人不听劝阻，在湖面踩冰落水。原本就算有这样的事，那公园在有警示牌的情况下，也应由当事人自己负责，但现在的做法却是，为了避免可能的纠纷，

无法交代，索性把事做到极端，一刀切式地杜绝任何风险可能。

也是由于怕担责，在这背后常常潜藏着一种对人的不信任，因为万一出事都是自己承受不起的。这些年，人脸识别技术在国内泛滥，这固然也因为人们对新技术的追捧，但另一大原因恐怕也在于，它能为有效监控人群、防范出事提供新的管理手段。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理念问题。能把人当人看吗？能否承认人是有自我意志、为自己负责的个体？也只有厘清这样的权利边界，才能使管理者卸下无限责任的重负，因为很多事说到底都只能由人们自己承担，过度的“关照”既无必要也容易越界。

现代企业之所以普遍都标着“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不是偶然。因为任何组织都无法无限制地承受累积的风险，它们只应为自己所承担的那部分负责。在一个有风险的社会，如果我们想要享有权利，想规避自己承担不起的责任，就得承认“有限责任”这个前提，它是现代社会的基石。

版面编辑：许金玲

专栏｜迷人灰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我们其实更需要灰色，用它来抵抗过于尖锐对立的黑白世界，来柔化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让我们在暧昧的中间状态里寻找世界的多重可能性

文|王竞

作家、中西文化项目顾问

进入冬季后，我对灰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住在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汉堡，这里离波罗的海的入海口有一百来公里，冬天的气温在零度上下。让人难熬的，是它一望无际的灰色天空，可以整月不露一丝阳光。北德谚语有证：冬天的日子里，黑猫白猫都是灰猫。

在这样的天气里待久了，商店里有一样东西卖得特别快，那就是蜡烛。有的是暖茶用的，有的插在造型不一的烛台上。自19世纪末灯泡被发明之后，蜡烛成了非必需品。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有半截白蜡烛，停电时，父母要翻半天才找着它点上。三十年前，我刚到德国时，发现这个地方从不停电，但喜欢没事儿大白天的就点蜡烛。蜡烛常燃的地方是教堂，去朋友家喝茶，他们也会点上一支，说这样温馨。在那时，国内使用"温馨"这个词的频率还极低。最近读到德国一位照明科学家说，烛光有灯光无法取代的效果，即使是仿烛光的LED灯，也传递不出燃烧的蜡烛给人心灵的那般抚慰。烛光中的谈话哪怕不私密，也会充满信任感。至于烛光的魔力从何而来，还在研究中。

除了用蜡烛这个微弱的方法调和灰色，我还发现了一位只用灰色作画的日本艺术家，小栗原美和（Miwa Ogasawara）。她18岁来德国学人类学，后来在汉堡改学艺术，就一直留在了这里。她的画被法国蓬皮杜这样的顶级艺术馆收藏。据说，站在她的作品前，人们说起话来都会不自觉地变成耳语。这让我很好奇。疫情下，画展都关停了。我就在网上看她的画，都是些简单平淡的主题：窗帘，空房间，飞鸟，云，女性的脚尖……虽然是油画，但充满水墨韵味，可又不是中国水墨的气质。灰色在她的笔下流动，深深浅浅，直至透明，特别耐看。

有人问她，世界上有那么多颜色，你怎么就只选灰色呢？她说，灰色本身就是很多种颜色啊。假如选择红色，这个颜色里已经浸透了极多的文化含义，从喜悦到流血，观者固有的联想支点太多，会因此无法细腻地进入她的作品。而灰色是个中间色，符合她创作的兴奋点，她喜欢画生命与物的中间状态，一个空间向另一个空间的过渡，一个时间和另一个时间之间的某一点。她自觉地回避生活中那些高亮的瞬间，因为在大悲和大喜之间，存在着无数微妙混合的中间状态。而人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这种中间状态度过的，只是尽力去忽略罢了。千差万别的灰色最能帮她表达出中间状态感。她的作品意在邀请观者回归沉静，并进入一种自觉于中间状态的状态。

小栗原美和的画给我一种说不出的慰藉感，有点像蜡烛小火苗里跳动的那个东西，虽然它们一个是冷色，另一个是暖色。我的这个感受，也许跟2020年过得黑白太分明有关吧。这一年，世界各国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疫情，也经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不同体的多番博弈，最后还集体围观了美国的大选及美国人民的政治站队。每个社会里本来都有主流和非主流，有保守派和自由派，有左和右的阵营，但也有很多无需任何流派的空间。可在2020年里，很多嘶叫的声音却只遵循一个逻辑：非左即右，非对即错。在某些人的脑图里，甚至"不是爱国者就是卖国贼"的分类法也成了真理。"好人坏人"本来是小孩的认知逻辑，而所谓长大成人心智成熟，就是一个发现复杂性、接受无数中间状态的过程。那么，为什么2020年的一个倾向，是人们又甘于回到未开蒙的幼童状态，以为世界真的就是非黑即白呢？

是社交媒体的错吗？至少它不是无辜的。社交媒体一方面主宰了沟通渠道，另一方面也把它的简单粗暴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方式里。字数写多了没人看，标题不走极端也没人看。你不会去阅读跟你观点不一致的人的说法，更不会跟他辩论，却能靠骂他解恨和出名。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媒体人都在担忧，这样的技术会摧毁我们对真相的认知和对真理的追求。

2021年会把我们变回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吗？德国新马列主义哲学家布洛赫（Ersnt Bloch）说，“自由的难题在于它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对多义性和模糊性的认可，只有成熟的人才能做到，只有他们才能接受黑与白两极之间的那段灰色。那个地带深深浅浅，模糊不定。在那里，你和你的对手可以通过交换观点试图说服对方，目的是大家能最终携起手来，共同朝颜色更浅或更深的方向行进。

国际颜色研究所预测，2021年的年度颜色是亮丽黄和极致灰。亮丽黄应该是结束全球疫情的希望色，但我却想，我们其实更需要灰色，用它来抵抗过于尖锐对立的黑白世界，来柔化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让我们在暧昧的中间状态里寻找世界的多重可能性。一个多义的世界才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这个灰既不是沮丧的，也不是单调的，而是一种“智慧之灰”。

版面编辑：许金玲

荐书｜谁都可以看漫画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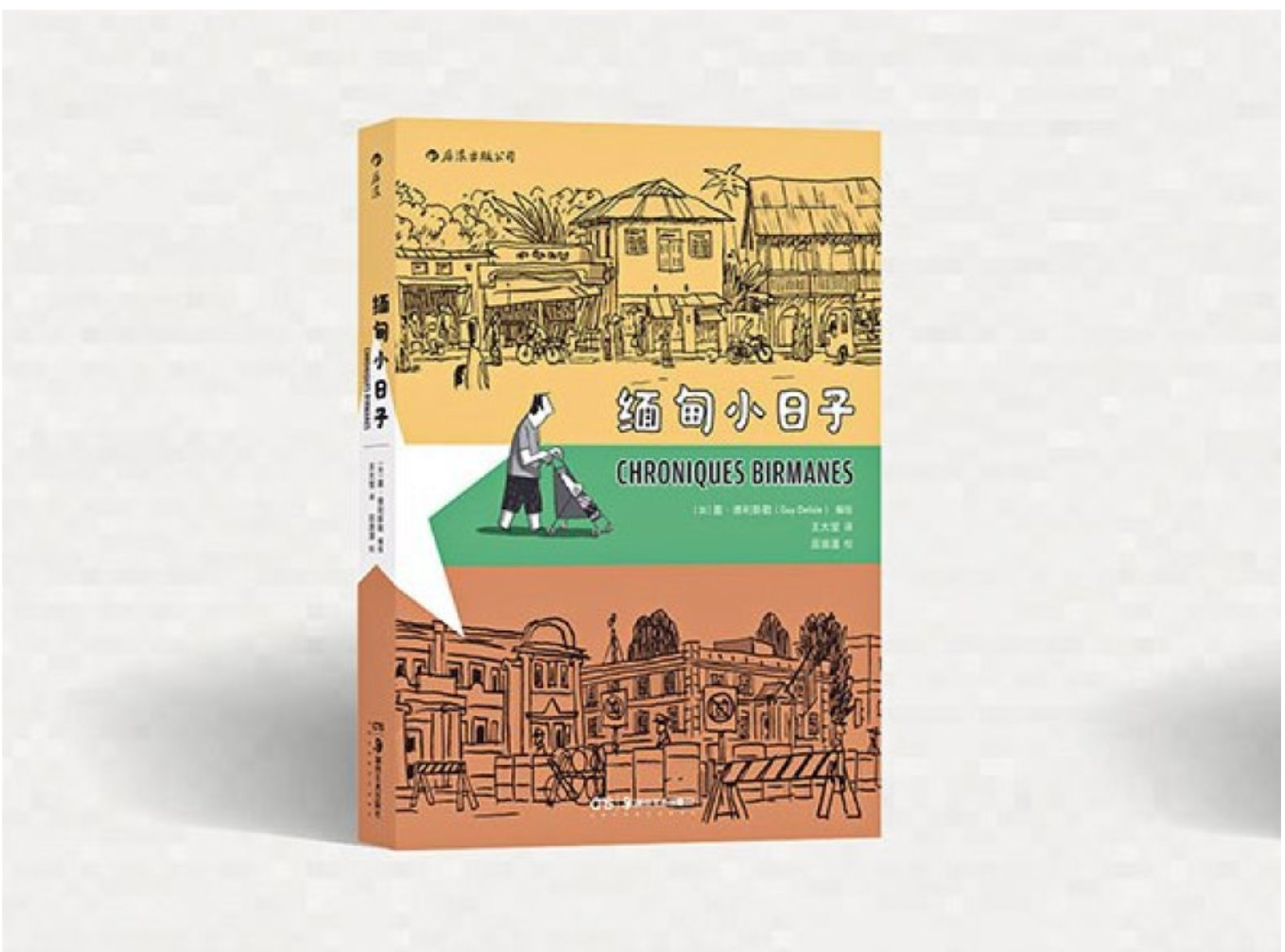
如果运气不济，漫画可能永远无法证明自己还能别有一副面目。好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别处的作品，新的媒介土壤也孕育了新生的本土作品

文|沈大园

出版人

经常听到身边有孩子的朋友为手机头疼，如何让孩子少玩手机是个重大议题。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美好时代，只要捧起一本书，父母就不会来打扰。若用最冰冷的眼光看，手机和书不过是内容的不同载体而已，本不分高下，可我们不是活在光秃秃的物理世界，还有一个文化空间叠压在上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管在淡去，但仍是中国社会刻骨铭心的记忆。作为高效的工具，手机和各类电子产品逐渐被正名，可若一不小心，还是会和玩物丧志牵连起来。智能手机还有洗刷自己的机会，更委屈的可能是漫画，差点连个机会都没有。

我们家看什么书都能被容忍，惟独漫画书不行。在我爸妈眼里，带图的都是给学前儿童准备的。可艺术形式能表达什么内容，并不会自己画地为牢，条条框框都是人画的。就像有文件说，动画片就是给五岁以下儿童看的，只能表现特定的主题和价值观，并且电视台只能播出符合这个条件的作品，那五岁以上的观众确实没必要看动画了。漫画的困境大抵也是如此，它能表达的内容其实很丰富，但大家默认这只是小孩子看的东西。当出版人想要推介这个品类的全年龄段作品时，不得不强调它另外的名字——图像小说。如果运气不济，漫画可能永远无法证明自己还能别有一副面目。好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别处的作品，新的媒介土壤也孕育了新生的本土作品，它们共同证明了，漫画本是自由的。



《缅甸小日子》
盖·德利斯勒 著 王大莹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0年9月

盖·德利斯勒是一位动画师，由于妻子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他和新生宝宝也一起去缅甸生活了一年，《缅甸小日子》就来自于这一年的生活记录。这不是一本游记，没有旅游攻略

和旅行心得；也不是传统的非虚构写作，仅着重于记录历史或洞察社会。它就是一份生活记录，既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当地人的生活，每两三页一个小故事，描绘点滴细节，举重若轻地把政治、历史、宗教、人道关怀这些宏大命题传达出来。诙谐的黑白漫画是轻的形式，敏锐的观察保障了厚重的关怀。

外来视角总能看到一些本地人习以为常、本身却并不正常的东西。比如缅甸的官方报纸《缅甸新光报》上，头版永远是人民的奋斗目标，四大政治目标、四大经济目标和四大社会目标；二版永远是人民的四大愿望，分别是打倒各种国内外的邪恶势力；剩下的最重要的是丹瑞大将军的语录，大约能占到版面的四分之一；然后是其他领导人的活动（有时整条新闻就是出席活动的官员名单）、国际新闻里水深火热中的外国人民；最后是体育版和文化版，这是缅甸人民最喜欢读的两个版面。

德利斯勒的社会观察非常有趣，不过，整本书里最让我动容的是一个老人的故事。德利斯勒在当地的助手爱抱着他的宝宝到处串门，因为本地人都喜欢逗这个白人小孩。有一回，德利斯勒跟着进了一户人家，一位躺在病床上的老太太，对他讲起了她的过去、她的青春岁月，以及仰光曾经的黄金时代。那是一番漫长的谈话。临别时，她对他说，“不得不在这个国家最糟糕的局势下招待你，真是很遗憾呐。”



《漫画之王：陈福财正传》
刘敬贤 著 黄天怡 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

看书名，这似乎是一部传记小说，围绕一个叫陈福财的新加坡漫画家展开。陈福财生于1938年，出道作品是《超级铁人》——主人公发现一个机器人，无意间用中文命令激活了它（机器人只能听懂中文），带着它去参与了新加坡历史上诸多的重要事件。

但其实陈福财这个人物是虚构的，这是一部伪传记小说。作者刘敬贤把新加坡的历史糅合到陈福财的作品中，形成一种“画中画”的结构，借陈福财作品的名义，重新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独立运动、与马来联邦的合与分、李光耀的长期执政等。所以，这也是一部历史漫画或政治讽刺漫画。

但它仍不是全部。陈福财在他晚年的一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相反的世界：人民行动党左翼领袖林清祥没有被李光耀打败和放逐，而是成了新加坡的总理，而陈福财自己则从无名画手变成新加坡的漫画之王。但在故事最后，李光耀还是纠正了这个倒转的世界，陈福财重

回上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他已经知道了未来的走向——李光耀将率领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籍籍无名，作品无人赏识，生活惨淡。然而，当陈福财看见漫画店，他依然决定选择去过默默无闻但有所钟爱的一生。揭到第三重底色，才发现这也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纳闷集》
匡扶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年6月

2017年，匡扶注册了微信公众号“匡扶摇”，开始发表漫画。如果没有这个新平台，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这些作品。这些故事大多有好几十页长，彩色，画风不是青春漫画里漂亮到不真实的样子，也没有讽刺漫画里夸张的特征。人物长得平庸，甚至有时有点丑陋，就像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真实人生。情节是普通人的琐碎日常，狼狈的、尴尬的、让人纳闷的生活，但匡扶总能在其中嵌入无数闪亮的细节，看完后就发现这不是絮絮叨叨，而是悠悠长谈，这不仅是平凡人生，也是市井史诗。

《纳闷集》收录了六则故事。第一篇是《私奔的外婆》。“我”的外婆多年前就私奔了，姨婆（外婆的双胞胎姐姐）拉着“我”踏上了追踪之路。循着线索，每到一处，总是扑空，外婆早已离开。但“我们”见到了许多认识外婆甚至跟她生活过的人，听他们讲外婆的种种事迹，“永远活力四射”，“喜欢新鲜的生活”。“我们”一边在现实中追索，一边也在记忆中寻找。小时候的“我”会把膏药剪成小兔子、大象、乌龟的样子，给外婆贴上。“我们”一直追到了海边，也没有找到外婆，但姨婆说，“也算是找到了”，因为外婆的全部生活已经被找到，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柏拉图上班记：哲学家的职场百态》
朱勒 夏尔·佩潘 著 周金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年7月

《柏拉图上班记》虚构了一家“思考公司”，里面工作的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实习生柏拉图的到来，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每个故事只有一两页，都会有一个哲学家出场，还会有专门的思想介绍，让读者看懂梗在哪儿。公司的工会主席是马克思，总是热衷于印制传单，组织罢工。尼采是狂躁的人力资源总监，他鄙视道德，推崇超人，最适合激发员工的能量。

乍一看，以为这本书是在通过好玩的设定普及哲学知识，但读完会发现，整本书传递的是关于工作的哲学思考，是借哲人的故事思考我们现代人自己的问题。柏拉图笨手笨脚地打搅到了住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第欧根尼住木桶是为了反对开放式办公。表面上看，开放式办公为了让大家融为一体，但也是为了让所有人监视所有人。其实，如果没有跳过文字直接看漫画，这本书的第一页就在说，“劳动”拉丁语单词（tripalium）的原义，是一种三桩酷刑工具，用来处罚反抗的奴隶，使其遭受缓慢而残忍的折磨。

版面编辑：许金玲

逝者｜钢琴之子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1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傅聪（1934—2020），钢琴家、教育家



傅聪。

文|伯樵

乐评人

2020年12月28日，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于英国伦敦离世，享年86岁。

傅聪1934年出生于上海吕班路201弄53号花园新村。年纪尚幼的他，早早就显现出过人的音乐天赋，每当家中唱片旋律响起，顽皮的他总会停止喊叫。父亲傅雷的友人林俊卿一次做客傅家，打牌之余让傅聪辨别风琴音高，傅聪的回答总是准确无误。8岁半时，傅雷决定让儿子学习钢琴，先投师于李惠芳，之后跟随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Mario Paci）学琴。

少年傅聪在学校顽劣异常，傅雷无奈只能在家亲自辅导课业，并着手编定国文教材。虽然傅聪琴艺精进神速，但毕竟年幼贪玩，有时甚至会一边练琴，一边在琴架上翻阅《水浒传》，乱弹琴的后果往往是招来父亲的打骂。傅雷身为著名翻译家，本人性格刚烈，脾气峻急；无论对待领导、朋友还是家人，他都既有火热的赤诚，又坚持原则到苛刻得不讲情面。在对待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傅雷更是不乏呵斥和体罚，父子二人甚至可以为"贝多芬哪首作品更伟大"而大吵一架，以至傅聪甚至因此负气出走，寄住朋友家。

抗战时期，傅雷一家移居云南。1949年6月，傅雷、朱梅馥夫妇携次子傅敏飞赴香港，后辗转回上海定居，傅聪则留在云南大学外文系就读。17岁时，他才下定决心专攻音乐，不仅大幅度增加练琴时间，并开始系统性学习乐理。1952年2月，在纪念贝多芬诞辰125周年的演出中，傅聪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这也是他的正式音乐会首演。之后，他被选拔去罗马尼亚参加钢琴比赛，并在东欧巡回演出。

1954年8月，傅聪赴波兰留学，师从肖邦演奏名家杰维茨基（Zbigniew Drzewiecki）。半年后，他作为中国选手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取得第三名的佳绩，并拿到玛祖卡奖。来自东方的傅聪，能将玛祖卡（Mazurek）这种民族性极强的波兰民间舞曲体裁演绎得如此动人，着实让西方评委感到惊讶。

1958年12月，因听闻父母在国内的一些传闻，傅聪决定离开波兰，出走英国，开启了漫长又纠结的演奏家生涯。

自频繁出国起，傅聪一直与父母保持书信联系。傅雷对儿子的态度大变，从早年的严父逐

渐转变为慈父。在家书中，傅雷总是自责以前脾气不好，太过苛责，同时也近乎执念地倾泻着自己对儿子的爱。傅聪去国之后，家书一度中断。1959年10月，在周恩来和陈毅的批示下，傅雷夫妇被允许与傅聪恢复通信。傅雷在家书中教导儿子不忘爱国，“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在之后数十年间，傅聪也一直践行着这些原则。

傅聪在英国期间，与小提琴大师梅纽因（Yehudi Menuhin）成为忘年交，并与梅纽因之女弥拉（Zamira）产生情愫。两人于1960年底结婚，并于四年后诞下一子。1966年9月，傅雷夫妇在家中自缢去世。两个月后，傅聪才知悉这一消息。

1978年11月，得知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吴祖强率团访英，傅聪在瑞士演出结束后连夜赶回伦敦，在深夜与老友重逢。几天后，傅聪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他在伦敦的独奏会，返场时特意加演了《牧童短笛》，传达出强烈的归国信号。吴祖强回国前，让傅聪写了一封呈给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的信，表达回国探亲访问的愿望。12月28日，邓小平亲自批示：“傅（聪）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

1979年4月，傅聪回国参加了父母沉冤昭雪的平反追悼会。之后，他频繁地回国从事演奏、教学和演讲，并整理出版了《傅雷家书》。家书甫一出版即洛阳纸贵，傅雷父子间的舐犊深情，使这本书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经典。

1974年，40岁的傅聪与钢琴家卓一龙结为夫妻。他们伉俪情深，在音乐事业方面也琴瑟和谐，二人一直为中国的古典乐教育事业做着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传习工作。进入21世纪后，傅聪的演出活动依旧频繁，直到2016年后才因身体状况逐渐停止舞台演奏。

傅聪的钢琴演奏触键细腻，音色高贵，诠释深刻。西学氛围浓厚的家学根底，使他在对西方艺术有通透理解的同时，又能以独特的东方视角重新审视欧洲音乐。傅聪的曲目量求精而不求广，但他仍兼擅斯卡拉蒂、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肖邦、德彪西等时代跨度极大的音乐风格——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浪漫派，傅聪都留下了深思熟虑却精彩动人的演绎。傅聪一生得窥中西艺术堂奥，游弋于黑白琴键之间，他的个人风骨、精湛琴艺以及父子间的羁绊，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宝贵的文化记忆。□

版面编辑：许金玲